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 年 10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做编辑的大抵都有两种毛病，一种是“家花没有野花香”，自家的文章总是觉得不够好，另一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总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自家孩子越看越喜欢。我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人，但是至少在编本期的时候，我承认自己不由自主的成为第二种“有毛病”的编辑，真想对各位能读到本期的读者说一声：

独立阅读的读者们，你们有福了！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 济：苏小和

写 作：朱 白

朱航满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夏佑至

影 像：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一段未完成的革命史

严 飞：三年零八个月，往事并不如烟

书单

成 庆 贾 葭

羽 良 言 一

严 飞 刁 莹

书评

吴 强：欧洲的气候政治版图

孙传钊：洋人的“新左派”

夏佑至：“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专题 诺贝尔文学奖

康 慨：赫塔·米勒：熟悉的陌生人

康 慨：赫塔·米勒：生平与作品

戴新伟：猜中就是“众望所归”？

游记

罗四鸽：走进格萨尔

现场

马慧元：温哥华早期音乐节杂记

成 庆：令人费解的布鲁克纳

访谈

自由对我太重要——张树新访谈录

社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弗朗西斯·福山访谈录

记忆

女患：谁能告诉他们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

讣告

唐德刚

译介

Jacqueline Pfeffer Merrill：永恒徘徊的胚胎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导毛寿龙是奥斯特罗姆的得意门生之一,老师获奖,学生自然激动不已。毛这样描述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核心:

复合共和制理论,其实解构了国家理论。奥斯特罗姆遵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以,其自主治理的理论,并不是国家和私有化之间的中庸。是个人主权基础上的自主治理,而且还是对国家的替代,她的眼里没有国家,只有复合共和国,或者多中心秩序。



1990年代,毛开始接触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并翻译了她的著作《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2000年,毛寿龙和他的夫人李梅访问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系统且深入的了解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体系。回国后,毛便开始主持和翻译“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一书,首套丛书包括六本,即《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多中心治道与发展》、《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而正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余逊

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让奥斯特罗姆最终问鼎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毛寿龙显然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的学者,除了翻译导师的著作,他还开发了中国本土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分析框架,试图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应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逻辑,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实践进行分析。

台湾学者汤京平博士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非常景仰。他在给大陆政治学研究方法论讲习班讲授“公共政策案例研究方法”时,指出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并且认为毛寿龙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大陆最有影响和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

事实上,大陆还有一位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高足,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王曾经在2000-2006年跟随奥斯特罗姆夫妇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的治学和为人十分敬仰。王回忆道,导师在印第安纳大学是出了名的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哪怕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依然每天努力工作,到办公室与同事和学生交流,从来不打算退休。

尽管奥斯特罗姆对学术研究要求极为严格,但他们对待同事和学生的平等精神却像春风一样,给予王建勋深深的影响。王建勋说,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工作坊”里,在知识和学术面前,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说,成立三十五年的“工作坊”象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同人们在那里践行自治,愉快地生活,努力地工作。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社会每个人的福祉。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她来到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

布鲁明顿分校，并在政治学系任教，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荣升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并曾于1980年代担任政治学系主任，还是该校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1974年，奥斯特罗姆与丈夫一起在印第安纳大学组建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效仿作坊里手把手传授的师徒关系和技艺培养模式，与学生密切合作共同研究。

这听上去甚至有点像中国的私塾。在这样传统的学术环境里，奥斯特罗姆夫妇长期致力于研究自治问题，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奥斯特罗姆夫妇将公共选择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局面，并使布鲁明顿成为公共选择研究的三大基地之一(另两个基地是弗吉尼亚和罗彻斯特)。后来，他们更是将“工作坊”变成了一个跨学科国际研究中心，与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数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各国学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奥斯特罗姆对警察、灌溉、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致力于分析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其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这大大推进了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显然，与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相比，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人们的自治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这听上去的确很美，所以毛寿龙和王建勋等人这些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层面和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意识到奥斯特罗姆学说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可谓不辞风雨。尽管眼下的中国，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是一个敏感词。在一个连基本的分工都没有完成的国家，那些骄傲又盲目的官僚们，可能会对奥斯特罗姆不屑一顾，但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完善的社会，人们自主治理公共事务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路径。除非有人愿意把这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强行拉回到蛮荒时代。



ESSAY&STORY 散文·小说

观察员 朱白(广州, zhubai@tom.com)



美国出版业大佬贾森·爱泼斯坦(兰登书屋前总编、《纽约书评》创办人)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预言图书将破茧陈旧的出版系统，从而迎来新的出版形式，比如电子版权等新业务。而我们国内的现有出版系统还在为书号等繁琐而低级的事儿费心，没有国家统一授权书号的独立出版一直在我们这被理解为非法出版物，而这里的“非法性”又在于没人知道它到底触犯谁的利益和更具体的法理。荒诞的环境只能憋出离奇的和不顺畅的产物，比如眼下一些作家选择所谓“独立出版”就是其中之一。“独立出版”显然是从当年的独立电影(比如贾樟柯早年那些只能在海外出版发行、国内D版DVD的作品)和后来的独立音乐(左小祖咒、舌头、PK14这些大牌的音乐人和乐队早就不跟国内那些唱片公司玩了，而是自己制作专辑并有着自己一套的销售系统，如网站销售、随乐队巡演时零售等)一脉相承下来的。被称作诗歌无冕之王的杨黎去年出了自己首部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还有以乐评人身份被一代青年人追捧的杨波去年也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眼中的梁木》，这些曾引来小圈子欢呼的作品都是所谓的“独立出版”，也就是说，没有书号，以自身奇特的方式在市场上流通。这种被逼无奈的行为显然还会继续下去，只要我们的某些

制度继续僵化着、腐朽着。

而今年小说家曹寇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由“了不起的坏蛋”这个没几个人听说过的民间机构独立出版发行了，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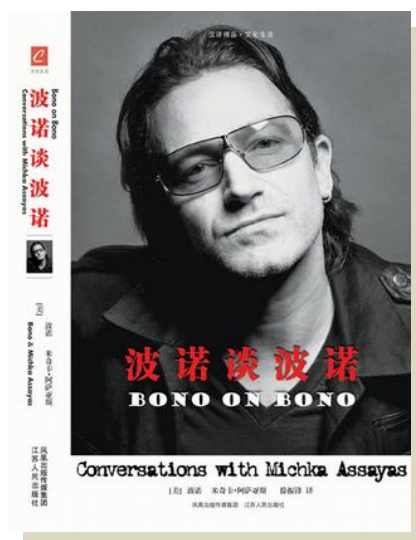
的形式不能掩盖其作品的卓越以及作品问世的重要性，曹寇作为“70后”写作的代表作家，近年来的名声主要积累在网络上和一些纯文学杂志上，这对于一个以写当代题材和为共和国文学书写上自己名字的作家来说，是不够的。《操》（曹寇著，了不起的坏蛋 2009年7月版）有着故意为之的挑战感，就小说集的形式来说，它已经超越了现有出版系统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年轻人的能力，毫不含糊地将出版一本书提升到一件个人事件上。据说祖国六十周年华诞期间，作家曹寇亲赴首都参加众友为其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每册100元的限量印刷200册均为签售版，有作家的手写编号，一本小说集的出版在经历几年的踌躇终于以完整的形式问世，这件事所流露出来的尴尬是不是应全部由现有的所谓合法出版系统来买单呢？作为朋友，我总觉得，一本自己的小说集出版发行对于作家曹寇本人来说，其中的喜悦在其无奈面前已经是次要的了。

相比起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现在已经不需要介绍了，他仅凭一两本书就可以征服无数国内读者。今年初出的《大教堂》（肖铁译，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版），其中《大教堂》一篇被誉为卡佛最成熟的作品，其实在我看来这应该算是一篇卡佛比较糟糕的作品，原因就不在这细说了，我想一个真正为卡佛小说着迷的人一定知道我所说的。相比而言，《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汤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9月版）显得纯粹一些，译者也是近年来在网上活跃的卡佛迷，由他翻译的小说保持了卡佛的味道，我觉得这非常可贵，你看的出来，就翻译来说，这本书让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差事，而是一项让人欣喜的有益健康的运动。卡佛生前没过几天好日子，也就是说他大半辈子都是默默无闻要靠体力劳动讨生活的，这对作家来说非常不公平，凭什么不能享受到自己创造的价值呢？

看卡佛的小说，然后再去看保罗·奥尔特曼根据卡佛五篇小说改编的电影《银色·性·男女》，这日子过的真够文艺的。如果再怀旧般地听听1960年代美国的音乐呢？那不是说明我的生活很梦幻呢？听珍妮丝·乔普林的歌，觉得她对于生命的礼赞和激情是动人的，她用她伟大的歌喉给人类历史留下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声音，看她的传记《活埋蓝调里》（麦拉·弗莱曼著，高晓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版）则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我的意思是说，那样一种堕落糜烂的生活，她竟然活出一种美感。跟一生都在怀疑自己、为了要证明自己到底受不受人欢迎而不停找男人上床的珍妮丝·乔普林不同，作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最伟大的摇滚明星之一的波诺，好像从来就是那个积极的、充满正面教化意义的偶像人物。如果你看《波诺谈波诺》（波诺、阿萨亚斯著，徐振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版）开头部分，对话提问者米奇卡·阿萨亚斯来到波诺位于都柏林的克里尼豪宅时，发现墙上贴满的那些波诺和世界名人的来信，就知道波诺已经是这个时代毫无疑问的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无论是他出任某个组织的大使，或者参与某个慈善活动，再或者是登上世界最巅峰的舞台，波诺都在

合理地运用自己的想像力和才华为这个业已溃烂的地球家园做积极方向上的努力。《波诺谈波诺》是法国的音乐记者和小说家米奇卡·阿萨亚斯在2002年到2004年间，对波诺进行的贴身访问后结集出版的谈话录。当然，一个全世界瞩目的音乐家做了一点音乐之外，况且还是看上去对地球人有益的事，这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们才能理解波诺坐在安逸的豪宅里或者法国海滨度假胜地表情恬淡地接受访谈。至少波诺做到了真诚和极度耐心（比如对《圣经》做过深入研究的波诺，说出了“正义的感觉比慈善更重要，特别是我们中间那些有特权的人”这样的话，他还可以自嘲“当你卖掉了许多唱片，就非常容易成为自大狂相信你能改变世界”），更何况他还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跟政治和权势打交道的明星，怎么说这本书也值得一看。

我总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美妙的语言，大概是因为马尔克斯，我会想当然地认为西班牙语大概是那种可以带给你无限想像力的语言。所以我会关注“西班牙当代文学经典”这样的丛书。《来日无多》（胡安·马德里著，赵英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9月版）讲的一个异色世界里的黑色故事，妓女、瘾君子……但，你知道，看小说不是猎奇，仅仅有这些是说明不了问题的，胡安·马德里不是语言高手，但却是讲故事的好手，他可以把一个场景像摄影机一样扫描出一幅真实清晰的图像给你看。相比而言，我对另外一本《对镜成三人》（胡安·何塞·米利亚斯著，周钦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9月版）的兴趣主要在故事上，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靠秘密来维系的，至少有时候是如此。嫉妒、异化成了男女交流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故事里的男人发现自己的妻子和邻居一个男人有关系，从此三个人的关系成了故事的唯一悬念。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石家庄，zhm7976@126.com）



我曾有一个大胆而有趣的研究计划，就是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的进行一次系统的版本研究，其中有一项就是关于作家们的全集现象。我个人以为，二十世纪可以值得一再阅读其全集的作家仅有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钱锺书、杨绛、张爱玲、胡兰成、废名、萧红等十余人，他们留给世人的文字几乎可以堪称字字珠玑，而这些作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则是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以我看来，则大有“一对兄弟，两对夫妻，三对师徒”的戏称。十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迟至今天也未能真正展开，但不妨先说出来与朋友们分享，也声明此研究的版权为我首创。不过，一旦有了这些作家的作品重新出版，我一般都会予以关注的，诸如刚刚出版的《杨绛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8月1版）。此套文集共分三卷，小说卷为《短篇小说 洗澡》，散文卷（上）为《干校六记 丙午丁未年纪事 将饮茶 杂写与杂忆》、散文卷（下）为《我们仨 走到人生边上》，文论戏剧卷为《文论 喜剧二种》，相比2004年人文版精装的《杨绛文集》，此套文集多收了新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和杨绛先生修订的《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但也少了杨先生翻译的诸多作品，因此，这是一套名副其实的创作文集。尽管已有精装本在先，但这套新版的文集编选的实在文雅朴素，适合随手翻阅，也就买来重温了。

我读杨绛先生，第一次却是先生翻译的名作《唐吉珂德》，而最喜爱的则又是先生的长篇散文《干校六记》，而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以及回忆录《我们仨》则几乎可以称作当代畅销书了。这几日重新翻阅先生的生平与文字，深深地感受到一种精神中的贵重气息，她的文字和人生均处处流露出一种精致、清醒与高傲的气质，与我们这个时代却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两年前，杨绛先生出版《走到人生边上》，我读完之后真有一种人生的通透之感，这个智慧、尊贵的老太太，与她的亲人们一个一个地分别之后，晚年独自去体味人生路途尽处的风光，让人不敢轻视。听说杨绛先生如今身体还很健康，思维也敏捷，而明年杨先生也已是中国传统的百岁寿诞了，我祝愿先生长寿。

有些作家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他人生中的每一部著作都可谓精彩不断，这些作家的文字非常适合我们阅读全集，诸如我前面提到那些作家。而有些作家则需要经过不断的磨砺和训练，通过无数失败作品的铺垫，才有一两部值得一读的经典之作，但若如此也就足够了，其实更多的作家给我们这个时代贡献的都是一些鸡肋式的平庸与无聊。对于前者，我们实在无法强求，但对于后者，我们却需要拥有更多的期待，如作家陈忠实和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对于陈忠实来说，他至今所有的文字也就只有《白鹿原》这一部值得隆重推荐，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来说，有这样一部沉甸甸的小说作品，也便足够了。读《白鹿原》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但至今记忆尤深甚至堪称震撼，一是因为这样一部小说作品竟然出自一位农民作家之手，另则因为是小说中流露出的一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尊严与生态，并非简单的来自外界强加。对于《白鹿原》的各种解读，已实在是太多，但实际上最好莫过于认真研读一遍小说原作，但对于我所提到的那两个问题，则在我刚刚读过的著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中找到了答案。可以说，这只是一本小说的副产品，但因为爱屋及乌的原因，读这样的著作也有些满足好奇心的性质。此书对我所想要询问的问题都有了细致的回答，甚至是更为深入思考的回答，作家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近二十年后才交上这份答卷，我以为是值得信赖的。如果你恰好读过小说《白鹿原》，又恰好对这部小说的诞生充满兴趣，这本书倒是值得一读的。

毫无疑问，无论怎样的评选方法，杨绛先生的作品和陈忠实的小说都是可以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的，近来偶然读到一册由杨匡汉和杨早主编的《六十年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1版），便在六十部作品中选择了杨先生的《干



校六记》和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在这本著作中，我才发现原来杨先生的《干校六记》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重视，诸如前者直到出版近二十年后才被当代文学研究者予以重视，此前的众多文学论著与史料均很少提及该作，而后者在当年的天津“八五”优秀长篇小说评选和“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也均予以落选，现在想想，竟有些荒诞，可以想象那些道貌岸然的评奖与论著有时候该是多么地不值一信。倒是这册提供趣闻的《六十年六十部》引发了我对该书阅读的兴趣，尽管这是一部可以称之为“献礼”性的著作，但它的独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在六十年文学作品的选择上，编选者所列的六十部作品绝大多数我个人都是很认可的，觉得非常值得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代表，而评选者为了表达取舍间的艰难，在附录中又提供了一部“副榜”，尽管两者互有交叉，但足以表达制作者的良苦用心，读此书，不妨可作为当代文学入门的导游图；其次则是对于每一部作品的评论，由于这是一部集体性的作品，参与者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但此书作为“社会科学院品牌”，与以往我读到的类似作品不同的是，参与编写者大多在自己擅长领域各显本领，能够独立表达自己对于评价作品的观念，诸如李建军在评论 1958 年作家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便是独出新意地从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为代表的《红楼梦》之间的承传，来分析这部特殊年代的特殊小说的艺术因缘；另外，这部著作的撰写者们在其研究和表达的方式上也都是各有性格，均显示了良好的文学技艺，诸如在周瓚关于北岛 1978 年的诗歌《回答》的评论中，开篇便是这样的引人入胜：“1978 年 12 月 23 日，一本名为《今天》的文学民刊在北京问世。那个多雪的冬天，一群年轻人在当时北京东城的一间七八平米的小屋里整整忙活了三天三夜。然后，他们商量把印刷好的《今天》创刊号张贴出去，这时候有人犹豫了，似乎是害怕了。最后，他们中三个胆儿大的约定了去张贴。北岛是三个人中的一个。临别前，大家痛哭一场，因为谁也不知道此去是不是‘壮士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临出门前，北岛想了个注意，把自行车后面的车牌涂改掉，因为在两年前的丙辰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中，公安局就是根据自行车的车牌号码抓捕当时去广场参与追悼周恩来、攻击‘四人帮’的民众的。……”

龙应台女士的文章我是爱读的。之所以喜爱，是因为那文字中难得的犀利与洒脱，读来常常有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细细品读，其一是龙女士文章气象开阔，无论家国大事，还是儿女情长，她往往都不拘泥于狭小的问题，而是常常试图寻



找问题发生的根本所在，许多答案都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地方；其二是她的文笔有梁任公“笔锋常带感情”的特点，读来颇有思绪纷飞和精神为之一震的感觉。《六十年六十部》在 1988 年选择了将龙应台的《野火集》作为代表，只是我读到此书的时候已是其出版十多年之后了。后来又断续读了她的文集《百年思索》、《这个动荡的世界》、《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以及这册刚刚引进出版的《目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9 月 1 版），感觉到那个剑拔弩张面孔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侠骨柔情的心灵。这册《目送》包括龙应台的散文短章 73 篇，谈父母逐渐远去的背影，也谈日渐成长的孩子的身影，我读这些亲情散文，时时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人间温暖。龙应台出生在台湾的高雄，父母亲却是在 1949 年迁往台湾的“外省人”，这种独特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看待问题的视角，而她思考问题的精神背景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在海外留学和定居时获得的思想洗炼，有了这两个方面独特的生命体验，她的思考与陈述自然显得与众不同——既独特又独立，既愤怒又理性，既热烈又温柔。据说新近龙应台在海峡彼岸出版的著作《大江大海》很是畅销，但可惜至今尚未读到，但想来也应难脱这样的思想底色吧。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今年是达尔文诞生 200 周年，他那本著名的《物种起源》出版也刚好 150 年。不过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在世界近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科学家，中国人如今却少有提及。有意思的是，达尔文的名字在美国却时常成为新闻主角，因为信奉“创世论”的信徒们仍然一直与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进行持续的斗争。而在中国，达尔文的对手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达尔

文从一开始以“社会进化论”被引入中国，这就使得一门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专业科学，在中国一直被当作一门替代性的哲学人类学引入的，从此“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一逻辑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地检讨和清理。

庚镇城的《达尔文新考》（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9月版）里提了这么一段有趣的公案，1931年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曾发表过这样一封达尔文致马克思的回信，里面写道，“为了推动思想自由，我认为依赖科学进步一点点照亮人们的心做法是明智的。因此，我历来回避关于宗教的技术，而仅讲科学性的问题。也许是我过虑，不管是以什么方式，如果我帮助了对宗教的直接攻击，我都担心我的家人会感到难过。”当时苏联发表此信，是为了想证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不过到60年代终于由美国的哲学科学史家福伊尔发现了疑点，原来这封信是写给马克思的女婿艾夫林的，而达尔文与赫胥黎同艾夫林这些教条式无神论者一直都保持着距离，这不仅证明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只不过约束了达尔文同艾夫林这位三流的反宗教科学人士的互相认同，而没有约束他同伟大的马克思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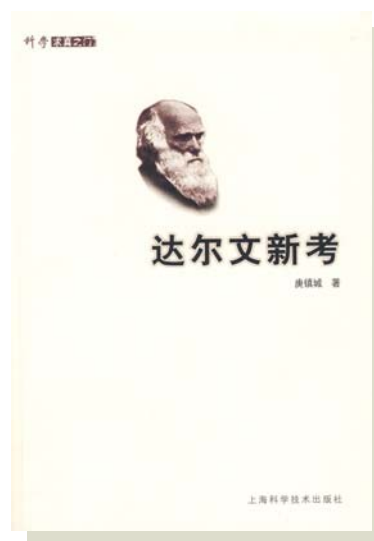
达尔文爱科学，但是并不那么反对宗教，这与我们常在报刊媒体上看到的一些“科学原教旨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宗教神秘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中，直到当代，一直还是十分重要的主题。根据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经验种种》的说法，宗教神秘主义体验大抵有四个特征：对不可能的表现；直观的洞察；瞬间性；被动性。这种神秘主义的体验由于在现代哲学的视野里，一般被视为是非理性的、无法实证的，从而加以排斥，但是在西方比较宗教领域，神秘主义仍然是非常关键的研究对象，如Rudolf Otto在193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东西方的神秘主义：一个对神秘主义本质的比较性研究》（*Mysticism East and Wes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Nature of Mysticism*, Macmillan Company, 1932）就是对佛教与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体验进行开创性的比较。可惜的是，这本讨论神秘主义的经典著作，却一直未能译为中文。

最近出版的罗浩（Harold D. Roth）的《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严明等译，学苑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是一次重新理解先秦道家思想的努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是他试图在神秘主义(Mysticism)的视野里来考察道家思想。

当然，罗浩的这本著作并非是把先秦道家思想放在神秘主义的视野里的首度尝试，事实上，本杰明·史华慈在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与世界》（程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里就认为，对老庄的研究要引入神秘主义的视野(vision)，也即是说，老庄与大乘佛教、婆罗门教、苏菲派、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一样，包含相当重要的神秘主义维度，是对永恒实体的一种人为的把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神秘主义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认为的飘渺玄思，而是一种对终极实在的秩序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庄子》里的喻像，并不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也不是一种心灵自由的象征，而是对“道”的神秘化内容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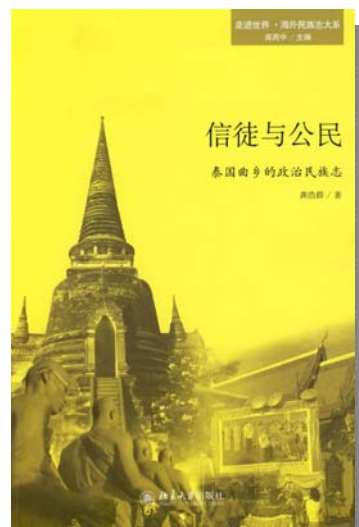
不过这种神秘主义视野，对于国内老庄研究者而言，可能还显陌生，我基本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或许是因为中国思想的研究者，还局限于儒家视角。西方思想家利用神秘主义的视野来看待老庄思想，史华慈也并非开创者，著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可算是这方面的先驱。据Jonathan R. Herman在《我与道：马丁布伯与庄

子的相遇》（*I and Tao: Martin Buber's Encounter with Chuang Tzu*,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6）的研究，马丁·布伯早年受庄子思想影响很深，甚至他的那本名著《我与汝》，也与庄子有莫大的关系。对于布伯而言，庄子是神秘主义谱系中的重要一员，这可以从他编选的《狂喜的忏悔：神秘主义的核心》（*Ecstatic Confessions: The Heart of Mysticism*,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6）就可看出，他把印度佛教、苏菲派、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主义直到中国的道家与犹太教的哈斯德主义，均归入神秘主义的脉络里，那么这或许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否代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思想传统，只不过这个传统由于儒家独尊的历史原因而隐而不彰，这或许可以让我们尝试用新的角度去审视先秦思想史。



回到罗浩的这本著作，他并没有对老庄传统与神秘主义的关系有太多的着墨，而是以《内业》作为核心，来考察道家的修行技术，并且他揭示出我们过往对道家修行的一个误解，认为道家着重养身术，而不同于佛教的修行法门，他认为，道家正是在神秘主义的视野里，摸索出一套修行得道的技术，这使得道家作为神秘主义的思想系统，变得更为完整与丰富。

提到这么多神秘主义与宗教传统，读者或许会误认为我是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下面我推荐的这本书，或许会告诉各位，谈宗教、谈信仰并非就是复古，同样也可与当代顺利接榫。龚浩群的《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2009年8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本典型的民族志著作，但是却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在小乘佛教的信仰共同体中间，如何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群体。不过这样一本上乘的研究著作，也有些许瑕疵。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以福柯的治理术来观察这样一种信仰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并无不妥，但是既然是一本民族志的研究，或许应该以被研究者（信徒共同体）的视角去审视权力与政治关系，而以福柯这种后现代权力论者的视角引入，或许最终只会既误解了信仰，也误解了民族志这种特有的研究方式。



谈到民族志，不得不提近来“走红”的台湾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中华书局，2009年7月）一书，王先生以汉人之身，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探求他们的文化与精神世界。本人虽属少数民族，但受“汉风西雨”污染日久，却无多少少数民族认同。过去还时常被“少数民族考生”这样的体制话语所提醒，或者被一些周遭的朋友的“异族惊诧论”所强化，但是如今既不参加高考，不参加任何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评比活动，周围的朋友对我的少数民族身份也不再好奇，土家族于我而言，只成为身份证上的一个“标记”而已。

王明珂的书中提到我的家乡，恩施的土家族贵族田氏家族是如何自称为“有虞氏”之后，而另一田姓家族，则自称“系出有熊，黄帝之苗裔也”。我并不清楚这些祖宗的历史建构如今是否仍然发挥作用，在我个人的家族史记忆中，我们的家谱与家族口述史反复强调的，不是来自于某个伟大的祖先，而只是简单的几句，“发源自湖北荆州，后经湖南石首移民到此地”。每当返回老家，看着那些同治年以来的祖先墓碑，我的心中常常涌起的是一种莫名的暖流，而绝非是什么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这个秋天，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关注过新闻。因为那些新闻除了日期是新的，标题、内容和语气都似曾相识，与“旧闻”无异。既然是旧闻，不如修旧如旧。于是，我回到古代中国。

在《礼记·乐记》里，我读到周代曾经上演纪念武王灭商的大型史诗歌舞剧《武》，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建国大业》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关于武王灭商，一直存在争议。孟子称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尚书》中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讲法提出质疑，他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怎么会出现雪白血红的惨状呢？可是，我们同样可以对孟子提出质疑，后人关于殷纣的了解，几乎都是来自周代，周代获得天命的自我叙述是否可信，值得讨论。对此，孔子师徒都有自己的看法。孔子称“吾从周”，但他不是无条件地追随周，而是以“郁郁乎文哉”为前提，他对《武》的乐评是“尽美矣，未尽善也”，为什么会这样，后人曾有解释，这是因为《武》中“多征伐之声”。这个评价似乎也可以用于德国的《意志的胜利》、朝鲜的《阿里郎》，某国的《某某》。扯远了，再回到孔子弟子子贡，他曾试图给纣王“翻案”，表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当然，他的“翻案”不是要把纣王从恶魔翻成天使，而是指纣未必有后人描述的那么糟糕，只是由于他的名声处于下风，“天下之恶皆归焉”。

我最近集中阅读的不是儒家，而是法家。这两年，一些中国学者大谈“中国模式”，我捏着鼻子读了几篇，没有看到什么创新之处，无非是法家“秦国模式”的旧调重弹。熊十力先生的《韩非子评论 与友人论张江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薄薄一册，盈盈一握，看似弱不禁风，但其中很多见解，如“清季迄于民国，知识之伦诵言远西法治者，辄辄想

韩非，妄臆其道与宪政有合也，此殆未尝读《韩非》书”，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坊间传闻张居正正在成为各级领袖的新欢，这里向他们推荐这本熊十力的小册子，张江陵即张居正。对熊十力感兴趣但是没有购买 980 元的《熊十力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的同志，可以购买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十力丛书”，前者属于“一次付清”，后者属于“分期付款”。“十力丛书”最近推出的有《读经示要》、《原儒》（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 7 月）、《体用论》、《熊十力论学书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 8 月）。2006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曾出版“熊十力别集”，由于装帧比较乡土，这里忽略。但需要提醒诸位的是，同样一本《读经示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定价是 32.8 元，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定价是 55 元。我对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打折能力颇有信心，照例按兵不动；如果诸位对自己的经济能力颇有信心，不妨先睹为快。

前面谈到周代的《建国大业》，我又想起《我，玛雅·普丽赛茨卡娅：“永远的天鹅”自传》（徐思跃译，三联书店，2009 年 9 月）。普丽赛茨卡娅是苏联芭蕾舞界的名旦，她笔下的 1949 年 12 月 21 日很不和谐，这一天斯大林 70 寿辰，12 月 21 日是苏联的“圣诞节”，可是她这样恶毒攻击：“地球上各大洲热心的共产主义者都怀着疯狂而卑鄙的热情，更为隆重地为这位残忍的暴君庆祝生日。每分每秒，受骗的劳动者被告知这天比基督的诞辰更加重要。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绞尽脑汁希望在这个闪亮的日子给人类的造福者送上惊喜。他们甚至创造了一座博物馆，专门用于献给这位至高无上领袖的礼物。报纸刊登了给‘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海洋一般的电报信件。人们竭尽所能屈从奉承，凸显自我，创造更多的字词和方法，更为狂热地舔舐独裁者那张长着麻子留着胡须的脸。诗人们写下颂诗，作曲家谱写乐曲，技艺精湛的织工编织地毯。艺术家梦想着在国家重大节庆的音乐会上演出。”这段文字多为控诉，不太符合我的美学趣味，但是看多了“尽美矣，未尽善矣”的演出，再看看这些“尽善矣，未尽美矣”的文字，可以起到中和的作用。

普丽赛茨卡娅还讲到自己曾为铁托、尼赫鲁、甘地等等等等表演过，但她接着特别表示，“想具体谈一位贵宾”，这位贵宾就是“东方人民的伟大舵手”。剧院准备奉上革命芭蕾舞剧《红罂粟花》，排练多日，突然改成《天鹅湖》。由于演出安全措施要做到天衣无缝，特别通行证会被无数次的查看，演员也不例外，普丽赛茨卡娅不得不把证件放在胸衣时，哪怕正在演出的时候。于是，普丽赛茨卡娅一边扮演“黑天鹅”，一边担心特别通行证从胸衣里飞出，被阻击手当成最新的爆炸装置。还好，这些并未发生，最后“东方人民的伟大舵手”将一大篮白色康乃馨送上舞台，普丽赛茨卡娅才明白《天鹅湖》是他的钦选，把红罂粟花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不是伟大舵手希望看到的。

与这本书类似的还有叶拉金的《驯服的艺术》（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4 月），这位移居美国的苏联小提琴手，在回首往事时，少了一些控诉，多了一点反讽。他讲到 1940 年夏苏联规定八小时工作制以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导演们忠实履行这一英明决策，在《叶夫根尼·奥涅金》里出演连斯基的演员遇到一个问题，他在第二幕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但这时仅仅工作了七个小时。为了执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导演要求他退场之后不能脱掉戏装，必须身着厚重的皮大衣和海狸皮帽静候全剧落幕。不管肖斯塔科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是普丽赛茨卡娅、叶拉金，这些音乐家和演员都对苏联有着深入的洞察。中国大陆的画家、导演、摄影家里不乏精英，唯独音乐家（摇滚歌手除外）和演员大都是“高雅的文盲”——希望这是我的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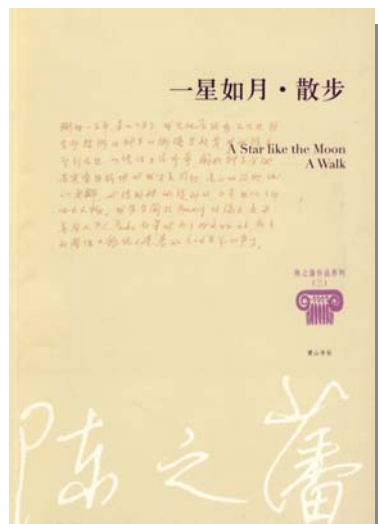
陈之藩先生的《一星如月·散步》（黄山书社，2009 年 6 月）充满删节的省略号，尽管如此，我还是买了一本。在删节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告知删节并且告知具体删节字数，属于编辑的美德，胜过不告而删。我对文人的趣味并无特别的反感，甚至有些认同，但是这几年也无特别的热爱，尤其对一些海上以及港台文艺中青年的风雅，很有一些腹诽。注意到这本书，是看到远在西域的贺卫方先生在博客上对此书的评价：

“书中显示作者早在 1970 年代就对于极权制度作出犀利的批判，对于某些人和组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直率的揭露。”陈之藩在大陆版序里讲到欧威尔的《百兽图》和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想来这就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哈耶克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显然，他不认为谈论政治会破坏文人趣味，而是认为具有独立的政治思考并且公开表达这种思考，



是拥有文人趣味的前提。陈之藩对朋友的评价，也与时下文艺中青年“互相打包推销”的方式截然不同，他这样评论杨振宁先生：“他虽背过全部的《孟子》，但并未咀嚼《孟子》中一些很特别的话。”我很同意这个评价，不知道杨振宁背诵的《孟子》是不是朱元璋时代删节的版本，所以才会见解如此有限。一篇一篇读下去，打算收齐一套四本的“陈之藩作品系列”。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就是编辑忙着删节，忘了给一些台湾译法加上注释，比如作者讲到《动物庄园》，有时是《百兽图》，有时是《兽畜农庄》，同一本书里有两种译法。

陈之藩是一个有着纯正文人趣味的科学家，这个传统曾经不绝如缕，在大陆却失传已久。湖南教育出版社的“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是一套被忽略的丛书，尽管主人公在各自领域具有深远影响，可是隔行如隔山，撼山易、撼学科边界难，人文读者对他们非常陌生，不会接触，科学爱好者又会觉得这与科学无关，仅是个人经历。这套丛书的学术史价值无可替代，挽救了很多濒临灭绝的记忆，遗憾的是，有更多的记忆在挽救过程中消失。丛书策划人告诉媒体，出版社曾列出了一张近 50 位访谈对象的名单，但在短短的 3 年时间里，黄昆、谈家桢、彭桓武、唐敖庆、刘东生、陈述彭、涂光炽、邹承鲁、席泽宗等先后辞世，还有一些因病无法接受访谈。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等到未来的科学家具有纯正的文人趣味。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HISTORY&CULTURE 文史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

对历史人物应该有“同情之理解”，下笔才能算得上公允，现在似乎已经成了常识，但知易行难，对那些素有分歧的人物，定评仍然不易。

以二战中的一段历史说，芭芭拉·塔奇曼 1972 年初版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新星出版社，2007 年 9 月）一书，通过研究史迪威的日记和文件，讲述史迪威与蒋介石从合作到分道扬镳的过程，扬史而抑蒋，让黄仁宇耿耿于怀。多年以后，黄利用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写了一本《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08 年 1 月），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花在分析史蒋冲突上，显然认为塔奇曼对蒋同情不足，以至于理解有误。



塔奇曼笔下史迪威让人印象深刻。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在专业领域的评价极高，刻苦、忍耐、有牺牲精神；他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不仅是因为作为驻华军官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也是真的相信中国应该、也有机会在现代世界恢复尊严。作为他的对立面，蒋介石代表了中国文化中腐朽的一面。他无知，狡诈而虚荣，缺乏管理能力，意志力不足，总是嫉妒真正有能力的人，因此不能和他们合作。

黄仁宇曾参加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眼中的史迪威虽然才德兼备，但并不像塔奇曼说的那样英明神武。他认为史迪威为人尖酸刻薄，对蒋介石素有成见，在二人的冲突中，应负有相当责任。史迪威虽然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通，对中国军政局势也确有洞察，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毕竟隔膜。黄仁宇尤其不认同塔奇曼对蒋的评价，认为如此不能解释中国历史的进程。如果蒋介石真是塔奇曼写的那个样子，或者说，塔奇曼描述的是蒋性格中的主导方面，他又何以成为四亿五千万人认可的政治领袖，并且领导中国与日军作战数年呢？

我读中学时是历史课代表，知道有个史迪威，其人形象模糊，介于帝国主义和盟军之间，蒋介石的形象则和塔奇曼女士笔下如出一辙。黄仁宇提出的问题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根本不存在，因为蒋介石从来走的是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路线，书上说，唯一主张抗战的中共在唯一英明神武的毛主席率领下，通过敌后游击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三种历史书对两个人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显得关键不是理解，而是同情。你同情谁，就理解谁。尤其是历史相去不远，

除了别有用心的利用，史家的感情投射，也会影响到批评的方向和结论。

从黄先生的大历史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材料是白费的，当今的局面必然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原因。譬如，蒋介石通过北伐建立的统一局面和“上层建筑”，通过抗战得到了巩固，最后又为共产党所接管；中共在根据地试验组织和动员农村社会的方法，为后来的快速工业化找到了出路；“剪刀差”为“改革开放”准备了物质条件；甚至，“四人帮”的疯狂也能反衬出邓小平现实和理性；等等。

大历史的逻辑链条看上去无懈可击，可惜落进了历史决定论的窠臼。既然历史必定如此，个人只是幕前的木偶，被看不见的历史之手操纵着，所作所为自然无可厚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情过度，和过分苛责一样，都会导致理解不足，尤其是在需要抉择的紧要关头，一句“别无选择”就抹杀了历史的偶然成分，也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

历史的乐观主义是黄仁宇这一代海外学人的共有特色之一。刚刚去世的唐德刚教授提出的“历史的三峡”论风靡一时，他的举重若轻的治史风范让人叹服，眼光自然是高的，但我常有疑惑：“历史的三峡”听上去明快轻盈，弹指间仿佛“轻舟已过万重山”，但一路上难道不是横躺着万千沉舟和遍野尸骸？沉舟侧畔，无视翻船落水的可能性，未免过于乐观主义。再说，即便不会翻船，如果高峡出平湖，在宜昌建大坝一座，所有船只能够通过窄窄的船闸出入，岂不是要误了唐先生说的2050年的归期？

“历史的三峡”论前些年流行一时，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著《毛泽东的最后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9年4月）中又提到一种近几年的流行说法：“文革”是毛试图寻找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作者也认可这种看法。尽管《毛泽东的最后革命》中文版序中说到：“把它（指‘文革十年历史’）‘传’给下一代是中国历史学界担负的重责，只不过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做到这点的现实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极而言之还完全没有成熟。”但和重视材料的历史学者的研究条件“完全没有成熟”适成对照，另一些学者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发扬这种看法，给予充分同情和十分理解，似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可以为一段还未定案的历史进行翻案。这乍一看是“同情之理解”，细看其实是古为今用的老把戏，对历史既无同情，更无理解，只有实用而已。



CINEMA 影像

观察员 言一（香港，richard7briner@gmail.com）

看完午夜场，怎样都觉得余兴未尽；想想自己为了看电影又是整整一天没好好吃饭。找了家茶餐厅坐下，忍不住还是翻起亚洲独立电影节的海报来。一翻之下，实在觉得香港是研究 contemporary film 的半个天堂。在短短的一个半个月之内，竟然集中呈现香港亚洲电影节，香港亚洲独立电影节，香港社会运动电影节，KINO09 德国电影节，而据可靠消息接下来还会有 IFVA(香港独立短片比赛)和法国电影节。这样的密集安排无疑让渴望一口吃成胖子的我纠结无比，念及学业压力和自己的其他打算，只能反复诵读林夕的歌词：多谢你，赠我空欢喜。

说来很巧，两次午夜场看的都是圆子温作品；而他，大概算得上此次亚洲电影节我的最大收获吧。尽管，单就他的处女作《自行车的叹息》而言确实很难给出较高评价，但从其中镜头的使用和叙事手法方面已然显出他的特别。表面上，《自行车的叹息》和日本许许多多的电影一样被

归类为疾走的青春，可这样的标签显然无法解释圆子温在其中安插的如同



圆子温

早期超现实主义电影一般的片断和那些极其古怪的意象(例如: 不断被倾倒在地球上作为标识的牛奶)。一旦联系圆子温后期的作品, 那么他独特的镜头运动方式和对粗质画面的审美偏好在我看来在此片中已初现端倪。

由于前述的空欢喜, 即便是圆子温, 我也没有办法看完他的所有作品。但仅就我看过的两部近期作品而言, 却无一不给我惊喜。在看《纪子之食桌》前, 我已看过三部电影, 精神上颇为倦怠。可自从影片的画外音响起, 纪子的自述便开始在忧郁音乐的陪伴下引领我前行, 迅速地将从疲惫中抽离。我想, 这也许就是本雅明所谓的: **perception by abstraction** 吧。严格说起来,

《纪子之食桌》一篇依然关乎青春, 情节的推进亦是基于青春期少女的叛逆出走, 但最终却通过对一个家庭如何面对出走, 以及出走少女之心理变迁的层层“解构”与放大, 刺向了被现代社会置于阴影中的不断流血的伤处。

也曾读过不少关于家庭的社会学著作, 但一直以来却喜欢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比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言下之意是把社会比作了肌体, 而肌体的健康有赖于细胞的健康。由此得出: 家庭的健康既利于家庭成员本身, 亦利于家庭所在之社会。可母亲也许不曾想到的是: 有时候作为细胞的家庭, 会被作为肌体的社会以某种理由牺牲掉, 就像那些为了抵抗入侵的白细胞。或者用阿多诺的说法: 当我们的社会不断向前进步(**progress**)的同时, 必须要面对不可抗拒的退行(**irresistible regression**---虑及当下的文化以及退行所带来的后果, 我其实很倾向于将 **regression** 译作潮语 “逆袭”)。每一次的社会变迁, 都有部分家庭为之承担其变迁成本, 而由于这成本的承担机制(**mechanism**)竟是如此隐蔽, 以至于不少都被当作了无常的悲剧。也许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将这样的悲剧看作一个社会变迁中的常数, 但当我们真正面临或者面对它们的时候, 都必将遭遇内心基于伦理的拷问。

现代的社会赋予我们各种各样的身份, 而我们的一生是否就只是扮演好这样的身份角色? 在剖析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的同时, 圆子温从未忘记从个人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疑问。借着片中不少人物的口吻, 圆子温一次又一次的问着: **Are you**



connected to yourself? 坦白讲, 在我看来这是一句难以翻译只能意会的提问。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提问的问题或许是: **Are you, and how you connect(ed) to the society?**

都说人生如戏。可是细细想来, 却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自身的角色与表演; 亦不是所有人都会去考虑剧本究竟出自何方, 角色能否掉换。大抵, 不少人都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看戏的人。

在《纪子之食桌》中鲜血淋漓的创痛, 到了《犯罪都市》(《Hazard》, 又译: 危险因素)当中却化作一种在空气中肆意激荡的危险的愉悦。我并非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 但看着片中不断出现的台词: **Sleepy, but restless Japan**。我不得不认为 Shin(主人公之一)对纽约, 对犯罪的享受, 其实是一种对给他带来创痛的(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死气沉沉之日本社会的逆袭。而在观影的彼时, 我亦十分好奇, 在座的香港观众在金融海啸的当下会不会在心底念出类似的台词: **Sleepy, but restless Hong Kong**。

圆子温的电影从来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在《纪子之食桌》当中将身份的构建与剥离推至一种极端刻骨的疼痛, 在《犯罪都市》中以一种近乎癫狂的节奏召唤出悄然流淌的诗意:

我坐下来俯视所有的悲伤

看着世上的痛苦之处

俯视所有苦恼和耻辱

我听到秘密在哭泣...

谁能想到, 在一个世纪之后, 惠特曼的幽灵就这样浮现在纽约西部的上空。对岸的曼哈顿, 高楼林立, 那里一定有人

俯视众生，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王。而此岸，Shin 坐在垃圾堆成的小山上，默默地检视自己隐秘的渴望。他以为：三个人一起奔跑，就一定可以飞翔。

尽管最后竹田在警察的枪下死去，Lee 也进了监狱，但圆子温毕竟让 Shin 留住了希望。我想：他一定知道慢镜头下的奔跑就像飞翔；他知道岸边那三个坐在垃圾堆边上用破伞遮雨的人或许才是这个世界的王；他还知道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有人坐下来检视这个世界的忧伤。

相比之下，不管是伍迪艾伦的《whatever works》还是李安的《胡士托风波》都显得像是一部色彩斑斓的写实之作。

许多人对于《胡士托风波》的不满，大抵是由于渴望看到 Woodstock 重现之希望落空。其实，我也是落空者之一。原本希望能在片中重温 Joan Baez, Janis Joplin 以及 Jimi Hendrix 的风采，哪怕是虚拟的也好，但李安自始至终就不曾将镜头在近距离对准过舞台。然而，我却因此更加喜欢李安(或是小说原作者)所选取的生活化视角，在我看来这当中有着一种颇为正面的所谓“解魅”(disenchantment)的作用。

在《胡士托》中，李安并没有像《海盗电台》那样去大力的宣扬一种价值观，构建一个乌托邦---尽管在当年，Woodstock 本身确实很接近于一个乌托邦---而是反复将镜头对准了那个叫 Elliot 的年轻人和他的父母，以及小镇的居民，敏锐地捕捉到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摇滚，对于 hippie，对于 Woodstock 的看法和反应。而人们，尤其是 Elliot 在 Woodstock 的筹办到结束这一过程中的转变，才是李安的重点所在。

一场摇滚音乐节的影响终究是有限的。它毕竟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内在逻辑)，哪怕这个音乐节叫 Woodstock。所谓的 love and peace, 也不过也就是三天而已。三天之后，人们依然需要去追逐 money。这一点，李安在影片之末借着 Michael Lang 的口把它说了个通透。可是，Woodstock 毕竟改变了 Elliot，也改变了后来的无数我们无从知晓的人的生活轨迹。换句话说，Woodstock 既意味着生活中的一种选择，亦可算作一件“弱者的武器”。

伍迪艾伦的《Whatever Works》一如既往的毒舌，只是这次显得更加直白。作为一部讽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喜剧，《Whatever Works》显然不辱使命，令人赏心悦目。可是一旦被当作伍迪艾伦的作者电影来看，却给人以小小的失望感。也许是我太不习惯张力的缺席。

比伍迪艾伦和李安更加写实的，自然要数杜海滨的《1428》。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可以敏感地从这个片名猜出影片的内容，而我也无需去证明人类是善于遗忘的动物。

诚如杜海滨所言，由于占有了太多的影像资料，剪辑时的取舍变得十分困难，《1428》的叙事线条也因此显得散乱无章。尽管如此，凭我个人的观感，还是可以大致梳理出以下三个视角：一是以一名精神病患者(outsider)的视角来看震灾和赈灾，二是以老百姓的视角来看自身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三是试图去呈现当地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包括其自身与自然以及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

然而这样的一种多视角呈现，并非出杜海滨自己事前的构想，而是深入灾区后做出的选择。事实上，由于地震灾区大多属于四川的农村地区。其中的社会网络可谓盘根错节，并不存在一种单纯的，想象中的老百姓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更多的时候是老百姓与地方政府，地方上的各种组织，各个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从而，若要想逼近不带预设的真实呈现，就必须采取一种多视角，多层面的拍摄视角。

在这样的拍摄视角之下，许多细节，甚至于杜海滨本身都成为一块块折射当今大陆社会结构的棱镜。在影片放映后的交流会上，面对在座观众有意或者无意的提问，杜海滨无法侃侃而谈，言语间呈现出不少保留和迂回。我相信有不少人对此是不满意的，于是他们渐次离开。只是，后来在影院附近的 café 再次见到杜海滨，此时的他方才处于一种坦诚的交流状态。一旁看书的我，恰好听见他和人谈起一个我在观影时亦十分留意的镜头：

一位老人家，站在正在修建的公路旁，讲述自己的父亲当年(在解放前)是如何来这里安家，如何在解放时分得房子和田地；而几十年后，自己又是如何在震后失去了分得的田地，如何即将面临失去仅有的宅基地。



其中的对比或是隐喻，不言自明。而导致杜海滨谈及自身作品时前后差异的缘由，我想亦是不言自明。

也许是由于在杜海滨的《1428》上太耗心力，在随后观看《马尼拉的日与夜》时，面对那颇具质感和冲击力十足的镜头，我竟是觉得有些疲惫，未能好好欣赏。但两大新晋导演的镜头风格(极易令人想起 40-60 年代的欧洲黑白电影)及其对爵士乐的唯美穿插实在是令人过目难忘，让我深感：往后要把目光多多投向东南亚的电影新作才行。

十月，已是秋意渐浓，越发地想要出去远足……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ENGLAND 英格兰

一段未完成的革命史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前几天重温了英国导演保罗·格林加斯拍摄的《血色星期天》(Bloody Sunday)，很奇怪自己当初为何仅仅把它当一部战争片来看待，后来又把它理解为一部政治题材片。其实，直到最近我才弄明白，除了像纪录片般上下晃动的镜头语言之外，对于1972年北爱尔兰德里(Derry)的血腥冲突，该片基本没能传达给我们任何有效信息：它的真相、它发生的社会背景、它对爱尔兰此后政治的走向有何种深远影响，所有这些元素都在电影胶片的背后保持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沉默。

而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经验，1972年不啻为爱尔兰现代政治史上最值得书写的一年。德里的流血事件过后，爱尔兰共和军

(IRA)开始了内部的派别分化。而在此之前，这个新芬党(Sinn Féin)的军事组织长期以武装斗争为纲，因而被英国政府目为恐怖组织。

1972年之后的爱尔兰共和军，就像《笑傲江湖》里的华山剑派分裂为“剑宗”和“气宗”两派一样，正式分裂为“正统”(Official IRA)和“临时”(Provisional IRA)两派。它们虽然同属共和军门下，但两派所持的政治主张可谓大相径庭。正统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者自居，宣称逐渐放弃恐怖主义活动，转向非暴力的政治斗争，用笔杆子和嘴皮子与英国政府周旋；而临时派则坚持极端的民族主义，继续恐怖活动，以枪杆子和定时炸弹同英国政府对抗。

但把共和军的分化简单归结为对流血事件的“反思”，显然是不够的。在企鹅爱尔兰分社新出版的《失去的革命：正统派爱尔兰共和军与工人党遗事》一书中，记录了同样是发生在1972的一个事件：这一年也是爱尔兰是否加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全民投票表决的一年。新芬党在爱尔兰国家电视台的帮助下，于都柏林建立了一个临时电台，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尔兰兄弟投出反对票。他们的宣传语是：“富人总是会背叛我们穷人。”

不消多说，“穷人”自然是爱尔兰人的自况，而“富人”，却不单是指西欧那些见利忘义的富裕国家。在《失去的革命》中，作者布莱恩·翰雷和斯科特·米勒道出了这个词更深远的含义：它可以用来指英国的“征服者”，还可以用来指英格兰的新教徒，甚至是更为广义的资产阶级。换句话说，新芬党和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野心不仅是“驱除鞑虏，恢复北爱”。在这

两位爱尔兰问题专家看来,在20世纪60年代,新芬党与共和军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驱动,他们认为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被纳入席卷了从古巴到越南的左翼国家解放运动之列。因此,共和军的内部分裂,与其说是因为“斗争方法”的分歧,不如说是保守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分道扬镳。而这种分歧,早在1969年底的新芬党党会上便已公开化。

据书中所载,共和军的领导人之一古尔丁(Cathal Goulding)钟情于社会革命,在1964年的时候,他与活跃于爱丁堡的左翼政治家雷·约翰斯顿(Ray Johnston)建立了密切往来。约翰斯顿当时正醉心于古巴革命和阿尔及利亚的抗法斗争,这两个国家推翻殖民者统治的经验让他与古尔丁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爱尔兰全境获得独立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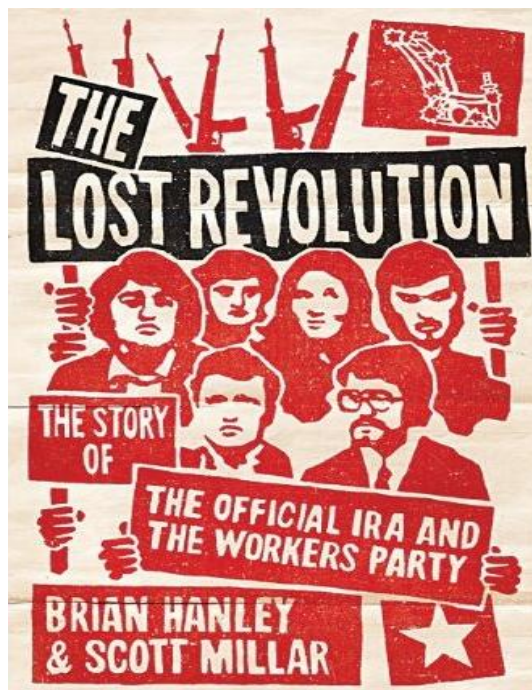
于是,古尔丁开始了对共和军成员的“思想改造”。在他的主导下,共和军在1965年建立了政教部,并在全爱尔兰境内建立了将近50处训练营,训练的内容除了涉及军事之外,还有关于爱尔兰历史、世界革命等等内容的讲座。虽然此时的爱尔兰共和军只是“文武双修”而非“偃武修文”,但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足以被爱尔兰政府视作洪水猛兽,受到打压。对比之下,在那个人人对社会主义噤若寒蝉的冷战时代,临时派共和军所坚持的武装斗争反而显得没那么出格、那么令人紧张了。

其实从1170年英王亨利二世武力征服爱尔兰开始,爱尔兰人的独立运动就一直未停歇过,除了民族主义作祟之外,更重要的还有那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爱尔兰天主教徒们长期以来视北部占多数的新教徒为异类。这些移民而来的英格兰人长期把持着地方议会,垄断地区经济,可谓占据着“异教徒”和“资产阶级”的双重身份。

考虑到爱尔兰独特的“阶级现实”,古尔丁与另一位政治家希恩·加兰德(Sean Garland)将六七十年代之交分裂后的一部分新芬党资源重新组建,成立了爱尔兰工人党,继续着他们的革命理想。但他们也深知,要想让爱尔兰独立运动由实际上并未成功的“共和运动”变成一场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纯粹社会运动,必须要摒除其中夹杂着的那些阴郁的宗教情结。

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正统派共和军与工人党才如此卖力地鼓吹他们非暴力的政治理念,尽量将自己与临时派区隔开。《失去的革命》对于正统派的政治目标这样总结道:“他们想要建立一个宗教派别之外的阶级运动,从而真正保护爱尔兰的工人阶级。最终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完整的32郡县共和国,而非一个天主教共和国。”但遗憾的是,这个目标到今天依然没有实现。

对于革命缘何“未竟全功”,此书的两位作者也未能给出定论。不过,对于人员构成如此复杂的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来说,自身的许多理念实际上都无法彻底贯彻,例如在“血色星期天”后宣布放弃暴力活动的正统派,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仍然策划了多次恐怖爆炸。而本来就一直无法在爱尔兰国内形成气候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苏东剧变和柏林墙倒塌之后更是四分五裂,共和军“革命”的一面最终消退。直到2005年7月,共和军在政府授意下正式弃械,终止武装斗争之时,其实仍然暗中重操旧业,策划着恐怖活动。放弃了数十年前社会革命原则的他们,又重新拿起枪,实践着当初的革命目标。看来,文绉绉式的革命通常只能充当历史故事中的过往云烟,武装与暴力却不会。



Brian Hanley & Scott Millar: *The Lost Revolution: The Story of the Official IRA and the Workers' Party*, Penguin Ireland, 2009年9月

HONGKONG 香港

三年零八个月，往事并不如烟

特约撰稿人 严飞 (美国·旧金山, fredyan@gmail.com)

香港的日治时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统治香港的时期，始于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投降，结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段沦陷期，被香港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年零八个月”。

毫无疑问，日治时代是香港历史中最为黑暗的一页、香港人所渡过最痛苦的一段岁月。日本占领香港，是为了达成它征服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野心，成为与西方强国势力等等的殖民地统治者。1942年2月，日本当局在香港成立总督部，就明确表示香港的主要用途是作为补给日本军队的军事基地，并将香港归纳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一部份。

在这段时期里，日本为宣扬大东亚共荣圈，无暇顾及教育的发展，致使香港教育几乎停顿，中小学校数目大减，学生人数也从1941年的11万2千多人，锐减至1945年的约3000人，绝大部分学童被迫失学，他们或辗转流亡千里，或设法谋生生活，并时刻面临死亡、饥饿、疾病、轰炸、酷刑等威胁。



沦陷时期的香港教育，明显带有奴化色彩。当时日军对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管辖地区，设立文教课，并编订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新教科书，强令学校采用。同时，日军又大力推动日语教学，规定原有的英文学校禁止使用英语，必须教授日语，并专门成立“日语教育养成所”，培训日语教员，企图以日本文化塑造香港年轻人，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以加强对他们的殖民统治。

对于这段日治时期香港学童教育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较为匮乏，无论是在官方诸多“香港史”书籍的著述中，还是在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的展览中，都过多地关注于“从十一万到三千”两个前后反

差巨大的数字之间的对比上，而缺乏立体的书写。

而这本口述历史著作，则独辟稀径，采用口述访谈的方式，真实还原和再现了十八位老香港于日治沦陷时期的个人教育经历和感受。这十八位受访者中，战前有就读中式私塾的，也有就读英式教会学校。香港沦陷之后，有些人逃到内地继续学业，甚或参加抗日游击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有些人则留在香港继续学业、或当学徒，半工半读；也有辍学谋生，直至战后才复学。他们的共性，就是都曾亲历过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并曾于沦陷前后在香港求学或任教。他们的口述篇章，不仅帮助我们有机会重温香港沦陷前后的社会状况及教育情景，也是对香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补充。

这些经历“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沦陷苦难岁月的小人物，从他们口述中，可以发现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一些极易被忽略的细节。有趣的是，这些细节，又因为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及成长背景差异，而会产生对整个社群或者社会经历迥然相异的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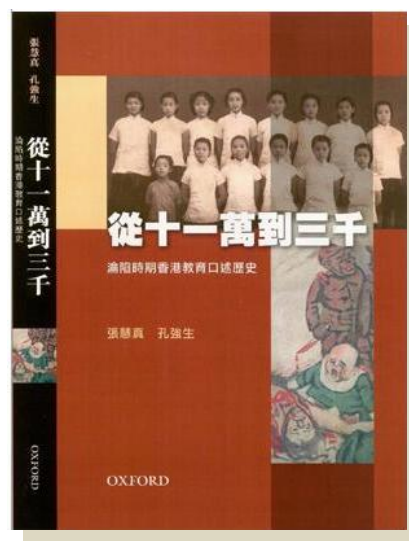
以看待占领香港的日军和接受日文教育为例，曾经参加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的两位口述者，因为身处远离港岛中心地带的新界，地理位置上的偏僻使得他们有机会经常接触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从而很小便激发起一份自觉而强烈的爱国情怀——“游击队在各村内展开文化和教育活动，按年龄成立不同的活动组别，如儿童团、青年团、民工队、妇女会和青年会”。他们将对侵略者的憎恨化做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主动投身游击队，其中一位口述者蔡松英，更是两次背着父母“离家”，联络抗日组织，另一位口述者刘锦文，则主动担任国文教育工作，“教书以外，也会向学生讲日本侵华的情况，如日军如何在中国奸淫掳掠、残害中国人等，希望提高学生的爱国心”。而居住在九龙或者港岛市区的口述者，则对侵略者又有另一番

描述,按照口述者彭永福的回忆,“因为香港没有经历南京大屠杀等残忍事情,抗日情绪也不太强烈,对于日军也不太反感,甚至有人认为日军军官尚算有礼。”在他们看来,学习日文是当时的“潮流”,是为求生存的一种安全保障,香港市区内也开办了多间日语学校,有些是自己主动找私立学校读日文(如口述者麦淑坚),有些是跟随在日军管治企业下做工的亲戚或者友人学习日文(如口述者黄子玲),有些则是被派往日军专门开设的“日语教育养成所”接受日文培训(如口述者谭月华),更多的则是在日本奴化侵略政策下在学校里强迫接受日文教育(如口述者李崇健)。在他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如下的回忆,“那个日本兵有时会来我家,看看我们打麻雀。他说起打仗的情况,说时也在流泪”(口述者黄子玲);“我感受到地道的日本人也算不错,他们较为温文,还肯实际教导我们,但相反那些日本籍的台湾人则不太友善”(口述者麦穗林);“我们住的太子道、公爵街一带,也有不少日本人居住,觉得有些日本人还不错。那些有配剑的大军官较有礼貌,不会随便骚扰我们”(口述者彭秀欢);“教我们日文的老师又仁慈又可爱,他们温文有礼,课堂上和我们点头,也会除下大衣上课”(口述者谭月华)。

这些对同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认知上的差异,正是口述历史最为珍贵的地方。个人口述历史的内容,往往是如实记录当事人亲身体验的生活和经历。在当事人讲故事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在表达种种带有主观色彩的思想、观念,以及他对历史事件的自我反思。因此,在同一历史阶段中,不同人物的口述历史,就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视野。而当我们将这些不同视野的故事放在一起观看和比照时,就会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有着更多层次、更多角度的体会。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口述历史虽然可以弥补大历史的不足,但它终究也是一种研究方法,无法避免历史学家在采访过程中既有的偏见或者想象,从而丢失历史原本应有的真实。在本书中,虽然这十八位受访者的口述被直接记录下来,但书中流畅而充满文学色彩的语句却常常给人以一种“非口述”的错觉。例如,“我最喜爱‘新女性’这首歌,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女性面对挑战,但仍坚强独立的个性,这首歌亦成了我一生的激励”(口述者李妙卿);“西贡面海背山,海岸线长,林茂水秀,环境非常幽静。乡村星散,村民淳朴厚道”(口述者刘锦文);“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聘请了不少国际知名的学者。大学本部在遵义,师范学院及附中在湄潭”(口述者黄澎芬)。因此,如何甄别“主诉真实”和“客观真实”,这本书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张慧真、孔强生:《从十一万到三千:沦陷时期香港教育口述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5年7月



BOOKLIST 书单

成庆

在读:

张大春:《认得几个字》,上海出版集团,2009年8月,定价:46元

待读:

韩华:《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12月,定价22元

[美] Allan Janik and Stephen Edelson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Ivan R. Dee,

Publisher, September 25, 1996

贾蓓

已读:

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32元

石之瑜:《中国的民族问题》,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5月,450NTD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忆(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年11月,22元



在读:

宋月红:《张经武与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68元

羽良

已读:

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月,29.8元

在读:

尼可拉斯·卢曼:《社会的经济》,余瑞先 郑伊倩 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45元



言一

在读:

[美] 理查·桑内特:《再会吧!公共人》,万毓译,群学出版社 /国立编译馆,500TWD

严飞

已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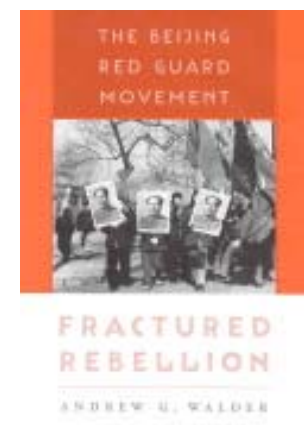
刘国凯:《封杀不了的历史》(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丛书 第一辑),刘长青(香港),1996年12月版

[美] Andrew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10月

在读:

林蕴晖:《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钱理群:《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刁莹

已读:

[美] *The Razor's Edge*, Somerset Maugham, The Vanguard Library, 1952

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界出版社(香港) 2009年5月,128港元

在读:

[美] *Capitalism and Freedom*, Milton Fried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美] *Love of Life*, Jack London, Mills & Boon Limited, 1928

[美]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Lin Yutang,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6

[美] *Long Walk to Freedom*, Nelson Mandel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美] *The Elements of Style*, William Strunk Jr.,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1959



BOOK 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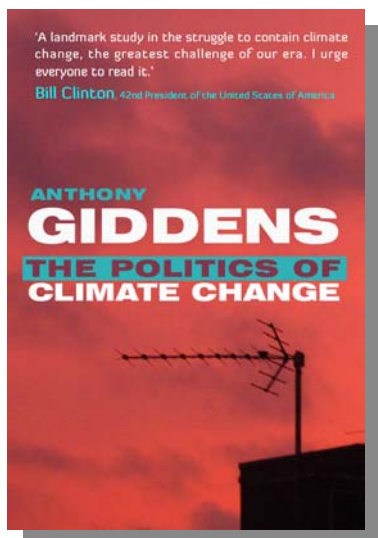
欧洲的气候政治版图

特约撰稿人 吴强（北京，qiangwu.de@googlemail.com）

政治本来是一个很容易僵化的领域。从古至今，纵有无尽的技巧或艺术，到最后，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中，在多少帝王将相眼里，在今天的中土政治家、哲学家们看来，都难免被归结为统治的方术、或者敌我之分这样简单的原则，围绕着如何权力分配而利用人类的一切资源。这种政治真是缺乏想象力，用俞可平老师的话说，就是政治文明差矣。对其他政治体的观察则很难逃脱窠臼，比如对美国政治的洞察止于三权分立，忽略了其中人类政治文明几千年的积累；对欧洲政治，也不屑地用乌托邦来形容，或者跟随美国右翼的眼光视之以“老欧洲”。

但是，过去十几年间，欧盟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这个老欧洲却开始展现一个新政治气象：从提出“第三条道路”，到武力解决巴尔干冲突，再到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然后出兵阿富汗，老欧洲左右逢源、东扩中见统一、争吵中现共识。其中，在世界政治舞台最耀眼的莫过于欧洲关于气候政治的主张，屡屡在联合国大会、G8 峰会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活动中引领潮流、主导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将欧洲等同于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代理人。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以下简称《气候》），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学



所谓气候政治，在吉登斯看来，是关于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和风险管理（《气候》，P.7）。这一提法相当合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假说，也是两人早期对“反思性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后果”所作分别思考的一个交集。因此，不难想见，在贝克正式提出“风险社会”（1992）概念十七年后，吉登斯的气候政治不啻为一个贝克式“世界风险社会”（1998）的实例，充满了新欧洲的世界主义情怀。吉登斯的这本新书也因此得到贝克“高度原创性”的赞誉。

不过，吉登斯所强调的气候变化还包括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风险通常是可计算发生概率的，而气候变化还带来极高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超出了直接或间接经验的认识——对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因为其方法论基础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而拒绝考虑气候变化对人类环境和生存引致的巨大不确定性。如此不确定性，并非因为全球变暖只是一个科学假说而存疑，而是基于今天的世界市场和民主体制的系统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市场资本主义所驱动的过分消费和利益集团对民主的绑架的结果。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吉登斯的气候政治学评价更高，认为吉登斯的新著是遏制气候变化斗争的一个里程碑。相比贝克的吹捧，克林顿的评价抓住了当前全球气候政治的要害，也是吉登斯所代表的欧洲气候政治主张——气候改变所带来的是世界政治的改变，世界政治将不再被石油所决定。这或是传统地缘政治的终结，也是对现代性反思之后的新政治或者贝克鼓吹的世界主义政治。

更重要的，吉登斯指出了新政治的两个新民主特性：一方面，民主体制在气候变化面前并未完全失败，因为民主之下社会运动、环保压力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动员是可能而且有效的，深刻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向。美国戈尔前副总统被尊称为北美的气候政治领袖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戈尔本人在环境问题上的特殊魅力，而是表明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的结合。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所要求的风险管理要求政府担当起更多的“计划”任务，对发生碳排放的企业和个人、生产和消费活动做到精确计划和管理，进而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有关碳排放的计划和管理。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碳排放”国家来说（相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问题不在于人均碳排放的多少，而在于政府对所有碳排放单位的控制能力，这一难度大大超过所谓国家治理能力或者地方治理能力的范畴，堪称“碳治理”能力，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具体包括：

- 超前思考；

- 管理气候变化和能源风险；
- 促进政治和经济的集中；
- 干预市场将污染付费制度化；
- 反制阻碍环境政策的商业利益；
- 将气候变化置于政治议程之首；
- 发展适合低碳经济的经济和财政框架；
- 防备气候变化后果；
- 整合地方、地区、国家和国际间的气候变化政策。

简而言之，气候政治双重代理人的民主特质——即环境运动和民族国家碳治理——要求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气候新政”，要求对世界民主体系进行重新协商和规划。吉登斯本人坦言反对单纯的环保主义，而更愿意谈论绿色之后，即强调第三世界的发展和公平，强调市场交易对减排的积极作用，他的经济集中主张也更有利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更有利于集中进行减碳控制。

欧洲则因同时具备环境运动和超民族国家的双重代理人角色而在全球气候新政中独具特殊地位，如同吉登斯称气候政治本身“超越左和右”而被各欧洲党派接受，言下之意，欧洲的气候政治主张也可能超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成为世界主义的气候政治共识。

当然，吉登斯自己也承认，如果不算欧盟本身，真正将环境和气候列入政治议程中心的国家，只有瑞典和德国。而欧盟历史上，在 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将环境政策作为独立一章(第十六章)之前，1957 年的罗马公约并未触及环境问题，1972 年斯德哥尔摩大会上环境主张最为激进的并不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是日本、美国和瑞典。事实上，在欧盟成为世界气候政治的代理人之前，环境运动扮演着绿色政治的主要角色。

欧洲的绿色政治版图

1973 年的中东石油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能源危机和经济滞涨引发了欧洲的环境主义浪潮，最终演化为今天欧洲关于气候变化的绿色政治版图。这个浪潮最初包括了三个平行部分：一，以罗马俱乐部报告为代表的新生态主义开始影响知识界和精英的环境意识；二，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开始积极推行环保政策；三，1968 年“5 月风暴”之后学生运动向环保运动的转型。其中，尤以后者影响最广，在全欧洲范围内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形态，从个别环保先驱国家开始演成欧洲特色的绿色政治，并最终形成吉登斯所代表的新欧洲环境主义。

欧洲的学生运动作为环保运动的前身，兴起于 1950 年代末的德国，在 1968 年发展为反越战、反帝国主义的“5 月风暴”，从行动中开始反思威权父辈所代表的现代性。高潮退后，学生运动中的极端组织转型为红军派之类的学生暴力运动，而主体则在 1970 年代初转型为新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包括反核运动在内的环境运动等等。在 1983 年美国在德国开始部署潘兴 II 式导弹后，以反核为中心的环境运动发展到一个高峰，到 1986 年，德国和法国的反核抗议活动和参加群众比例激增，创造了 80 年代的最高纪录。

这些运动有着共同的学运背景和网络。68 学运培养了整整一代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他们为后来的环境运动提供了主要的领导和干部，他们常常也是其他新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支持者。而以认同为中心的新社会运动在这个阶段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网络联系和社运组织，成为后来全球公民社会和新国际主义的基础。正是在环境运动的新国际主义的意义上，环



境运动当中的激进主义才得以与温和组织平行不悖(Ibid)，维持着运动的活力，也被公众容忍，呈现出绿色化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和传播方式。

同时，整个八十年代，当主流政治趋向保守化，主流政党不愿意面对环境议题，如撒切尔政府曾经公开表示对环境运动的敌意，欧洲的环保团体在公众面前持续坚持其环保主张，其激进的反核立场背后嵌入着对冷战秩序下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不满。这一立场和传播方式影响深远，重新凝聚起 60 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参加者或同情者。1985 年有人估计，大约有一千万西欧人属于一个或多个环保团体，而参加地方环境运动活动的人数规模则有两、三倍以上(Dalton, 1993: 64)。

由绿而党

这一背景下，环境运动也走向了制度化：一方面，各类环境组织，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等，逐渐大型化和国际化。在布鲁塞尔，四家大型环境 NGO——地球之友欧洲总协调(CEAT)、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Greenpeace)和欧洲环境局(EEB)——已经成为布鲁塞尔最重要的四大环境游说组织。除了绿色和平拒绝，另外三家组织均得到欧盟的财政支持，尤其是广泛代表欧洲各国环境组织的“伞形体”欧洲环境局，是在欧洲共同体积极鼓励下于 1974 年创立，长期以来欧盟是其核心支持者。在欧洲政治层面，欧盟与环境组织保持着如此紧密和交互的财政和游说关系，分别互为环境主义和欧洲一体化社会政治层面的代理人。

另一方面，环境运动组织纷纷联合并参加地方竞选，积极参加地方和全国选举，联合之后的环境运动组织也纷纷改名或被视为绿党，成为 1990 年代以来欧洲政治版图中最为活跃的新兴政治力量。与威权体制下的环境 NGO 通常的“绿而不党”的去政治化选择相反，民主体制下政党来源于自由结社，只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变化而区别于普通协会，即是否推出选举候选人参与开放的公职竞选。因此，对欧洲的环境运动和组织来说，是否结党的转变只在于选择街头还是议会作为他们的意见表达场所的区别，并无任何法律或者政治的障碍，而后者无疑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动员，只需要环境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的转变。环境运动因而相当程度上不再是一个运动，而更像一个广泛的“公共利益共同体”(Bosso, 2000: 73)。1985 年，刚刚加入新成立的德国绿党不久的菲舍尔参选成功，被任命为黑森州环境部长，也是德国绿党取得的第一个公职。



Anthony Giddens

这一转型得益于冷战加剧：美苏的核对峙既促进了欧洲反核运动的兴起，也时刻提醒这些昔日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东方共产主义的距离，而选择了与资本主义体制合作的方式，即社会民主道路，参加议会选举，在主流政治内部表达绿色政治的声音。Roots 等人对欧洲七国所作的经验研究也表明，环境运动的制度化转型包括成立绿党是成功的：1990 年代之后欧洲的公众和公共舆论已经完全接受了环境主义，尽管抗议示威事件相比 80 年代有所下降，但公众意见却成为环境运动最重要的资源，环境运动并未随着运动的制度化而衰退(Roots, 2003a: 7; 2003b: 255)。绿党通过领导环境运动对公众意见保持着超出其选票数量的巨大影响力。

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并不表明环境运动正在丧失其动员基础，以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90 年代初期动员程度降至极低水平的法国为例，90 年代后期以来的环境抗议事件却呈上升趋势。各国绿党所获支持也稳步上升，在 1994 年的大选中，德国绿党成长为第三大党；最早于 1981 年就进入议会的比利时两个分别代表不同语区的绿党在 1999 年共赢得 14.3% 的选票。绿色政治的第三阶段转型终于在 1990

年代的中后期取得突破：芬兰的“绿色联盟”于 1995 年进入内阁，开创了欧洲绿党参政的先例；之后，德国绿党 1998 年加入与社民党的联合执政，直到 2005 年；法国绿党也于 1997 年加入执政的中左联合政府，而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竟获得 16% 的选票，与社会党(17%)相当。

尽管欧洲各国绿党在各类大选所获选票超过 10% 的时候并不常见，但是，在欧洲大陆普遍的多党制体制下，绿党的作用举足轻重，并影响欧盟的环境政策。到上世纪末，欧盟的四个主要成员国有三个均由绿党籍政客出任环境部长(德、法、意)，并参加欧盟理事会的环境部长会议，左右着欧盟的环境政策。几乎所有绿党，除了爱尔兰和瑞典的绿党，都修正了早

先的欧洲怀疑主义政策；那些大的绿党，如奥地利、德国、荷兰、芬兰、法国等的，也都因为选举的成功转而极力宣称他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把欧洲当作他们的一个新的乌托邦(Hooghe, et al., 2004: 138,139)。环境问题也因此最近的十年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政策，作为增加欧洲一体化合法性、获取公众支持的重要资源。

先驱国家

一旦环境意识通过环境运动得以普及大众并且成为跨党派的政治共识，即如吉登斯所列举的环境进入政治领域中心的瑞典和德国，这一绿色政治进程不会满足于仅仅居于国内政治的中心，还有着强烈的向外输出绿色政治的要求，就像今天的欧洲政治向外输出绿色政策。

比如瑞典，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最先启动了石油能源替代计划，到1980年代初瑞典的石油消耗占全部能源的比例下降到将近50%，并计划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个非石油经济体。作为欧洲的环境先驱，瑞典不仅带动了北欧国家的环保政策，四个北欧国家的环境指数长期排在全球最高位，其绿色政策甚至左右了国民是否加入欧盟的选择，也极大影响了加入之后的欧盟环境政策。

在1995年与芬兰和奥地利一道加入欧盟后，改变了欧盟内部的环境力量格局，连同原先的“先锋”成员德国、荷兰和丹麦，形成了一个“绿色集团”，也第一次改变了欧盟理事会的一致同意准则，在环境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特定多数决。这使得在环境领域加速消除那些环境“后进”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国的态度差异成为可能。虽然到那时为止，欧盟并无关于环境保护的共同基础，但是环境政策的国别差异显然会为自由贸易增加新的壁垒，而消除此类差异正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标。结果之一，1970年代以来争吵不休的汽车排放规制在整个1990年代几乎没有遭到成员国的反对，争论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了汽车制造商和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之间。

对瑞典政府和绿党来说，他们加入欧盟的最低纲领是要求欧盟的环境政策起码要与他们的国内政策一致，在加入欧盟前夕的公投中各政党甚至以促进环境保护的承诺来换取瑞典公民的支持。瑞典的“领先-协商”模式在吉登斯的气候变化政治中甚至居于核心，被用作扩展其领先的欧洲环境政策与世界协商的模本，符合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意义上“符合理性的可接受结果的预期”。也就是说，现行欧盟的气候政策很大程度上只是瑞典过去环境政策的翻版，并且基于瑞典现在的气候政策而提出欧洲未来的政策。瑞典的碳税经验，例如，正继其减少石油消耗比例之后，受到吉登斯的高度推崇。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征收碳税的国家，瑞典的碳税虽然税率不高，但具有普遍的约束作用。以芬兰为例，相比2000年的排放水平，二氧化碳税的减排效果大约为2到3个百分点；瑞典、挪威和冰岛的效果更明显，约3到4个百分点；而丹麦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则出现了绝对下降。这些环保先锋国家减排政策的成功为欧盟制定自身的减排目标提供了依据，也为欧盟的气候政治主张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乌托邦模式，即通过普遍的碳税来实现减排是有效可行的。相对现有其他鼓励减排的措施，碳税因其公平性而有较强的约束力，起到其他税种所难以达到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结果。

至此，从上述欧洲绿色政治版图变迁的勾勒中，我们发现：吉登斯“气候新政”的新环境主义经历了绿色政治的不同发展过程，绿党、环境先驱国家和欧盟先后担当着环境运动和环境主义的代理人角色，将环境运动“欧洲化”(Europeanization)并进而追求其世界化(Cosmopolitization)。

吉登斯的气候变化的政治学也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居于欧洲公共政治领域中心的环境/气候政策向世界主义气候政治的扩展，即：环境运动的兴起和吸纳体现了现代性政治的反思，而因应气候变化所必须做出的调整即此反思性的政治，欧洲也因气候政治而成为新欧洲，并把21世纪的全球政治规划为一个气候政治为中心的新政治。

(该文以“气候政治：老欧洲的新世界主义”载于《文化纵横》2009年11期)

Giddens, Anthony (2009):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OK REVIEW 书评

洋人的“新左派”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 (上海, sunchuanzhao@yahoo.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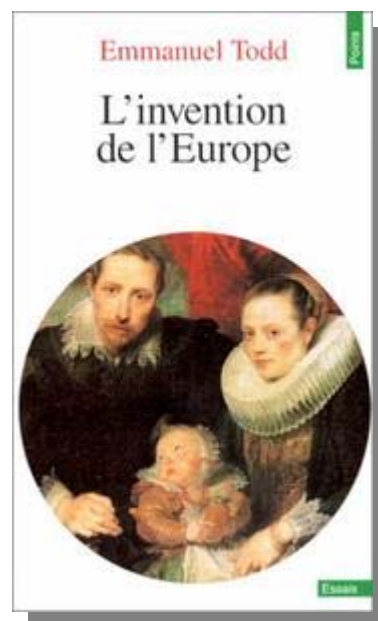


Emmanuel Todd

不合中国学人胃口，人们懒得提起他；也许因为读过他主要学术著作的中国读者依然寥寥。

其实，要说“反美”，托德在法国人文学科学者中“反美”的历史也算得上悠久的。1990年代笔者借助追随托德的“粉丝”石崎晴己等人的及时翻译，读其有趣的学术著作《新发现的欧洲》（*L'invention de l'Europe*）、《世界的多样性》（*La Diversité Monde*）、《第三行星》和《世界的童年期》两部著作合起来的新版）、《移民的命运》（*Le Destin des Immigrés*）等著作（日文版）时，就感到，他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非平等型的核家族形态（家长对子女不取权威态度，儿子之间继承权不平等。这种历史上家族形态的民族进入了近代，也侧重于追求自由）与法国北部地域的平等型核家族形态（家长对子女不取权威态度，儿子之间继承权平等。这种人类学上的家族形态的民族，即使进入了近代，也侧重于追求平等）两者之间，对后者有所偏好——著述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样倾向。我想这并非只是因为托德作为一个法国人（尽管有犹太血统）的民族感情在无意识中流露出来，而是当时他已经觉得在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那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追求“平等”也是不能忘记，仍旧要强调、提醒的。所以，可见并非是在“9·11”以后，美国对阿富汗、萨特姆采取军事行动后，托德“反美”言论高昂起来，1998年，他在《经济幻想》（*L'illusion économique*）一书中，也已经严词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出其不良后果、要求适度的世界规模自由贸易等——明显反美的言说。10年后的《帝国以后》只是援引更多最新事例和数据，补充《经济幻想》中的那些基本观点。如果说托德1970年代25岁时在处女作《最后的崩溃》中，根据婴儿的高死亡率预言苏联的体制在20年内、最迟不过30年瓦解，（笔者不喜欢历史学家做什么预言，尽管爱读托德的书，读遍其所有的日文版，也不赞成预言。我与许多批判托德的家族形态决定论的人一样，肯定其论说、大量例证可以证实历史，但对其阐释现实和预言未来是持异议的）那么，他在《经济幻想》中，也有许多前瞻性论断或独创性分析。比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从巨大出口国转化为进口国家，所以与西方国家之间贸易不均衡是短时期的。托德认为这种预测的推理是建立在两个错误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前提是，随着经济生产水平发展，大众识字率提高，必然会导致大众福利改善和不同阶层消费民主化。托德认为这种假设，在难以从极权主义社会中解脱出来，还处于腐败阶级支配的社会中只是一种神话、是不现实的。第二个前提，是西方经济学家期待中国沿海地区带动内地经济均衡发展，普遍提高消费水平。托德认为，只有在直系家族型的社会（德、日、瑞典）历史上，才有过这种经济发展的经验。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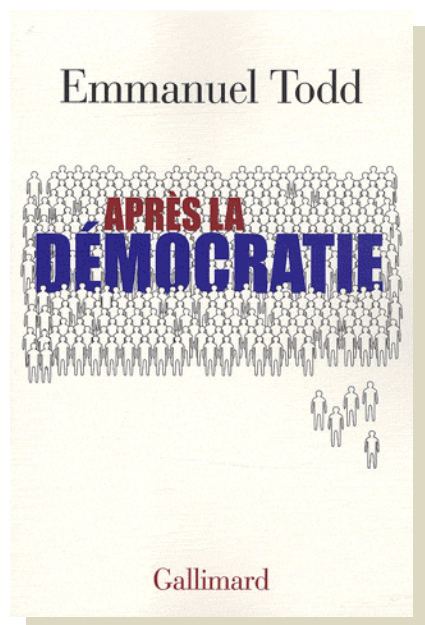
本来随着埃马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的学术成熟、著作等身、积极参与社会公共政治讨论、在法国和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力的日益增长，今天中国学者理应熟悉或了解他的学术著作和时论。尽管2003年，旅法学者陈彦在《从美国威胁论到美国崩溃论》一文中，不仅介绍过托德《帝国以后》（*Après L'Empire*, 2002）及该书中预言美国已经走向衰弱的结论，也略微言及托德以往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继承了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托德也曾明确告诉世人，人文学者应该干预现实政治，抨击现实生活中的邪恶是知识分子责任。托德在众多“时论”中，对国际现实政治、政治界的批判时，反美也直截了当、口无遮拦，照理应该得到中国读书人的欢迎，特别“左派”知识分子欢迎（中国读书人，对学理性、学术性的文字不感兴趣，与拉丁族读书人一样，热衷于撰写议政的时论，也容易提高知名度，引起马太效应）。但是，六年后的今天，遗憾得很，埃马纽尔·托德在中国学术界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也许因为托德的学术和时论都



管中国巨大内需市场在《经济幻想》问世十年后的今天还具有活力，但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至今并没有显著改善。书中，托德还有一个分析也很有趣，托德谈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导致英国、法国贫富差别扩大，但是又说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导致不同社会的变化却又各不相同。他说，历史上，马克思曾在《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政变》、《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以1848到1871法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引发的政治斗争来论述阶级斗争学说，而这所谓“阶级斗争”正反映了法国北部地域核家族的平等主义价值观——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认为自己应该与贵族是平等的，到了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要追求自己与资产阶级享有平等权利。这样对不平等的挑战、对平等的追求，导致1850年阶级斗争盛行的法国工厂里几乎找不到真正的无产阶级。1849年起马克思在伦敦着手写《资本论》，确实英国资本主义产业正在产生大量的无产阶级，但是在这个生产煤和铁的岛国，不见暴力性的政治对抗——缺乏阶级斗争——英国无产阶级默认阶级不平等的差别。因此，马克思在英国了解了资本主义，在法国把握了阶级斗争。同样，在20世纪末，同样工薪阶级生活水平下降，法国时时出现盎格鲁·萨克逊家族型英国、美国少见的罢工，英、美庶民习惯经济上的不平等，人类学家族型对信仰的影响力具有久远的惯性。

《帝国以后》以后，托德是否继续反美？在一篇题为《美国帝国的瓦解——体制的东方与西方、日本与德国比较》文章中，他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反美作过解释。

托德在该文中说，自己决不是为了反美写这本书的，又承认这本书的体系上确实是反美主义，但是自己并不认为美国历史上就是恶的根源、本质上是邪恶的。从个人现实经历来说，自己家族许多人二战后把美国作为自己祖国，生活在这个民主主义国家里。二战期间它为世界投入了光明，战后又帮助欧洲和许多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重建。到冷战结束为止，他与两种极权主义体制针锋相对，捍卫了世界的民主主义。但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民主主义在全球已经难以逆转的情势下，美国自身反而成了世界不安定因素之一。在当今全球向民主主义的过渡期，虽然还存在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和暴力，但因为伊斯兰世界的识字率和控制生育表明，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主主义也在确实成长，不持有具有威胁力的军事力量，我们必须耐心地与它对话和等待。至于为何预言美国走向衰弱？他简练地概括《帝国以后》观点之后，如是说明：一方面经济上对外贸易局大赤字，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全球金融资本流入美国，填补贸易与财政赤字，对外金融资本依赖，已经自我边缘化——这样经济基础有其脆弱的地方。托德，也不喜欢侯赛因这样独裁政权，但其没有对全世界威胁力量，所以认为美国的“象征性反恐战争”只是一种表演，用军事力量优势表明美国强大的存在。



如果说《帝国以后》主要是“反美”，那么2008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以后》（*Après la démocratie*）主要是把批判矛头对准法国内部的萨科奇体制，指责萨科奇执政继续维护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各种政策及论述全球化导致了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衰退。

尽管10年前在《经济幻想》中托德已经指出到1990年代中期法国具有大学学历阶层已经不能保证高工资、无失业风险，但是他为了增强说服力，在《民主主义以后》中还是通过新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即1990年代特权阶层大约占法国人口20%，但是大学的知识与财富的结成联盟在发达国家中也只能是一时的，随着全球化发展，从新自由主义潮流开始至今天（托德执笔的2008年），还没有30年，上层白领阶层圈子的利益也开始遭到侵蚀，不仅每年33%大专毕业生被排斥在依靠学历在世界市场受到庇护的特权者之外，工资下降、失业也已经威胁取得职位的高学历的人们。法国发展得很快快的媒体行业，就业者的学历都远高于前辈，但是年收仅1万多欧元。经济地位导致政治信仰的转化，贫困化了的都市新的中产阶级整体政治立场向左转。

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后最上层的20%的收入也开始发生分化，越富裕的收入、财富增长越快：收入最高的10%的人，八年间平均增长11, 3%；从上算起1%富裕阶层，增长19, 4%；最富裕的0, 1%的人们增长了32%；最最顶尖的0, 01富豪，增长了42, 6%。同样其他阶层中也在更细地分化。对民主社会威胁的是富裕阶层内部不仅形成阶层同质性、还成了利益连带、共同驾驭社会的集团。他们对于财富的欲望，转向对权力的追求，不仅把“有教养无资本”阶层排除出统治集团，而且开始置身于与国家构成争夺资源关系的地位。国家资源不仅是物质财富，还包括对人力资源配置和武力的动

员、驱动。他们的富裕生活已经完全与庶民断绝，很难想象、理解庶民的生活实态。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造就的新富裕阶层，与旧时代富裕阶层不一样，很少有从事慈善、福利事业的，哪怕出资宗教的感觉。另一方面，本来受金钱腐蚀最小的艺术界也开始堕落，艺术也成为这个阶层投机的对象。

托德批评法国部分知识精英和萨科奇都把发生在都市郊外的青年人的暴力事件不是归咎于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而是错误地归咎于“新的民族主义兴起”。他认为没有统计数据能表明参加暴力活动青年大多出自北非的少数民族，而是因为“毕业即失业”导致他们对传统社会的恐惧，参与暴力活动。那些知识精英否认教育导致的阶层断裂、导致的新的贫困，把暴力、社会矛盾根源归咎种族、宗教的差异，根本上是放弃法国传统的普遍主义的民主主义理念，和美国（容忍黑奴制的民主主义、雅典保留奴隶制的原始民主主义）一样，倒退到非普遍主义的民主主义水平。而萨科奇总统选举的胜利正表明极右翼国民阵线（民族主义）的退潮带来的选票。而萨科奇政府无视教育的停滞、全球化经济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正是社会冲突加剧——暴力化的根本原因，错误地把阶级意识的矛盾和冲突解释为民族或宗教冲突，所以，萨科奇上台后，在所得税上“给了富裕阶层一个很大的礼物”之外，在各方面扩大社会不平等对中小企业投资者减少财产税、降低财产继承税、免除住宅贷款利息税收的等，总额达 150 亿欧元。托的预言：这样倒行逆施的税收政策的实施，萨科奇的支持率将会大大降低，先前选举中支持他的来自老年选民大量选票——退休阶层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前景日益明显。法国等发达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民众也不是在全球化后马上能感觉出来的，托德指出，法国社会自觉感到生活水平下降的是在 2008 年。其实，日本因为是对第三世界劳动力、出口依赖最严重的国家，经历了比法国更长期、严重的全球化“积累”，长期完全失去内需市场、劳动力过剩之后（据笔者的观察，日本国民平均生活水平已经倒退到不如葡萄牙、希腊），日本少数头脑清醒的国民（可能就是托德所说的日本是“直系型家族社会”缘故，广大国民顺从权威、容忍两极分化不平等的“命运”）也是在 2008 年才开始自觉生活水平下降，这个“生活水平下降”要素也成为 2009 年日本夏秋之交大选民主党的宣传口实和自民党大败的要素。托德感叹说，在“历史终结”时代，“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相对贫困的概念，绝对贫困在欧洲最初得到经验的验证。”

根据海克谢-奥林理论(Theorem of Heckscher-Ohlin)，假如全球劳动力与资本市场完全统一起来，最终必然把极端的不平等引入所有国家。1990 年代以来的所谓“自由贸易”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内制造了两极分化，也把与第三世界同样程度的贫困传染给发达国家的社会底层。如果不是把工资作为社会财富的分配，只是作为生产成本来计算的话，最终对该国家内需发生负面影响。因为全球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大量提供，各国工资又受到这一最低标准工资降低的影响，导致内需购买力大幅下降。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结果——对欧洲、全球底层工薪阶层乃至中产阶级利益带来的损害，实际上从长远来看，也对各国经济带来损害。为什么美国社会对“自由贸易”这样的祸害反应不敏感，或者说症状不如其他国家严重还有一个大量消费的市场？托德认为政治霸权给美国带来许多特权缓解了症状，比如，军费开支刺激经济、美元作为世界通货，1999 年以来一直保持很低价位，等等。不仅发达国家，几乎所有国家投资者——资本家都喜欢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利益决定立场，他们都欢迎这样的全球化。像中国、印度这样国家的高学历者，开始时似乎是得益者，但是随着他们国家大量制造文凭的结果，学历贬值，高学历者的收益也得向低看齐。所以，中国、印度那样的国家中赞成全球放任自由贸易的人也会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均衡被极端两极分化破坏了社会原先的均衡，即使富裕阶层也要受到这种收入上不平等带来的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恐怖、暴力犯罪增加、学历考试竞争加剧。所以，在他看来，目前发达国家的教育，不仅已经导致文化停滞，而且是民主主义的障碍。

托德嘲笑美国说：“美国人也许有解决办法，富人建立自己的郊外住宅区、办自己的‘贵族大学’，但是欧洲很难实行这种社会隔离，欧洲人离开都市，马上感觉生活水准下降”。笔者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美国，虽然讲平等传统比法国差一点，要完全实行社会隔离很难，1960 年代公民权运动证明了这一点，奥巴马当总统更证明这一点。倒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富裕阶层在住宅与教育两个领域与贫民完全隔离的可能性要比美国大一点，目前已经有这样趋势。托德是从事实证研究的专家，当然对中国事情也有相当了解。他如是分析、描述说：中国目前是源自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政体——托德把这称作：“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千百万农民离开故乡、土地，都市中产阶级也已经出现，上面还有社会金字塔顶端具有特权超级富裕阶层。这种分化，乃至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本身在词义上自相矛盾，只是名声狼藉法西斯主义代用品。这种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核心部分，本来引起共产主义革命价值观依然“健在”。在人们宗教信仰日益淡薄、个人原子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在经济压力下，为了从孤立原子化中摆脱出来，阶级意识产生并组织起来也不是不可能。按照他的人类学理论所述，平等的核家族型社会的法国人酷爱阶级斗争。所以，现时法国权力中心那些新权贵也感觉到了暴力反击的威胁。埃马纽尔·托

德提倡把适度干预的“协调的保护主义”，（不是“放任的保护主义”）作为政府的一种伦理责任和义务。这种协调保护主义的根本目标并非限制共同体之外低于产品的进口，而是为了保障提高本国工薪阶层工资的空间。因为只要进口没有限制，价廉的进口产品必然带来国内工资水准下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需萧条。如果发展中国家极其低廉的工资水准受到压力，那么，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的工资才能提高，内需才会改善、增长，内需改善后带动进口，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单纯依赖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为基础的进口，那么单纯追求低成本结果，必然是国内低工资，内需低下，不仅起恶性循环。

那么，发达国家如果实行协调、适度的保护主义，势必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就业。托德没有说起如何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的权益，但是他知道，那些“外婚共同体家族型社会”的国家里工人肯定很艰难，因为工会组织和活动不能自由展开，也没有人为他们争取权利，尽管那里的传统是追求共产主义。但是，托德很乐观地说，台湾也是“外婚共同体家族型社会”地域，已经有了民主制度样板。当然他也承认“外婚共同体家族型社会”如何会形成民主体制？这个课题是对他学说普世性的一个挑战，需要深入研究。可见，与法国的老一辈对莫斯科有过幻想的左派萨特、梅罗·庞蒂、阿尔都塞、阿拉贡、纪德和他那曾加入法共的祖辈保尔·尼赞等左派知识分子都不一样，托德是个“历史终结时代”的“新左派”。

Emmanuel Todd , *L'invention de l'Europe*, Seuil, March 3, 1996

Emmanuel Todd , *Après la démocratie*, Gallimard, Paris, 2008

Emmanuel Todd , *L'illusion économique. Essai sur la stagnation des sociétés développées*, 1998

BOOK REVIEW 书评

“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

历史不是新闻作业，不以追求轰动为旨归，但正和这个神奇时代的其他事情一样，常识往往以颠倒的方式呈现：再轰动的新闻也不免流于重复，耸人听闻之处常常似曾相识；倒是历史研究反而能刷新耳目，一次次让人有“原来如此”的感慨。

张朋园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中讲到民国七年也即 1918 年的国会选举章程是军阀和学者联手的产物。军阀如段祺瑞者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学者如梁启超也当仁不让，自命为段祺瑞的政治辅导员，两者携起手来，在制定选举办法的时候，挖空心思要把激进的国民党人从国会中排挤出去。由此，段祺瑞可以登上总统的宝座，而梁启超自然是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可以成就一段文武共和的佳话。谁料到段氏麾下的武人徐树增反对如此分肥，向段祺瑞进言说，我辈武人流血冲锋在前，难道是为了让那些文人坐收渔利吗？他从半空中杀出来，花了大把的钱（分别来自财政部、地方督军捐献和国外借款），一路收买选票，凭空拉出来一个安福系的国会，不仅将国民党的势力驱逐殆尽，也把梁启超的研究系的影响力削弱到了最低程度。这个“安福国会”臭名昭著，葬送了梁启超的政治雄心。枪杆子里出政权，并非毛泽东后来的首创，只是他从前人那里吸收了现成的经验；梁启超虽然能够放下学者的架子投身政治，毕竟不是实力派军人的对手，就是一个教训。

9 月 23 日的《人民日报》采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君如时，李教授坦言，中共执政 60 年，最大的经验就是“一切为了巩固、发展政权”，让不少读者顿生错愕的感觉，以为这种说法是对“一切为了人民”的颠覆，殊不知李先生毫无改弦易辙之意。早在 1933 年，毛泽东就在文章中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枪杆子里出政权”并列为两大名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应该、也不会是例外。

毛泽东这篇文章题目是《今年的选举》，原来是在苏区发动代表选举的动员报告。报告两个月之后，毛泽东从江西赴福建，一路上调查各地选举情形，抵达选举江西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调查数日后，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描述了这两地的民众选举代表的情形，其中才溪乡被称作是模范区，因为选举中实行了差额选举，尽管选民多为妇女



和老人（当地八成壮年男丁当红军去了），而且几乎全部是文盲，投票率仍然达到 80%。没有人怀疑才溪乡选民的政治热情，因为不足龄（十六岁以下）的小孩子也质问为何自己没有投票选举的权利，也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政治能力，选举技术方面的障碍也并非不能克服。总之，用丁学良教授在 FT 中文网上的专栏中的话说，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人素质（有没有能力实行民主）的争论，1933 年在中国最贫苦的地方是不大听得到的，即便有，想来也没有打消人们实验民主和选举的信心。

这些民主试验不在张著关注的范围之内。《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中的论述从 1909 年清政府试行君主立宪开始，以 1948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国会选举为下限，没有兼及地方政治如 1928 年之前的广州和共产党之瑞金和延安的发展，而是以 1909 年以来的四次国会选举为主线。在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民国时代的选举纯属骗局，因此国民党之宋教仁，研究系之梁启超，还有 1947 年欣然投票选举市参议员的胡适等人，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之流，偏偏张先生要说，即使民国七年的议员选举是一出军阀上下其手的贿选闹剧，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那就是没有取暴力的道路——武人如段祺瑞、徐树增之流，竟然舍枪杆子而就钱袋子，在张先生看来，已经是历史的进步了。

如果要让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写书评，张先生就太书呆子气了。

《民主四讲》是去年出版的，王绍光教授的本意是要澄清那些流行的偏见——我们原来以为是常识的，比如“民主是个好东西”，在王教授笔下，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书中从希腊城邦时代讲起，一直到社会主义民主才告结束，结论是，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先贤如亚里士多德将民主制度贬低为“乡巴佬的统治”，可见其口碑。在所有的民主形式中，最坏的一种莫过于竞争性选举和一人一票，信手拈来的例子，从菲律宾直到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因为选举既没有让这些国家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没能让这些国家实现社会和谐，民族复兴更加遥不可及。

料想到有人会用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成功作为反例，王教授说，两党政治下名为选举，实为“选主”，选出来的往往还是“金主”，这样的民主断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觉得国内有一种对选举的迷信，反正讲到政府改革都离不开选举，好像有了选举就有民主，没有选举就不是民主。”但这种“迷信”何止国内有。张朋园先生花 515 页的篇幅讲述四次不成功的国会选举，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迷信，并且在绪论中就早早承认了：“本书采用 Joseph Schumpeter 的观念：有选票有民主，无选票则无民主”。

相比之下，《民主四讲》的篇幅过于简略，无暇区分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四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差别，也来不及指出民主印度的经济前景，都无可厚非，用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来否定民主则显得过于严苛。但这种指责常常是可以听到的：美国有 4500 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英国的议员用公款换家里的马桶，法国移民发生了骚乱，这些都是拜民主所赐。那么，在没有实行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的地方，人们贫穷、缺乏保障、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安定，又是拜什么所赐呢？王教授拒绝讨论。

对民主及其缺陷的反思并不鲜见，但批评者并没有像王教授那样好古，认为只有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轮流做庄”（抽签式民主）才算是民主的真义，或者像王教授那样激进，认为除非实行“财产所有民主制”，否则民主就毫无可取之处。反思的意见认为，“仅仅有竞争性选举是不够的”（《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2009 年 10 月 18 日《东方早报》书评）——

是的，还不够，但王教授担心，如果中国出现竞争性选举——比如像 1933 年苏维埃治下的才溪乡那样，就要国将不国了。

其实不必如此紧张。虽然民主政治往往体现于选举制度，但选举毕竟不能和民主直接划等号。威权政治同样也要假借民主的外壳，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选举因此沦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张朋园引用 Larry Diamond 的话说：“选举在民主国家是凯旋门，是立国之道；选举在威权主义下是一个谎言，统治工具。威权主义以选举取得合法性，严加控制，长保权力。看似民主，实质极权。”

在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个遴选政府和民意代表的手段。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目的是为了调整政策，换句话说，是为了调整公权力（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组成，其中司法权力独立于民意，故而不通过选举产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而 1933 年苏区选举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才溪乡调查》对此又有进一步的说明。毛泽东认为选举有利于组织和动员苏区的民间力量，“使全村民众像网一



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所以，“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关键不是选举，而是动员。选举只是动员民众参加运动的方式。

“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说的是以选举动员民众的效率，和王教授鞭挞竞争性选举的旨趣并不相悖。

书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谈的是国会选举之得失，张朋园先生眼中，民主政治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自然不言而喻。这本书的出发点也是许多人的疑问，可以概括为“中国民主迟迟不得发展”的原因何在？他引用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归纳的十点如下：

1. 民主政治没有得到共识。中国稍有知识的人都说应该实行民主，但所希望的是国家统一，万众一心，而一直生活在威权主义下，还没有培植起来西方人的民主意识；2. 国家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态洗，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因素，受到战争的威胁，无暇思索实现民主；因此，3. 总是军事第一，谁控有枪杆子，便控有政权，全体国民对民主政治可望而不可即；4. 政治学家 Lucian Pye 说中国人不容忍异己，但又害怕冲突(conflict)，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缺失；5. 因为落后(underdevelopment)而又贫穷，教育不够，人民无暇关心民主政治，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不存在，所以民主不发达；6. 中国是个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农民无知、保守、贫穷、反民主；7. 宪法不好（实际上是没有付诸实施）；8. 道德不振(moral failure)；9. 精英不下台：如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把持权位，不到死不下台；10. 帝国瓦解后，废墟上不容易建立新的制度。

他说，“四次国会选举，一次不如一次，上列十大因素，无一不可引用”。又特别强调，“威权主义下的选举”，是一种“虚伪的民主”，“没有民主的选举”。“这样的选举，没有公开(open)、自由(free)、公平(fair)的实质，统治者一手操控，大把的选票由他们自己分配，让自己的人当选，排斥异己。”

张先生评价道，“安福系和国民党的选举就是如此。”

用黎安友教授归纳的这十大原因来比照今天现实，可以说，有一些因素如战争、贫穷、独裁和社会动荡，已经不复存在。有一些文化上的因素如关于民主政治的共识、政治文化的缺失和道德水平等等，没有公认的及格标准可言，也并非这些因素都臻于至善才能实行民主政治。黎教授提到的窒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因素中，只有三条在今天依然问题严重，那就是枪杆子、宪法和权力交接的问题。

张著中所称道的“民主政治”是否适合中国，对这个问题不做推究（如《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或者断然否定（如《民主四讲》），都很难说服读者。

竞争性选举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呢？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素质呢？有些人以为中国之大，竞争性选举是否适用，不妨一试。这以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为代表。他有一个建议，花五年时间，在中国的一百个县里试验竞争性选举，如果行之有效，再花五年时间，推行到一千个县。中国共有两千多个县，试验下来，起码要有 20 年时间。用丁学良教授的话说，提高中国人民素质 20 年够了。要检验一种制度是否合适，20 年时间不能说足够，但这种试验胜在既能够回应现实，又渐进、有序、非暴力，做一种备选方案并无不可。

当然，以王绍光教授的眼光看来，这一类试验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东西”，他“也不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于先生认为政治改革应该“以空间换时间”，也即用试点、试验来换取经验和共识，前提是承认现状有缺陷，必须寻求改进。但王教授的话音一转，于先生的建议就显得太多余了；因为“真民主”在现实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以中国的医疗改革和三农问题为例，王教授惊喜地发现，“民众表达意愿，政府作了回应”，“这就是直接的民主”！尽管没有轮流做庄和财产所有民主制，但王教授原意在现实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同意王教授的说法：“现在三农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也不同意王教授关于民主（而且是“直接的”）的定义，就像我不同意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奥巴马一样。仅仅根据承诺而不是行动，就对人们加以表彰，这太简单，太幼稚，也太势利眼了。

民主政治有利于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但并非能解决或者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就是民主政治。当然，实用主义者要说，民主还是威权并不重要，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万事 OK。这听上去不无道理，实际却不然。

民主政治不能包治百病，威权同样不能。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短时期内提高 GDP 的增速，而威权政治的第一难题是滥权。那些在发展经济方面效率极高而实行威权政治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会悄悄地从选举变成经济增长，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新现象。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即“巩固政权”的问题，就成了威权政治头等重要的课题。但权力的滥用不仅短期内增加了民众的痛苦，长期而言，因为腐败和长官意志难以遏制，

还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足以毁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得统治不可持续。

民主政治有利于遏制权力滥用和腐化，当然可以举出反例（如菲律宾），但反例不能否定其效用。政治学者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逻辑。挑战常识的嘉奖多数时候是故意为之，正如在饥饿时代褒扬“代食品”意味着食物的本质和真义，属于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一类。那是学术之外的话题了。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张朋园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长春）2008年1月第一版

《民主四讲》 王绍光著 三联书店（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丁学良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column/007000010>

《王绍光谈民主与“选主”》见《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8日书评

FOCUS 专题

赫塔·米勒：熟悉的陌生人

特约撰稿人 康慨（北京，kk@gmw.cn）

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著名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0月8日获得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当天宣布，米勒女士“以诗歌的凝炼和散文的平白，描写无所寄托的状态”而获奖。

她怎样戴上桂冠

56岁的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乃该国德语少数民族巴纳特斯瓦比亚人。她在齐奥塞斯库时代上大学，进工厂工作，也在罗马尼亚走上文学之路。但她真正成名是在西德，经由走私出境的作品手稿西柏林出版并广受好评。而在祖国，她不仅要在严厉的审查制度下委曲求全，还要应对秘密警察的长期监视和频繁骚扰。最终，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前两年，她移民到了西德。

该国另一位著名的流亡作家诺尔曼·马尼亚（诺曼·马内阿）是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的，仅早于米勒一年。关于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文坛的状况，马尼亚去年告诉我：



“我不想离开罗马尼亚。这倒不是因为我在哪儿过得幸福，或是有什么特权，而是由于那是我的土地，而我必须要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化里生活，哪怕国家荒芜，恐惧弥漫。的确，内心的流亡早在我离开前很多年就开始了。我离开，是因为情况已变得无法忍受，文化状况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我与当权者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去——就像家里着了火，你跑出房子一样，那时不会去想下一步，睡在哪儿，吃什么。”

马尼亚虽为犹太人，仍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而赫塔是德语作家，所处的巴纳特德语文化圈亦与罗马尼亚的主流文化颇多不同。但她并不欣赏本族文化。她在作品里不断揭露，第三帝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依然在罗马尼亚的德裔族群中有深厚影响，这种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专横和腐败，竟然可以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制造出一种压抑至极的生存环境，实在如瑞典

学院的授奖辞所言，令人“无所寄托”：布加勒斯特不是我的家，蒂米什瓦拉不是我的家，及至到了西柏林——冷战时代所谓的自由世界桥头堡，才发现柏林仍然不是我的家。

这种在世界上无根的、异类的、外在的状态，就此成为米勒女士作品的中心主题。也许你有一万个理由，可以将米勒女士归入政治作家的行列——的确，回看此前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无疑是其中政治色彩最强烈的一位。但我宁愿推开政治的放大镜，尝试着去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自己体内里很少涌过政治的强力热血，取而代之的，是对她深刻触及人类共通困境的感佩，以及一种复杂而深切的痛苦——不见天日的痛苦，旁观他人痛苦的痛苦，由人及己的痛苦，对落入圈套、被逼迫、被摆布、被勒索、被戏耍、被分类、被羞辱之恐惧所带来的痛苦。将她称为政治小说家，无疑大大贬低了她的文学技巧：这其中包括语言的美感、隐喻与转喻的精妙运用，以及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建立在深刻观察世相基础上的讽刺甚至笑谑。乔治·奥威尔是政治小说家，赫塔·米勒却未必。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和尼茨基多夫村，往往并不是反击的靶子和警示世人的参照，而更像是一件临界状态下的标本，通过米勒女士的解剖刀，我们看请了社会可以堕落到何种程度，而我们自己又会多么无助！

奇怪的是，奥威尔先生有一双悲天悯人的慈目，米勒女士却天生一对咄咄逼人的鹰眼。

我们此前少闻赫塔·米勒的芳名，及至对她稍有了解，哪怕仅止皮毛，想必也不会再视之为又一个陌生人。最近十年，头戴诺贝尔桂冠的陌生男女比比皆是：涉及女权主义、反战、世界旅行家、种族隔离、细密画、后殖民主义，乃至中国人自己的先锋戏剧，却都不如今年这位女士来的感同身受。

赫塔·米勒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

统计数字和学院的秘密邮件

米勒是自诺贝尔文学奖 1901 年首次颁奖以来第 12 位获奖的女性作家，也是自 1999 年君特·格拉斯以来获奖的第一位德国作家。

尽管如此，算及前年的多丽丝·莱辛，三年来已有两位女作家问鼎，再前溯三年，则有奥地利的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六年间女作家三度折桂，男女比例总算旗鼓相当，对一直被指“男权主义”的瑞典学院而言，这实在是个巨大的进步。

而且还应看到，过去 11 年来，德国得主虽为两人，但耶利内克女士也是德语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也与德国渊源深厚——他不仅是德语文学翻译家，且本人长居德国。

不过，比起有四人获奖的英语作家——莱辛、品特、库切和奈保尔，德语文坛仍略逊一筹。

今年 10 月 8 日，瑞典学院会议室里间的大门打开后，出来宣布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已经换了新面孔——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第一次在这个位置上亮相。此前 10 年我们年年都见的前任常秘贺拉斯·恩达尔已于今年 6 月 1 日去职，媒体广泛猜测易人之举与他此前贬低美国作家，并引发强烈争议一事有关。

恩达尔去年公开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部分来自欧洲而辩护，称“欧洲仍然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而美国作家得奖少，一点都不冤，因为“无知者自缚”。

不管怎样，今年的得主仍然来自欧洲。但对比美国与欧洲作家的作品，你又怎能不暗自认同恩达尔的绝唱呢？

至少对我而言，米勒女士的获奖不算意外。开奖前两天，我已着手寻找关于她的一切——作品、评论和论文。我事先留意了某些有证据基础的传言：其一是英国赌博公司立博（Ladbrokes）网站的赔率榜在最后关头突然发生大异动，米勒由一赔五十跃升至一赔三。其二，注意到这一异动、并宣布米勒值得关注的文学网站“complete review”在后台的引用记录中发现，有几次点击来自瑞典学院。这证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机关里，有人通过学院内部的邮件系统转发了相关文章的链接。complete review 多年来勤奋如一日的版主 MA·奥索佛事后得意地写道，希望自己这回不要偷笑得太过厉害。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2009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证明，瑞典学院的防火长城也不那么灵。

2009 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 12 月 10 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赫塔·米勒将获得 1000 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 979 万元）的奖金。

赫塔·米勒：生平与作品

特约撰稿人 康慨（北京，kk@gmw.cn）

先从名字说起吧。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应该译“米勒”，而非“穆勒”或“缪勒”，因为其德语正式拼写是“Müller”（有时可转写为 Mueller），而不是“Muller”。德语变元音“ü”的发音，类似汉语拼音里的“ü”，只是音程稍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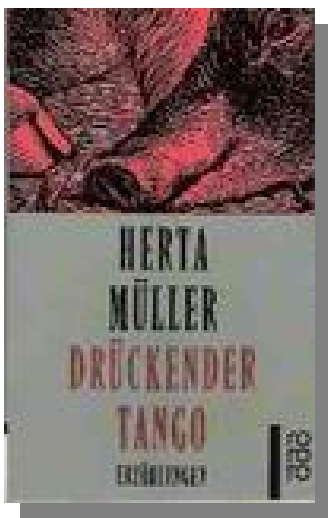
赫塔·米勒是德国作家，生于罗马尼亚的德国作家。但一言难以道清她复杂的身份，如果不回溯她所在族群的历史，以及她本人在齐奥塞斯库时代度过的前半生，就无法解释她的作品，也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

1953年8月17日，赫塔·米勒生于罗马尼亚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村，父母均是讲德语的巴纳特斯瓦比亚少数民族。二战期间，该地区的德裔普遍支持纳粹德国，赫塔的父亲和叔叔亦曾在德国武装党卫队中服役，母亲则在战后和许多德裔罗马尼亚人一样，被关入苏联劳动营五年。

巴纳特斯瓦比亚人源自18世纪初，彼时奥地利经过与奥斯曼土耳其的连年恶战，夺得巴纳特，遂在此设省，并鼓励殖民，以图改变当地的种族与宗教构成，作为抵御土耳其人的前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巴纳特主体并入大罗马尼亚，该地区的德语少数民族，即巴纳特斯瓦比亚人，得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并自办教育，发展已延续十代以上，与德国颇多不同的本地文化。齐奥塞斯库时代初期，德语少数民族可享受宽松的移民条件，但从1970年代末开始，政策大为收紧，需按年龄和教育程度，向国家偿付1000西德马克以上，方可获得永久移民签证。1989年后，德裔罗马尼亚人蜂拥移居德国，令罗马尼亚德裔人口由一度的约75万人骤减至今日不足7.5万人。

赫塔·米勒便是这些德裔罗马尼亚人中的一员。

她长大后进入蒂米什瓦拉大学，研读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期间加入了德裔罗马尼亚人追求创作自由的文学团体“巴纳特行动组”（Aktionsgruppe Banat）。大学毕业后，米勒进了工厂，做德语资料译员。1970年代，因拒绝与秘密警察合作，她被开除出厂，遂以在托儿所当阿姨，以及做德语家教谋生，终在1987年，与作家丈夫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一起移民西德。



1982年，米勒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最低点》（Niederungen）经过重重审查，并大幅删改之后，获准在布加勒斯特出版。原稿则经人偷带出国，两年后在西德以同一书名付梓。在书中，米勒以近似高尔基《童年》的风格回忆老家尼茨基多夫，道出乡村生活光鲜外表之下压抑的现实，足以摧毁她本该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乡下人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如此冰冷、蛮横，缺乏人性，少有沟通。性压抑亦在其中，“他们一进入厕所，便抬头望向天花板，如此便可不看自己的裸处，因为这房子里的每间屋内，任何可称作下流或猥亵的事都有可能发生。”一望即知，这是隐喻，小小乡村正是齐奥塞斯库治下罗马尼亚冷酷现实的写照。唯一不同的是，米勒以诗一般的文句描写丑恶的现实，语言的美感和恐惧、痛苦、肃杀的细节交织。

1984年，米勒女士在罗马尼亚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压抑的探戈》（Drückender Tango）。此书改以成人视角，描写的却仍然是所谓乡村乐园的伪善，尤其是德裔村民中间弥漫的狂热的法西斯心理、不宽容和腐败。政府对此书难以容忍，甚至家乡的巴纳特斯瓦比亚人也对书中的“丑化”提出抗议，米勒于是遭到批判。

但由于《最低点》在德国大获好评，她受邀前往法兰克福书展，并公开发表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政府的言论，亦令她在本国的作家生涯就此终结。自1985年起，她被禁止发表作品。

多亏科尔政府的德裔归流政策，令罗马尼亚同意放行米勒。1986年，在等待移民许可时，她再次在柏林出版了小说《人是世上大傻瓜》（Der Mensch ist ein grosser Fasan auf der Welt），描写一个德裔罗马尼亚农民家庭一心取得出国护照的艰辛历程。他们面对的农村干部，甚至邮政所长和乡村牧师，几乎个个腐败透顶，在其位，谋其私，毫无廉耻地施弄权术，对有心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索要钱物和性贿赂。

在西德出版的上述两书，重新激起了德国评论界对罗马尼亚德语文学的兴趣。除去其中的政治因素之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即语言。从米勒的小说中，评论家们看到了域外之文化离岛上保存下来的更为“质朴”或“干净”的德语。

《独脚旅行记》（Reisende auf einem Bein）出版于1989年，米勒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首次从罗马尼亚农村移至西柏林，其叙述也主要围绕眼前的生活展开。虽然这种变化几乎没有再持续下去，但米勒自此进入了“自传性小说”（autofiktional）阶段。较之以往，此书的主人公伊蕾妮与作者本人更为接近，所述虽为西柏林的新生活，却充满被视作外人的苦恼和政治

流亡的困境。伊蕾妮离开了“另一个国家”(das andere Land),得到了西德公民身份,她也讲德语,却有很重的口音,而且旧有的文化包袱怎么也卸不下。她漫步城中,感受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细节,脑袋里却越来越乱。“另一个国家”的东西不断出现,阻止她跨越文化鸿沟。她当真得到了自由吗?抑或仍然被过去牢牢捆绑,深陷于异类(Fremdheit)的状态。

《独脚旅行记》不仅是小说,也是当时米勒夫妇在德生活的真实写照。起初,西德移民官员在审核程序上久拖不决,以至米勒夫妇怒而提出要以政治难民,而非德国后裔的身份在德居留。《独脚旅行记》出版后,评论界的态度不无冷淡,亦使夫妇两人公开抗议,指责德国文化界对中东欧德裔侨胞及其历史背景毫不关心。这也难怪,德国读者也许对齐奥塞斯库更感兴趣,对一个巴纳特“德国人”的遭遇则很难感同身受。而要读懂米勒的《独脚旅行记》,即使是德国人,也需要更多的历史知识。

这正是米勒的新烦恼。德侨在中东欧多国散居逾两百年,顽强保持对语言和民族身份的认同。在侨居国,他们被视为外国人,如今“回国”,竟然还是外国人。也许出于这个原因,米勒此后的小说又转回罗马尼亚。1989年齐奥塞斯库政权崩溃后,她开始更为直接地描写罗马尼亚的昔日生活及其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个人经验和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来的隐喻。如1992年的《曾几何时,狐狸就是猎人》(Der Fuchs war damals schon der Jäger),主人公是个不断受到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骚扰的女教师,最终由于恐惧而导致自我分崩离析。1994年的《心兽》(Herztier)则不仅成了米勒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而且为她赢得了克莱斯特奖,其英译本《风中绿李》(The Land of Green Plums)则荣获了1998年的都柏林文学奖。小说的女主人公不断回忆起自己在乡村度过的童年,往事与现实互相映衬,再现了罗马尼亚令人窒息的社会气氛和肃杀的文化环境。她与同宿舍的四个大学女生一样,终日忍受怀疑和监视、羞辱性的“思想工作”和商品匮乏的生活,日后进入社会,终于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毁灭。

1998年,米勒出版了《今天我宁愿不见自己》(Heute wär ich mir lieber nicht begegnet),故事仍然发生在罗马尼亚,讲某天早晨,女主人公被秘密警察请去喝茶。她上了电车,这一路上,对旧事的回忆纷至沓来,从小到大,竟有那么多的谎言、背信和叛卖。

简而言之,赫塔·米勒小说的三大特色是:压抑的主题、诗化的语言、断片式的叙述。米勒式的断片风格常见于故事讲述者的回忆,类似于电影中惯用的快速闪回。有些评论家因此赞扬其语言已达至诗歌的边缘。

近年来,米勒女士大大放缓了小说写作,出版的作品以诗歌和随笔为主。两德统一后,米勒不断谴责那些曾与东德及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合作过的民主德国作家,亦公开反对欧盟接纳罗马尼亚,因为罗马尼亚始终未曾像东德那样,对历史进行清算,齐奥塞斯库时代安全部的大多数官员仍然在位。

参考书目:

布丽吉德·海恩斯、玛格丽特·利特勒:《当代德语女性写作》(OUP, 2004)

瓦伦蒂娜·格拉雅尔:《中东欧的德国遗产》(Camden, 2004)

琳·马文:《当代德语文学中的身体与叙述》(OUP, 2005)

威廉·格兰杰:《战后德语文学历史词典》(Scarecrow, 2009)



猜中就是“众望所归”?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 peessoa1935@gmail.com)

做完今届诺贝尔文学奖专题,翌日就读到陶短房先生《诺贝尔文学奖的“跨文化另类癖”》一文,不能不令人振奋。盖近年每到十月第二个周四晚七点(北京时间)后,相继涌出的专家学者声音,率多“不出我所料”,另一种则热中给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开药方。难得陶先生如此坦率质疑德国作家赫塔·米勒女士得奖,并且善意提醒诺奖评委们“诺贝尔奖不仅姓‘诺贝尔’,更姓‘文学’”。

细读之下只能说陶先生除了质疑的勇气立场可嘉，论述观点让人万万不敢苟同。在这个泛政治化的年代，以泛政治化的名义批评诺贝尔文学奖是安全的，毕竟后者选中作家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命运是硬指标，甚至有时“急功近利”到了与作家当前政治行为挂钩的地步，如2006年获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5年获奖的英国剧作家品特。应该说，任何一个奖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它自有其价值取向。陶先生认为，“赫塔·米勒女士的获奖，更多因其作品所涉及的内容，而非作品的文学价值本身”。假如这个结论是陶先生阅读米勒女士作品得出的，而不是“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我会尊重他作为读者的一番心血，毕竟自1901年法国作家普吕多姆获奖以来，一百年间不少获奖作家寂寂无闻——但换个角度看，过去的获奖作家们今天又有多少人关心诺奖选中他的“政治意义”？读者的热情难道不正是来自作品的文学价值？！

正因为不少结论都来自“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难免让人无所适从。比如米勒女士作品的影响力有限乃是因为“狭窄的受众范畴”，姑且不论国外对米勒作品及其评价如何，单说文学价值可能由多少人阅读决定的？又如米勒在德国及其母国罗马尼亚文坛不算“文学大师”的观点，真是美丽的误会：诺贝尔文学奖几时成了终身成就奖？过往得主不乏大师，然而不能推论一定要大师才能得奖。这是茅奖思路吧。另外，对米勒得奖的质疑是与君特·格拉斯相提并论，这种比较与其说对米勒不公平，不如说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赫塔·米勒是一位有待阅读的作家，对中国人而言尤其如此，她的作品只有台湾时报文化在1999年出版的《风中绿李》。她对东欧极权国家的记忆、书写和批判，凝结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经验。读者读这样的书，乃是因为其中也有读者自己的困境（至于必须要爱正良才是文学价值的观点，我想就不必讨论了）。从这个角度说，断言米勒作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至少在今天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同”乃是非常轻慢的结论。

关于陶先生提出的“跨文化另类癖”这个现象，不能说米勒的作品中没有，但不能借此认为描述东欧经验即是“跨文化”、即是“另类”。自印度裔作家奈保尔2001年获诺奖以降，书写族群流浪历史故事这个世界文学的一大潮流浮出水面，广为人知，即所谓“离散”者也。如，同是印度裔的就有写《卑微的神灵》的阿伦德哈蒂·罗易，写《疾病解说者》和《同名人》的裘帕·拉希莉，孟加拉裔的则有写了《砖巷》的莫尼卡·阿里，斯里兰卡裔则有写了《世代相传》的翁达杰（他最著名的是《英国病人》），牙买加裔则是当红炸子鸡一般的扎迪·史密斯，《白牙》、《关于美》的作者，等等。这些挟异国风景的作家作品与西方近20年追求政治正确、追求少数族裔权利的大环境相关，这才是“跨文化另类癖”，风行到了连奈保尔都看不下去，抱怨这些人动辄把自己的七姑八姨写给西方人看。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活了前半生的米勒女士，我倒觉得正是和君特·格拉斯是一致的，无论是写作题材还是获奖理由。

陶文对获奖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即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给众望所归、呼声甚高的热门作家。因此陶先生会质疑米勒女士只名列博采公司第31名（其实在开奖前是第3名），才会质疑其文学价值与是否大师身份，也才会得出“甚至很难让人信服她的获奖比诸如村上春树等人更名至实归（按，应是‘实至名归’吧）”的观点。这两年没有人再为博尔赫斯打抱不平了，村上却被看好了。选手的得奖率仅仅限于呼声、受众、知名度，那就是完全忘了即使是文学奖也是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固然是在选手队伍中产生，但也要看到有大量是打酱油的。我对村上君并无恶意，但他与高龄又高产的奥茨女士、甚至我非常喜欢的菲利普·罗斯都很有可能是陪练的命。替美国作家抱屈是近年的流行，在欧洲居住多年的中国诗人多多几年前在访谈中就表达过对美国诗歌“霸权”的看法，这其中有着相当具体而微的原因，不是单说遵循哪一条诺奖规则就可以纠正的。单看今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岂非一种“欧洲的态度”欤？

走笔至此，想起这几天媒体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无不“爆冷”，用那个滥了市的词说，这真是缺乏“诚意”的表达。诺贝尔奖有什么必要让你猜中呢？让你猜中难道就是“众望所归”吗？难道不会是“毫无悬念”吗？对我这个五六年来每到十月第二个周四晚七点不到就在诺贝尔官网不断刷屏的媒体从业者来说，我没有像郑树森教授这样的作者，但无论做多篇幅的报道，始终相信这个人选会提供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去打开一片之前没有过的视野。“为诺贝尔文学奖一辩”当然属于笑谈，因为终究有时间说明，只是目前一时的迷惑而已，如果诺奖评委能够解答，又何必我等外行强作解人。古语说下笔令人惭，愿识者教我。



陶短房先生原文：

诺贝尔文学奖：还要“跨文化另类”到几时？

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家仿佛成了跨文化另类作家的乐园：自 2000 年至今，一共 10 位获奖者中，竟有 7 位具有跨文化特质，几乎每位获奖者均有“另类作家”色彩，而近 3 位获奖者竟无一例外均是“跨文化另类作家”——具有津巴布韦情结和血缘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具有毛里求斯血统和美洲作家特性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和本届获奖者、罗马尼亚德裔出身的德国作家赫塔·穆勒。

虽然这种对跨文化和另类的追求，几乎已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评奖机构——瑞典皇家文学学院的招牌标签，但这次走得未免太远了些：帕慕克、莱辛和勒克莱齐奥虽然也跨文化、也另类，但或是名著等身、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耆宿，就是因某些原因长期被奖项遗忘的大师，尽管他们的获奖也出乎许多预言家的预料，但事后复盘，大多数人也仍会心悦诚服，认为不论如何，他们的成就是足以承袭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

然而赫塔·穆勒实在太“另类”了。

立博公司事先所开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赌盘列举了近 60 位可能的当选者，赫塔·穆勒以 50 赔 1 的赔率仅列第 31 名，这位获奖者的一系列作品，不论是最早的《低地》、《暴虐的探戈》，还是今年刚刚推出的《呼吸摆动》，其影响都局限于狭窄的受众范畴：罗马尼亚德裔（罗姆族，仅占全国人口 2.5%），和德国、奥地利的部分文学爱好者。

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赫塔·穆勒自 1995 年起即成为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成员，但不论其个人成就或作品成就，均不足以在德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铭记，不论在德国或罗马尼亚当代文坛，她都算不上台柱型人物，更很难与“文学大师”头衔扯上多少干系。

评奖委员会称其作品“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失业人群的生活”，但这样的成就未免太过一般：几乎每个国家的每个时代，都会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作者，当得起这样一句大而化之的评价。

毋庸置疑，赫塔·穆勒的获奖，更多因其作品所涉及的内容，而非作品的文学价值本身。

作为曾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赫塔·穆勒在 3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将其本人和其所熟悉的、东欧少数民族裔和边缘人在冷战铁幕后的苦辣酸甜凝入笔触，勾勒了昔日东欧社会场景之一瞥，揭示出鲜为人知、至少鲜为铁幕另一端许多人所知的一片暗影，一段辛酸，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相当的价值。

但必须指出的是，和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相比，其文学价值至少在今天，尚得不到普遍的认同，如果赫塔·穆勒不是一名来自昔日东欧阵营的作者，没有独特的民族属性和身世经历，不曾被罗情报部门相中、又为其本人拒绝，如果她的作品不是 30 年如一日地执着于特定的创作题材，很难想象，她会从包括赛义德·伊斯伯尔、菲利普·罗斯、安东尼奥·塔布齐等响当当的名字中最终脱颖而出，甚至很难有说服力让人信服，她的获奖，比诸如村上春树等人更名至实归。

如果说 1999 年，君特·格拉斯以《铁皮鼓》获奖是众望所归，那么此次赫塔·穆勒的获奖不免让人感到一点异样：固然，作为作家她也是优秀的，但她是否优秀到足以击败那些更为人所知，为更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文学爱好者所接受的竞争者？是否优秀到足以令诺贝尔文学奖改变自 2000 年以来约定俗成的“英语与非英语作家交错获奖”惯例，抛弃奥茨、品欣、罗斯、唐·德里罗等热门，让自 1993 年失落至今的美国作家群再等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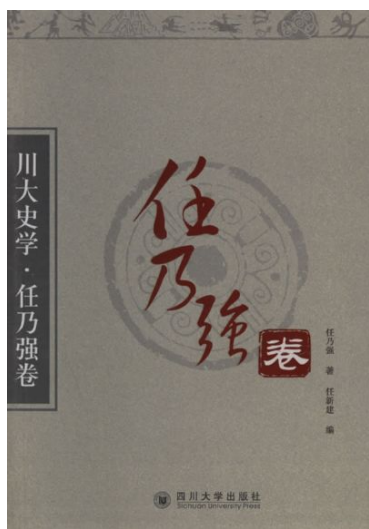
文学鉴赏是一门个性艺术，每个观察者都有其独特的口味，诺贝尔文学奖的“跨文化”和“另类”癖好，在可预见的将来，估计难有实质性改变，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坚持这一“特色”的同时，评委们恐怕还需更多提醒自己——诺贝尔奖不仅姓“诺贝尔”，更姓“文学”。

JOURNEY 游记

走进格萨尔

特约撰稿人 罗四鹑（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从海拔约 500 米的成都平原到约 4000 米的阿须草原，属于地理上的褶皱带，二郎山、折多山、海子山、雀儿山等高山雄立其中，大渡河、岷江、雅砻江、金沙江等大江穿行其间，若从空中看去便犹如一架巨大天阶西北倾，一直伸向那古老而神秘的青藏高原之巅。当我们翻过海子山，沿着雅砻江逆流而行，当我们到达阿须乡时，已是第三天午后。阿须，藏语意为富庶之地，不过，与有着“新龙门客栈”之称的玛尼干戈相比，处于阿须草原腹地的阿须乡更为落寞，虽然有路，但只能自驾或搭车而进。若是在离此 120 公里的玛尼干戈搭车，常常三四天都等不到一辆车。此时，与其幻想出现一匹格萨尔王的骏马将你带入阿须草原，不如研究一下数十年前的教书先生任乃强是如何数次到达此地的。



1929 年初夏，“自束发受书，偏嗜地理”的任乃强辞去南充教职，接受当时在川康边防指挥部任职的同学胡子昂邀请，首赴康藏地区进行考察。在途径瞻对（今甘孜州新龙县）时，与当地一位土司的女儿结成秦晋之好，在这场七天七夜的浪漫婚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屡闻不止的草地“蛮三国”。“时读散文，时而韵语讴唱，颇似内地的弹词”。1930 年，他将记录下的这段“蛮三国”以及介绍文字刊登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从此揭开了在雪域高原传唱上千年之久的《格萨尔王》的面纱。

1943 年，受华西大学之聘，兼任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研究员的任乃强，第三次赴康北考察，再次来到此地。这次，他看到了《德格土司世谱》和《林葱土司家谱》，发现了林葱土司家珍藏的《格萨尔》手抄本与木刻木，在对林葱土司家族和汉藏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余考格萨尔，确为林葱土司之先祖”的结论，并考证出，“唐末吐蕃崩溃，各部复自独立，或拥法诸酋中，格萨尔尔最著烈。其生当北宋初期，其所建国，当今邓柯、德格、石渠三县地。势力盛时，似曾统一理塘、昌都、玉树二十五族，与康、道、炉、甘等县地，足以传承吐蕃正统之乌斯藏比肩。”格萨尔死后无嗣，由其养子继承岭国王位，是为林葱土司之始。其在宋代版图尚宽。元代建置土司，明代尚为康北第一土司。“转入清代，德格勃兴，林国衰弱，降为林葱安抚司。今林葱官寨尚保存明清两代印信号纸与诰命。”

为纪念先祖，林葱土司翁青曲加执政期间，即公元 1790 年左右，在格萨尔诞生处建立神殿一座以祀，即格萨尔神庙。“殿中供奉有格萨尔遗物甚多，清代末大部古物被青海一喇嘛运至青海香达纳隆庆土司处，故神殿中仅剩格萨尔常用之军器及象牙印章等物”以及精美的壁画。

如今的阿须乡驻地在岔岔寺边，在依山而建的岔岔寺脚下的一处月牙形的草滩上，我们见到了那座出名却不起眼的格萨尔神庙——格萨尔诞生时，其母果萨撑帐篷之地。“两水交汇潺潺响，两岩相对如箭羽，两个草坪如铺毡。前山大鹏如凝布窝，后山青岩碧玉峰，左山如同母虎吼，左山矛峰是红岩。”此处的地形特征依然与史诗中“英雄诞生”中传唱的一模一样。然而，山形依旧，物却已非。走进小庙，才知任乃强当年看到的那座保存完好的格萨尔神庙，已在十年浩劫中成为废墟。如今，我们看到的是 1999 年，在神庙旧址上按原貌重新修建的岭·格萨尔纪念堂。堂内正中塑有岭·格萨尔乘坐骏马的巨像，环绕他的是 13 种威尔玛战神以及岭国大佛、将士、女士等 100 来余尊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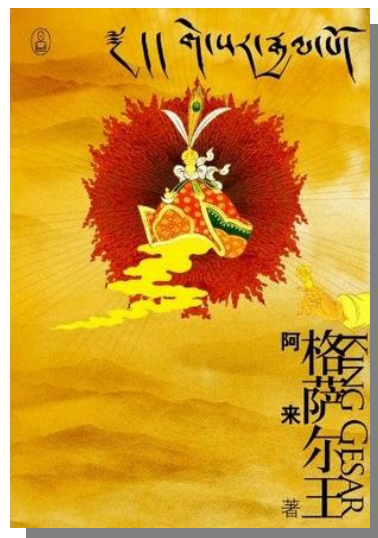
在藏区，有着这么一句谚语：“每个黑头藏民口中都有一部《格萨尔》。”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时，常用三句话来概括史诗的全部内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传说中，格萨尔王为神子推巴噶瓦转世，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为民除害，16 岁赛马称王后，率领岭国 30 员大将，南征北战，降伏妖魔，建立了强大的岭国。其完成使命后，又闯入地狱拯救母亲，以及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然后与母亲爱妃一起重返天界，而他的故事则留在了每一个岭国人的口中，千年不衰，这才演绎出如今这部近一百五十多万诗行、一千五百多万字的史诗，并逐渐流传于蒙古族、

土族、裕固族、撒拉族、普米族、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羌族等各个民族之间，产生了北方格萨尔、突厥格萨尔、格萨尔可汗、江格尔、昌·格萨尔、霍尔·格萨尔、朱古·格萨尔、阿尼·格萨尔等等与之血脉相连而又各具特色的英雄格萨尔，甚至还出现罗马·格萨尔(即“凯撒大帝”)、汉·格萨尔(“关圣帝”)的说法。

据说文革前，在格萨尔神庙的窄窄的净面上，仍贴有一副用红色土纸，黑墨正楷写的汉字对联：“师卧龙将子龙偃月青龙，兄玄德弟翼德威镇孟德。”这幅关帝庙中常见的联句，似乎仍将《格萨尔》误认为是“汉三国”的藏版，将格萨尔当作是关圣帝。

而最初西方世界对《格萨尔》的了解却是通过蒙古《格斯尔》的接触获得的。崇祯三年(1630)，有人根据一个青海《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叙述，把部分内容译为蒙文版的《英雄格斯尔可汗》，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北京出版，共七章 177 页。这是《格萨尔》首次用文本形式刻印出来。1772 年，西伯利亚旅行家帕拉斯(P.S.Pallas)在麦钦搜集到最初的《格斯尔》资料，并带回欧洲，在 1776 年出版的《蒙古历史文献的收集》(圣彼得堡版)一书中，他首次向世界介绍了这部史诗，论述了它的演唱形式及其有关的经文，并对主人公格萨尔作了评述。1836 年，俄国学者雅科夫·施密德(I.J.Schmidt)用活字版刊印了这个蒙文本，后又译成德文，于 1839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这是《格萨尔》在西方世界最早的出现。此后，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到康藏地区寻找格萨尔。1946 年至 1949 年，时为巴黎大学教授的石泰安(R.A.Stein)，受远东学院排遣深入到德格、邓柯等一带考察，得到了各种版本的《格萨尔》，其中包括一部三章本《格萨尔》木刻本，他根据藏文本逐字逐句翻译后于 1956 在巴黎出版，题为《岭地喇嘛教版藏族格萨尔王译本》。这是第一个比较忠实于原文的国外译本。随后，他又接连出版三本研究著作，指出格萨尔的名字来源于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格萨尔是“罗马恺撒”(CsSdYsdRome)的变音，“各民族史诗的英雄用相同的名字，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确切地说明，罗马恺撒的军威是怎样来到藏人中间的，从新疆这条通路似乎是可能的。”这种说法，在西方格学界仍颇有影响。

不过，在 18 世纪藏族学者松巴·益喜班觉尔看来，格萨尔却又是另一种形象。这位当时名闻全国、备受崇敬，曾被清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接见并封为嘉那堪布的大学者，在收到六世班禅白丹益喜两次去信询问《格萨尔王传》的有关问题后，一一作答，并写成专著《答问》之部，收入《松巴·益喜班觉尔全集》，藏于甘肃省拉卜楞寺。他在《关于格萨尔的答问》中说：“所谓格萨尔的生地，是在德格左边、康地上部的林哇地区。此地名叫吉尼玛滚奇，格萨尔即生此地。”“格萨尔降生为父亲森隆、母亲杂如的儿子。他生后不久，被其叔父晃同赶到黄河源头的扎陵湖、鄂陵湖及青海附近的拉隆玉朵地方。”“格萨尔是一位武艺很高、机智勇敢的人，娶了梅萨绷姬和林加里的姑娘珠牡姬大小两房妻室。格萨尔的马叫做江郭叶瓦。”“那时候，霍尔白帐王、黄帐王、黑帐王的匪军到了林哇地方，杀了格萨尔的祖父皆居谢尔和兄弟 30 人，掳走了叔父恰干和珠牡。珠牡被白帐王纳为王后。”“格萨尔带了大批林哇军队来到牙才卡玛城，把铁链挂在城墙上，进入城里，杀了霍尔王和众多霍尔军。”“以后格萨尔到邓部落去，被那里的猛犬追逐，马惊坠地，因而致死。”因此，他得出结论：“格萨尔虽然实有其人，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而用了添枝加叶的渲染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面目了。”“格萨尔的故事，象汉族唐僧一样，……是经过夸张和文学加工而成的。”



格萨尔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人物？格萨尔究竟有没有历史原型？至今格学界依然争论不休，尚无定论。不过，或如德国哲学家沃格林晚年所说：“对我而言，学院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的，它们要求成为一种科学，那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各种事情的讨论而已，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基本问题。”对于民间传唱格萨尔的百姓来说，无论格萨尔是历史还是传说，在他们心目中，格萨尔永远是那位骑在马背上，人神合一的狮子王，为他们带来安宁吉祥的英雄王。

2002 年，德格县人民政府在岭·格萨尔纪念堂外开阔处，竖立起高达 7 米、重数余吨的格萨尔骑马征战铜像。神骏昂首扬鬃、刀剑辉映日月、英雄叱咤风云，在威风凛凛的格萨尔铜像前，一位满是沧桑却没有年轮的白发藏族老人，口诵真言，燃起桑烟，当香气浸透河滩时，我们依藏民习俗，手举哈达，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祭拜仪式。接着，阿尼老人在格萨尔铜像前，为我们讲唱起千年的古老故事。

年近 70 的阿尼是目前四川藏区已知的最年轻最受欢迎的艺人。15 岁时，他梦见一位身穿白衣，骑着一匹白马，全副武

装的格萨尔化身曼青热嘎（藏语音译，莲花生大师点化的名字），在梦中教授他说唱《格萨尔》的唱腔，便开始偷偷学唱《格萨尔》。在当时，他为此常常受到批斗。他的老师曾送给他一杆类似传说中格萨尔用过的九节马鞭，马鞭上挂着一个印有天然菩萨像的翡翠玉，与传说中格萨尔披过的铠甲片相似。他在给我们说唱时，手里依然握着那杆马鞭。说唱中的阿尼，并没有出现传说中如神附体的痴迷情形。在晃动的相机和猎奇的眼光下，他简短的说唱反而有些拘谨，眼中似乎总流露出一丝不自信与疑惑。

说唱完后，阿尼有些笨拙地为我们递上他的名片。明黄的名片上，用红字印着他的三个头衔：“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格萨尔说唱家”、“藏族男高音歌唱家”。当我们表示钦佩时，阿尼的眼中掠过一丝得意。2003年9月，坎坷一生的阿尼开始在德格县文化局上班，有了每月300元的固定收入，偶尔还有一点外出说唱时的演出收入，但大多时候属义务说唱。如今，阿尼的最大心愿就是把自己的80个唱腔传下去。目前，德格县文化局有一位汉族姑娘跟随他学习藏语，但阿尼希望他的孙女泽仁曲珍也能继承他的衣钵。阿尼的孙女虽对此有点兴趣，但似乎更崇拜从德格走出去的歌手亚东和台湾歌手阿杜。

在离开英雄诞生的这片草地时，淅淅沥沥的雨水又从天而降，一道彩虹出现，一头连接起草原，另一头伸向浩茫的天空。传说中，格萨尔王出现的时候，便有此景观。此时，已近黄昏。默然回首，那片草滩又恢复寂静，只有孤独的格萨尔王，独自伫立在阿须草原美丽而漫长的薄暮中。

晚上，我们分别投宿在格萨尔大王酒店和一家新建还未取名的客栈。格萨尔大王酒店，其实就是岔岔寺巴伽活佛的家，是一座典型的藏式家庭客栈。那天，我们没有见到巴伽活佛，因为他去成都看病了。在他那间在当地堪称豪华的会客厅中，我们见到了他的侄儿普雄。这是一个看上去几乎可以说非常八零后的青年，帅气而开朗。他曾经到上海学习汉语，如今来往于北京与阿须之间，学习并兼做虫草生意。意外的是，我们还遇见一位在北京工作的上海姑娘余琼。傍晚和她一起走在阿须乡的小街上，不停有人与她打招呼，即便是骑在摩托车上飞驰而过的人影，也会为她留下一声被风拉长、只有她能懂的亲热叫声。为此，余琼颇为得意：“他们都奇怪我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哈！”当然，搭车这样的难事，对她来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而此时，她像活佛的家人一样，一边招呼我们，一边娴熟地做晚饭。“他们说我的西红柿炒蛋好吃，所以我就给他们做这个。”她抬头笑着说。余琼很爱笑，笑容爽朗乐观自信，非常有感染力，这让我这位猎奇者的笑容变得虚弱与苍白，同时也让我迷恋和艳羡。

自1999年偶遇阿须后，十年来，余琼每年都会来到这个地方，参与或独立拍摄、撰写了《走进唐蕃古道》、《雪巴拉姆藏戏团》、《南派藏医》和《回到德格》等康藏题材的纪录短片。晚饭后，余琼又给我们介绍了她拍摄了十年、即将进入后期制作的纪录片《二十岁的夏天》。片子记录了岔岔寺小喇嘛噶玛、民间画师多吉和刚通过藏医招工考试的女孩觉安从十岁到二十岁的成长。噶玛是她第一次来草原时认识的，“最初一直以为他是个女孩。当年他的一张黑白照上的笑容，着实打动了我，于是每年回到草原我都会去看望他，看着他长大，小时候爱笑他如今已经变成一个冷峻而又庄严的小喇嘛。”噶玛也用MP4听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他所在的岔岔寺并不排斥学英语和用电脑，“这三个小孩儿特别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表面上看，外面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还是很有诱惑力的，但一细想，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干吗要杞人忧天呢？”

看完吴琼纪录片的一些片段，夜还未深，我便去另一家客栈住宿。与活佛家的格萨尔大酒店相比，这家还未取名的客栈少了一个让人留恋的客厅，只有一排客房，每个房间三五个床铺。一个白色的陶瓷洗脸缸格格不入地绑在色彩艳丽的藏式走廊中间，那是客栈唯一的盥水处。穿着黑色藏服带着藏式项链的女主人早早烧好了热水，只要有客人回房，便将热水提到洗脸缸旁，站在一旁笑着看着你，未及开口，便及时递上热水或是冷水或是洗脸盆。这让打小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我有些不自在，仰脸对她说：“你的项链真漂亮！”女主人依然只是看着我，抿着嘴笑。因为当地的居民大多不懂汉语，那带着浅浅害羞与好奇的笑容，便是交流的语言。

半夜三点，剧烈的高原反应让我起来，独自在月光下呕吐。抬头，望着亘古不变的星空与草原，又仿若进入一个没有历史的天荒地老的境地中，在那里，流逝的不是时间，却是我们自己。诗人昌耀的孤独一下将我击倒：“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此时，我终于体会到他的《意义空白》：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不复分辨梦与非梦的界限。

有一天你发现生死与否自己同样活着。

有一天你发现所有的论辩都在捉着一个迷藏。
有一天你发现语言一经说出无异于自设陷阱。
有一天你发现道德箴言成了嵌银描金的玩具。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呐喊阒寂无声空做姿态。
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担忧不幸言中万劫不复。
有一天你发现苦乐众生只证明一种精神存在。
有一天你发现千古人物在一个平面演示一台共时的戏剧。

不过，也正如诗人所警告的，“勿与诗人接触”，“在这些人冰凉的眼里，情感是危险的病毒”。从康定到道孚、炉霍、甘孜、德格一路走来，并不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时间都只是原有的时间。”恰恰相反，时间与历史流逝的痕迹清楚地在这里呈现，恰如正好也在康巴考察的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寻羌田野笔记中所说：“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只是，当时代的巨浪翻滚上四千米的阿须草原时，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只来得及将一些最常见的东西散落期间，便匆匆退去。在浪潮未逮之处，在那深藏在高原皱折中的村庄中，时间似乎依然沦陷在历史某处。

虽然，巴伽活佛的吉普车、简陋藏式客栈中的彩电以及席梦思以及噶玛的 mp4 和电脑让我坦然对之，毫不惊讶。不过，当面对一个用仅会的汉语说着“钱、钱、钱”，不停向你乞讨的孩子；看到在泥泞路上踽踽独行的妇人搭上车便感激笑颜，以及挂在墙上的北京留影所显示出的自豪；想到阿尼老人对其孙女前途的担忧以及簇拥在每个餐馆门口，守着一小袋菌菇的村民们的眼光时，诗人的浪漫与冥想似乎已成为浮士德式的精力过剩与矫情的心灵创伤，甚至让我觉得，用照相机对着他们以及他们的土地时，都成为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是对他们的一种“占有”，一种比印刷品还要危险的东西。



在阿须草原，德格县文化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带我们参观完岭·格萨尔纪念馆后，指着院中的一块大石头，介绍说那是格萨尔曾经的拴马桩。接着，他又带我们看纪念馆不远处的一块并不奇特的大石头。据说格萨尔的母亲正是在这块石头上生下格萨尔的。当时，其母用力过大，将大石蹬裂，至今石头上留下两个深深的脚印。据介绍，单就甘孜州而言，有关格萨尔的遗迹就达数百处，如离岭·格萨尔纪念馆附近就还有格萨尔龙狮虎鹏宫遗址、贾察欧曲错宗遗址以及格萨尔王大将尼奔达雅的遗迹等；而在整个康区有关格萨尔的遗迹多达数千处，而有关他的零星传说几乎比比皆是，随处可见。随意一块石头凹痕、一棵大树的疤痕、某座山峰的形状、一条河流的走向，似乎都有可能与格萨尔有

关。这些零星的传说，反而让我感觉到格萨尔王的虚幻与远离，却又不忍说穿，只能是一笑而过。

在阿须乡成都大饭店吃饭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份宣传资料——一本又大又厚装帧精美的硬皮书《格萨尔文化在康北》，是“首届格萨尔暨康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讨会”的资料汇集，内容多是枯燥的论文、讲话和新闻报道。只有静心仔细阅读，才能在字里行间领略到格萨尔文化的魅力，如格萨尔绘画、唐卡、藏戏、舞蹈、雕塑等，以及有着藏族文明“活化石”之称的德格印经院。不过，在这本资料中，千年之前的英雄格萨尔王似乎成了文化旅游产业一个招牌而已，即便浓妆艳抹，也难以掩饰他的苍老与无力，犹如我们第二次与格萨尔的相逢。在返回到甘孜县时，一位据说是神授的艺人在喧哗的饭厅里，为我们再次说唱起《格萨尔》。离开了草原，离开了故事的背景，老人在宾馆里的说唱更加难以吸引我们，似乎只是一个节目表演，其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不及一位曾有幸踏上老毕的星光大道的孩子的演唱。那时，这位老人也远远站在一边欣赏台上的表演，身影落寞。

其实，一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格萨尔王的故事，而是时不时出现的泥石流造成的道路阻断，这让我们的行程远远大于计划中的时间，几乎是披星戴月地赶路。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从道孚八美镇返回到康定的路上。因道路阻断，我们在八美镇滞留了近六个小时，下午五点，才得以继续出发。然而一路都是滞行的车辆，只能逐段放行。行到事故点，我们不得不弃车步行，因为刚刚新修起的那段道路，无法承受过重的车辆，大卡车一律不能通行。待我们翻越山头，站在山顶，看着我们的中巴在不停的呼喊与牵引下，心惊胆战地驶过那段几乎不成路的山路时，掌声与欢呼声震动山头。将近凌晨一点，我们终于越过折多山，回到了康定。当我们吃饱喝暖，躺在久违的床上时，不知仍有多少车辆滞留在那个荒芜的山头过夜？一直在前面开路的明可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饿极了，于是在山头一个工棚里要了一碗白饭吃：“哪里好意思吃人家的菜啊！只有一盘土豆丝，能分我一碗白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样的事情在这里似乎并不罕见。大约两年前，我独自来到八美镇，在返回途中，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翻越折多山的道路阻断将近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慢慢放行。当时，我有幸搭乘上一辆成都驴友的中巴，走走停停向折多山顶驶去时，几乎每隔几步，便能看见一辆驶出路面的车辆。到达山顶时，在大雪中饿了一夜的路人，连我们师傅手中吃了一半的馒头也强讨而去。那一次，我们到达康定时已是下午六点，平时只需四个小时的路程，花了将近两倍的时间。在康定，一人匆匆吃完一碗龙抄手后，我们便马不停蹄地继续赶路，到达成都时，也是将近凌晨一点。

不过，这种让我感慨万分乃至大惊失色的事情，在那些康巴汉子看来，似乎是“万水千山只等闲”之事。在那些井然有序等待放行的康巴汉子的脸上，有着随意而安的淡定与桀骜不驯的野性；在那些彻夜抢修道路维护交通的康巴汉子的身上，散发出强勇彪悍的血性与豪气冲天的干劲。此时，英雄格萨尔的征战马蹄声，在这粗犷恶劣的道路上，依然没有停止。只是为何，这场征战要持续千年之久？

或许，理解今人远比追悼古人痛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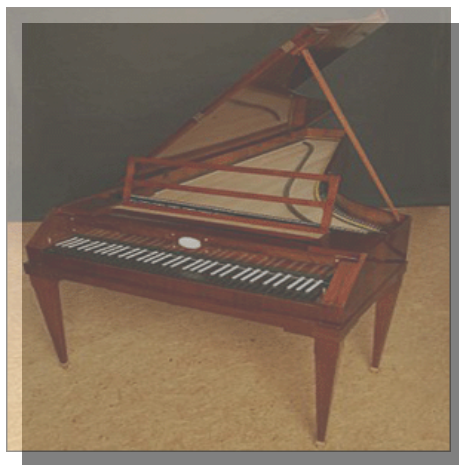
ON SPOT 现场

温哥华早期音乐节杂记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huiyuanma@gmail.com）

去年的早期音乐节(Early Music Festival)我看了几场，然后就决定加入这个音乐协会的志愿者之列，结果确实好玩，认识了不少妙人。今年这个系列音乐会开场之后，我就戴上志愿者的牌牌，成为卖票、卖咖啡、看大门的人士之一，跟音乐家和别的志愿者们聊得高兴。

我们这儿，喜欢早期音乐(一般指巴洛克音乐)的人，成分很杂，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是买很多CD、很懂行的发烧友。当然，知识分子和受过训练的演奏者，也占不低的比例。我认识一位做花匠的女士，她坚持十几年给音乐协会做志愿者，还到合唱团去唱安魂曲。还有退了休的小学老师，她说这是“聪明人的音乐”有机会就给自己的学生听。他们都非常阳光、愉快，点滴小事中充满对他人的关照和善意，让我简直有点喃喃咕咕，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高兴的人！而负责组织志愿者的小美女阿丽莎，读过爵士钢琴的本科学位，现在当这个小头目，自己接着跟私人老师学作曲，也到合唱团唱歌，有时出席个小演出什么的。我担心她不满这种读了音乐专业但并无稳定职业的生活，不过她很热爱音乐，“不能想像没有音乐我怎么活”，也许其实就够了。



Fortepiano(早期钢琴)

在演出之外，这次音乐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系列免费讲座，谈和这些巴洛克音乐同时代的文学、美术和乐器制造背景。最近我有点迷恋于此：一个内行的教授或学者，用他的理解来口语化地讲他的专业。你可以想象，为了吸引听众，显得幽默好玩，加上个人偏好，他必然夸大甚至稍稍扭曲一些东西，所以你不能全信——而这正是我以为有意思的地方。你看到历史被一个知识分子在某种场合下的转述，这本身就是历史，甚至，也是社会——因为这是事实映射在某人心中之后

的取舍。

其实还有一层意思让我着迷。这些偏门学问似乎远离世界，但你看见这些活生生的家伙，把自己的半生投入进去，出落成对十七世纪绘画流派或者教堂音乐如数家珍的人，这种情景其实很有说服力：不管文雅的东西今天怎么像“弱势群体”，它仍然和很多人的生活紧密“咬合”着，所以无法从世界中剥离。

某天来讲课的是一位荷兰大牛，羽管键琴家 Jacques Ogg，他是这次音乐节的 fortepiano(早期钢琴)和羽管键琴演奏者。我见过他，也小聊了几句。他谢顶、小胡子，身材可以用“一坨”来形容，好像个农场主。他说话极其随便、家常，谈不谈音乐都眉飞色舞。我听音乐会时用望远镜观察过，他气定神闲，嘴角有天真的微笑。那些飞溅出来的海顿之声，真是好可爱。

这些弹早期键盘乐器的人，感官必然有不寻常之处，因为那些古乐，在现代人听来如此阴柔、细腻、婉转，让人无法发泄激情。身为男人而自小坐在这种拘谨华丽的东西跟前，一年一年弹下去，这都是什么人物？我不知道。这是音乐和人生的秘密。



Jacques Ogg

他还讲了库泊兰等等句子的弹法，因为乐器局限以及习惯，什么音要保持，跟乐谱记载是不同的。巴赫深受其影响，甚至很多音乐都是直接抄他的，所以巴赫的很多音乐，也要这么弹，但很多演奏者都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源头在库泊兰那里。我这才感到，再怎么读谱，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回家后，我大展八卦强项，在 google 上人肉搜索了一下，看到他的照片，正是那熟悉的豪爽大笑。原来他曾经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跟莱恩哈特学过四年，之后开始了在早期音乐家中少有的成功生涯。他录制的 CD 不用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到。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提一下他的生活：他现在荷兰 Hague 音乐学院任教；他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有自己的庭院和花园，他有自己的果树和伴侣——一只黄毛猫咪。网上的信息、访谈往往就是这样，只保留这些最安详、完美的印象，不过回味着他的演奏和言谈，我几乎相信他就是这样满足于自己的生活。

我翘首盼望他的讲课，早早去了。这家伙太好了，一进门就发资料，都是我最想看到的，比如拉莫，库泊兰、海顿的谱例。听他讲得唾沫横飞兼在三台琴(大键琴，小键琴，Fortepiano)上弹，但其实很多事情我都没听明白，于是蓄谋结束之后跑到他跟前让他演示一下，结果还真得逞。我有一大堆问题，比如羽管键琴上的踏板到底怎么用？音栓都是什么样子？古乐器上的短八度到底咋回事？看 Ogg 老师比划，我才明白了。我今天还头一次亲眼看见小键琴这个柔弱的东西，这一台，连腿和架都没有，像古筝那样放在桌上，因为是拨弦，所以有音量变化(尽管很小)，还可以揉弦。他在上面弹海顿。

令人费解的布鲁克纳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回国几个月，可能是在波士顿听了太密集的音乐会，回来后对现场音乐会顿时失去了激情，就连朋友强力推荐的琉森音乐节和阿巴多的组合也无心去听，唯一想凑热闹的维也纳爱乐，又寻不到低价票的踪影。不过听乐还是得继续，就如生活就得继续一样。

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自然是举世名团,毋庸置疑,但是它从未访问过中国,加上其前任指挥布隆姆斯泰德(Herbert Blomstedt)行事低调,对于大众而言,并不具备如BPO那样的明星光环。夏伊上任后,也不像许多指挥一样到处带团走穴,反倒是延续前任指挥低调磨砺的作派,所以尽管夏伊指挥莱比锡的专辑陆续上市,但是录音毕竟与现场还是存在相当距离,对于国内乐迷(甚或是欧洲乐坛)而言,莱比锡布商大厦乐团似乎只是一个“低调的传说”。

提起德国的各家乐团,自然非我等能评头论足,但我曾在波士顿听过一场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演出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明显感觉法比奥·

路易斯棒下的乐团风格虽然明丽清晰,但缺乏德奥作品中一贯的雄峻,甚至还不及波士顿交响乐团,更无法与前年访华的慕尼黑爱乐相提并论。不过根据最近的消息,蒂勒曼将离开慕尼黑爱乐,接替路易斯执掌德累斯顿管弦乐团,重振德国的歌剧传统,这是否会让SSKD能有风格的大转变,当拭目以待。

相比起来,在我的录音收藏中,夏伊的录音相当稀缺,唯一几张马勒也只是他与RCO之间的合作录音,其余少见他的讯息,其实他录制了几乎布鲁克纳的全集,勃拉姆斯全集,以及马勒的大部作品,但于我而言,这位以指挥歌剧出身的意大利人,能否操控莱比锡这样的德奥名团,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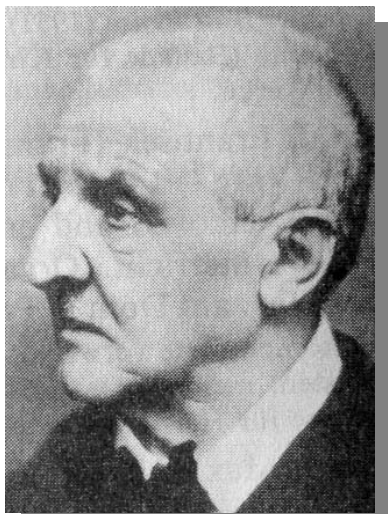
这次大剧院的高价票出售情况比较惨淡,我买的三张低价380的票最后被换到一楼正厅的10排,估摸应该是千元左右价位的位置,听说前一天的演出也是如此,相较柏林爱乐时的追捧疯狂,上海观众这次未免有点“不识宝”了。

按照历来访问上海的名团曲目而言,这次无疑是有所突破的,无论头天的马勒第一,还是昨晚的门德尔松“宗教改革”与布鲁克纳“第四”,都并非常见曲目,我在波士顿听了一个音乐季,居然没有一首布鲁克纳!而且我查看了09-10的音乐季安排,列文安排了全套的贝多芬,但还是没有布鲁克纳,尽管列文一直声称要在保守的前提下推进现代曲目的演出,但是我还是隐约的感觉到,BSO对于德奥系比较宏大的作品,似乎是有意避之,去年那几场马六虽然精彩绝伦,但是仍然带有强烈BSO印记的,即“温暖”多过“沉重”。

回到昨晚的演出,可谓“辉煌”无比,从门德尔松的绚丽弦乐到布鲁克纳的砖砌般的铜管部分,构造出一个强烈的气场,尽管大剧场的声响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闷”,压抑住了弦乐的明亮部分,但是铜管与定音鼓的雄壮、干净却相反更为突出。设想莱比锡要是去波士顿的交响乐厅(Symphony Hall),那该是何等的效果?

尽管门德尔松的作品一如既往地让人神清气爽,但是昨天下半场的布鲁克纳第四,却让我疑窦丛生,于我而言,布鲁克纳并非是一个“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其音乐风格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相较起贝多芬、勃拉姆斯,他看上去并不古典,他的曲风并不是古典曲式的主题-展开-再现结构,相反是一种大块状的结构组合,甚至彼此之间的联系让一个初听布鲁克纳的人都会强烈感觉到连接的“机械性”,反复重复的旋律也会让人疑惑,布鲁克纳到底意欲何为?不过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昨夜莱比锡在大剧院的演出,已经成功地营造出一个“真实”的布鲁克纳,所谓真实,是指莱比锡的演奏将布鲁克纳的曲式结构特征完美地展现出来,甚至可以说,也将其“缺点”充分暴露出来,如旋律单一与反复。但是这种“真实的布鲁克纳”,和我在录音里聆听所得,有着很大差别,演出之后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又反复听了切利比达克与海廷克的布四,仍然无法同那夜的感受相比,从意象上,

那夜的布鲁克纳是一个立体的形象,或雄伟矗立,或小溪潺潺,或神妙庄严,这种“神圣感”与理查斯特劳斯、瓦格纳这



类显然又有很大差别，表面上看来，布鲁克纳对声响极为看重，铜管与弦乐部分的齐奏所营造出的和声让人战栗，但是有趣的是，他经常会在齐奏中间插入法国号、长笛独奏，并且以极为舒缓、微弱的声响来作回应与承接，而且这样也让居于乐队后半的木管、铜管乐器与前方的弦乐构成了鲜明的立体感，在布鲁克纳的“声响”中，“高低远近”的结构特征如此之明显，近乎可以视为有意之举。想想布鲁克纳长时期所生活的教堂经验，或许可以部分理解布鲁克纳的音乐“向上超越”之一面，但是现代交响乐又提供了一个“横向”的平面意象，那就是依靠距离的远近来表达声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布鲁克纳又是现代的。

而且，布鲁克纳相较其忠实追随者马勒而言，旋律方面显然不及“弟子”，但是他的旋律却远非是枯燥无味的，布鲁克纳似乎有意地同时在旋律主题与和声效果上发力，可以清晰地听出对位结构（尽管缺乏许多作曲家配器上的层次感）和声响的立体感，这样使得布鲁克纳是如此之不同。

布鲁克纳到底意欲写出何等音乐？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能回答，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是“无意识背后的统一体”，或许部分揭示出布鲁克纳音乐的某些特征，从我有限的聆听经验来看，布鲁克纳的“雄伟”与“静谧”几乎是平分秋色，这使得大量现代浪漫派作品中的“将雄壮、激情进行到底”有所不同，布鲁克纳的“沉思性”也占据着重要的角色，这或许与他是崇敬的天主教徒有关？与此相反，马勒的那种“人只能靠自我拯救”的“主体论”截然相反，布鲁克纳有一种“等待”与“静候”的特色，要知道布鲁克纳的时代，都已经进入了后古典主义时代，康德都早在19世纪初就已去世，启蒙后的主体论哲学经由贝多芬勃拉姆斯已经推至顶峰，布鲁克纳却用交响乐来表达宗教情怀，真可谓是“开历史的倒车”，不过他和后来的沃恩威廉斯这些宗教作曲家有所不同（布列顿或许是个例外），威廉斯仍然处在一种信仰与人性乐观论的夹缝中间，而布鲁克纳哪里，只有虔诚与谦卑。他并不自信，因为他来自于上奥地利乡村，他与启蒙运动以来高扬人性的思潮几乎绝缘，他一步步的爬升到维也纳的高峰，结果却是更鲜明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部分来自于都市与乡村的主流与边缘角色，我想部分还来自于他从边缘而虔诚的乡村生活来到都市的某种怀疑与不信任释然，这使得我们常在布鲁克纳音乐中聆听到“仰望”的体验，比如布四的末乐章的开始部分，常常会感觉看到一座巨大雄伟雕塑缓缓升起的感觉，只能抬头仰望，比起贝多芬音乐中让听众与音乐融化在一起振奋雀跃不同，布鲁克纳让你有在高潮处停顿，停顿处上升的奇妙节奏感，强行解读这种感受，或许这就是人性自身的有限性与神圣性之间的巨大张力。

如果硬要特别突出那一夜莱比锡的特色，或许是夏伊成功地将布鲁克纳的结构感通过音乐声响表达的淋漓尽致，这种结构感并不是强弱远近的简单拼合，而是对音乐的力度、节奏在这么一个空间中如何铺成与展示的精细把握。

不过要指挥好布鲁克纳，并非一定需要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指挥，就如我所偏爱的海廷克版本而言（海廷克虽是荷兰人，但是却不信奉加尔文教派），他多次说，在布鲁克纳面前，他一直有如小学生，比起对待马勒而言，海廷克对待布鲁克纳的态度显得更为谦卑与审慎，他认为布鲁克纳的音乐中有一种强烈的天主教情怀，他也曾长时间怀疑过布鲁克纳，说其音乐有如一团岩石，并且十分古怪。

幸运的是，夏伊在那一夜的表现几乎有如让布鲁克纳在大剧院重现，尽管我对夏伊在某些段落上处理的过分戏剧化有所保留，但是莱比锡的管乐部分是如此之震撼，夏伊对弦乐与管乐之间的结构性切换作的如此之干净漂亮，几乎可以让我任何的“苛责”都失去其意义，毕竟他让我看到了“一块坚硬而不失细节的岩石”。

INTERVIEW 访谈

自由对我太重要——张树新访谈录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互联网给每个人开了一扇窗

苏小和：你最早在中国创建了瀛海威，是中国互联网的元老级人物。田溯宁在中国的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也一直想“把互联网带回家”。对于中国当下的互联网发展，你有一个怎样的理解和体会？



张树新：自互联网商业化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互联网的大众化应用是在 1998 年以后，1995 年到 1998 年，中国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大多是技术人员、精英，由于它很小众，当时技术手段和产品创新非常有限。2000 年后，互联网本身的应用大范围推广开来，当千万量级的用户每天能够上网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候，互联网已不止是信息的补充传递工具，而是作为信息源、传播渠道本身的力量已经显现。从 1998 年到 2005 年左右，大部分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及财富效应，包括网民规模的急速增加，使得互联网行业本身迅速成长。

当互联网已几乎变成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方式的时候，互联网的社会性影响已经初步显现。互联网已经不单是和报纸、电视、广播等其他类比的媒体，它已经变成了民众声音及其组织的最重要载体，也是民情反映和民智表达特别重要的部分。然而这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也许再过五年、十年，互联网反过来会促进我们现有社会架构层级的改变和信息的传递模式，影响甚至改变公共治理。所以未来的十年，可能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改变的意义远远大于它过去十几年曾经呈现的技术和财富意义。

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意义很奇怪，与其它信息管制方式不同的国家相比，其对中国的社会影响特别巨大。中国的社会架构自秦至清就没有发生太多的大的结构变动，而五四以来中体西用的结果并没有完成现代性的构建。首先人的身体本身被禁锢了很多东西，对于解决人的自由的问题，宗教解决了一部分东西，互联网解决了技术性的东西。它延伸了人身体的感官，它能让人听到、看到更多的信息，并有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

人的自由很重要。去年我开始旅行，我发现川南藏北和北京的区别，某些方面甚至大于中国和美国的区别。互联网的崛起促成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崛起，互联网首先由于利益驱动而产生，后来变成了一个媒介载体，现在我认为它更像一个“广场”。

苏小和：这个广场的概念很有意思。

张树新：有人问我：“你看了这么多书，喜欢这么多东西，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我说我喜欢罗素，因为我追求理性意义上的真实，当然不只因为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也包括他的人文关怀。其实互联网社会学所触及的学科也很广泛，包括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现代化历史等等。对于中国问题的求解，我是一直在寻找，就像中学时喜欢证明几何题一样，一直不断地找这种题来做，别人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啊。

我觉得我党为了现在的稳定，会牺牲长远，会导致政府走向“成本不可负担”。比如，互联网的国家防火墙问题，其实互联网从“孙志刚事件”开始，就开始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如果不去顺应和因势利导，用长城或三峡大坝的思路治理，只能使问题加速度积累。

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画面是在一间黑屋子里，有一扇窗，窗外是一片很美的绿色风景。我觉得互联网就像在每个人的面前开了一扇窗，每个人窗前的风景是不同的，所以互联网对每个人的意义也不一样。

互联网的启蒙作用

苏小和：你刚刚讲到“启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 1930 年的，我认为那时出生的人没有常识，你提到互联网在每个人心里开了一扇窗，那它是不是起到了一种恢复启蒙的作用？

张树新：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完全是螺旋的上升，而更是像台阶一样的阶梯状上升。中国的文明基因形成于先秦，从秦一统到 1911 年清朝结束，两千多年的朝代史并就没有什么创新性和启蒙性的东西出现。

我曾经去美国旅行，旅行中我在思考那些最初来到美国，建设新大陆的人们，为什么美国当时的民族精神充满创造力。

十七、八世纪来到美国的人很多都是来自西方当时已发达国家，他们所携带的成熟的文明与美国这片未知荒野的结合创造了美国两百年的辉煌。可是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早已被先人们开拓完成，所有的地理都是写好了的，我们不需要去发现。美国需要《国家地理》，而我们不需要。所以中国的朝代历史记载的都是同一种东西，都是同一类型，就是权术的高低比拼，徐霞客应是另类。

苏小和：对，都是低水平的“术”，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

张树新：所以我说中国有技术没科学。我认为中国的学术缺少“真”，不知道有没有“美”，科学的使命是求真，其实科学就是从宗教里分离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有发现、发明、技术，但就是没有科学。

苏小和：所以，在中国才应该更多的谈启蒙。其实，胡适那时候的启蒙是刚刚开始，却又没有成功。你再进一步讲讲互联网对启蒙的作用。

张树新：我认为，首先，互联网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很低。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其次，互联网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错位。比如师生的关系、医患关系等等。有些学生现在比老师还懂得多，那么老师凭什么是老师？当然，老师是起到一种传授基础知识的作用。再谈医患关系，其实医学是一种经验科学，我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医学的书，我一直想把自己身体每个部分的问题搞清楚，后来我再去问医生，发现他说的很多都是错的。互联网也促成了这种关系的错位，因为人人都能获得这些信息。再有，知识的独自占有、信息的垄断，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传统社会的因信息控制导致的权力关系会产生变化，当然这会对传统方式的政府管制产生干扰。

其实我后来的互联网知识是跟我女儿学的。她自己在电脑面前，很快就学会了很多工具，比如 Photoshop，没有人教过她，她自己就会了。她有时候在网上聊天，说她今天“见到”了谁，我问是真的“见到”了吗？是 physical 见到吗？她问我为什么要 physical 见到？我们两个人头脑中对于“见到”所反映的信息就不一样。

我们曾经提过移民和原住民的概念。我们是互联网世界的移民，我女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我经常看韩寒的博客，观察他的语言。再看王石的博客，他们的语言姿态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地震时两人持有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王石由于人们的谴责，最终选择道歉，而对于韩寒就没有那么多人声讨。所以，在互联网的世界，语言的姿态很重要。

看看现在的 80 后，有些人是非常有想法的。我们看到“新五四青年”，即“四月青年”，这让我们发现依靠互联网聚合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当年“五四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还是不一样的。



“国家防火墙”成本将不可承担

苏小和：肯定不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战争，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们的民族主义很具有 80 后的特点。你刚才谈到了广场这个概念，互联网世界的“广场文化”和“广场行为”是什么样子的？

张树新：广场文化其实是源于希腊的城邦。互联网最后造成了分众化——有人喜欢 BBS，有人喜欢视频，有人喜欢聊天。互联网发展到后来是“人以群分”，其实这种人以群分也许并不好，因为就是在共同倾向的那一群人里相互印证。

苏小和：互相嬉笑怒骂，其实正好映照出了对方。

张树新：论坛的“坛”字很有意思，“坛”过去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的？只有皇家才能使用。比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是皇家祭祀祭天使用的。而我们这个时代有成千上万的“坛”，成千上万的坛实际上是对皇家皇权的一种分化，是一种“再部落化”。

苏小和：这个观点很特别，很有意思。

张树新：坛和坛之间、坛的内部就形成了一个广场形式来表达观点。比如有人喜欢上天涯论坛，因为今天在那发的帖子，明天就有可能在某刊物上被发表了。如果想与物理世界产生互动，那就想办法去大一点的论坛。

最近我党经常提到“网民”这个词，他跳过了公民、国民，直接提出了网民，这其实已经短路了很多程序。因为网民

属于后现代出现的词汇，现在有很多“五毛党”在网上争来争去，但我后来再一想，这种“五毛党”的状态总比直接封杀好一些吧？

苏小和：你前面提到“国家防火墙”对于互联网管制的成本有一天会不可承担，再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张树新：因为 Web——互联网的网是没有中心的，中间是空的，通过一个一个结点，平行再展开成一个大网。所以“坛”也可以无限扩张。前段时间，我与杨鹏谈话，杨鹏谈佛，佛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都是佛，心动万物动，没有局限性。互联网也是如此，比如 163 网，169 网，我曾亲自经历和体会的，如果想做物理性的管理，就需要设置几个门，或者罩子，把一部分网罩起来。当局现在用“关键词”来过滤，比如某某关键词查不到，或者这个关键词无法在网上发布和获取，这其实很累，因为最终可能导致这些关键词会变成一本词典。就像古代的“长城”思路，以为垒个长城就能把蒙古人拦住，但蒙古人还是打过来了。所以长城的思路是没用的。

信息技术创新产生很多新应用，包括 IP 代理技术和路由技术，还有现在的 3G 技术，管制难度会不断增加，需要过滤的东西将会更多。我在猜测政府将来会不会在 3G 上再来一些“关键词”过滤，但技术的变革是很难阻挡的，所以政府现在的改革是“进三步退两步”。如果不改变管制思路他今后要承担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苏小和：技术的改革是不能阻挡的，这是一种博弈。我们总说，现在还是一种“全能的政府”，即所谓的大政府。而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市场，那互联网和全能政府之间的博弈是怎样的？

张树新：全能政府必定会背负着全能的责任，全能政府最有效的时候是在灾难和战争的时候，比如我们看到地震的时候，全能政府能迅速地做出反应。但全能政府的包袱也很重：第一，社会上很多事情是多元化的，想管得太多，反而管不了。第二，社会是由各个社会细胞组成，基层社会的细胞增量很大，比如“黑社会”、“贫民窟”，其实有很多就像我们电视上播的国外的黑社会、贫民窟一样，只不过是很少报道出来，也很少有人管。社会细胞繁殖太快，管不过来。而大量组织控制资源又都由政府把控，管的东西太多，这种关系就会太紧张，因此腐败变成了社会运行的润滑剂，这样可以互相压制，互相平衡，维持社会的存在。为什么腐败屡治不绝？也许这是个原因。

目前是个“公”、“私”难辨的社会

苏小和：你刚刚谈到了公与私，企业家的产生我觉得首先是为了私，为了利益，后来开始慢慢有了对社会的关怀。你认为当下企业家的状态是怎样的？

张树新：企业家发展到后来，有些分化，一部分人只单纯经商；一部分人经商同时试图担负起“精英责任”，试图进行公共思考，用自己的公共能力为社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有人成立了某个基金会，当然不排除有些人还是为了名或利，其驱动为“私”，但结果为“公”。有些是真的想做事，从动机到效果是公共性的反应。但是企业家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是没人理解他。因为没人证明他的公共承担有些不再是为私是真实的，我们目前的社会上没有一个人能区分“公”和“私”的道统。

苏小和：在亚布力的时候，我听完张维迎老师讲的奥地利学派，还有他后来讲的那段话，我全听懂了，我觉得张维迎真像一个艺术家，后来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张维迎的行为艺术》。我相信台底下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话。

张树新：在“公”“私”难辨的社会中，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没有形成共识，就会造成价值观的冲突与混乱。我们上次参加阿拉善 SEE 的活动，顺便去刘老根大舞台看二人转。去的路上，大家嘻嘻哈哈。但看完二人转之后，全车的人都无语，其低俗程度大概把大家都“雷”着了。

政府常常以反低俗之名进行治理，最后却形成了更低俗。我们看的那个表演宣扬的就是“钱可以买一切、自残、互相伤害和侮辱”，说的话和行为极端低俗。我是东北人，我知道东北的“炕头儿文化”很俗，但我没想到今天被表演成是这样的。那个舞台上，有人拿板砖上来，表情很夸张地问一个女的，多少钱可以摸一下。这是一种流氓文化，是一群暴民。很丑，



丑到极点。但现场真的有很多人在笑，很多人在捧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东西还那么受欢迎？居然还受我政府支持？

对于这些社会文明基本面的共识，不是企业家精英自身可以担负的。

我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人生之权利，有人说孙中山为了自由民主而牺牲普适价值。

苏小和：对，也有人说当年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是为了救中国，而不是救清朝。是为了拯救一个国家，而不是为了拯救某个朝代或某个政权。

张树新：何为民族国家，何为普适价值，何为自由民主？其实我们有太多问题从根儿上都是模糊的。

苏小和：你最早创立了瀛海威，后来你说自己喜欢旅行。你的变化是不是因为这种在这种大政府的环境下生存的艰难？

张树新：我后来选择读书加旅行，去追寻答案，并不是因为在这种环境的生存艰难。是因为我自己的变化，我开始觉得自己在公司时的状态有些无聊，每天都很忙，总要先见一些不愿见的人，说一些很违心的话。我慢慢反思，问自己当初下海到底为什么？为了赚钱，为了买好看的裙子。赚钱为了什么？为了在海边买个房子，装满一房子的书，天天看书。我是一个在商业过程中没有快感的人，也许天性并不适合从商。现在达到目标了吗？那我为什么还在做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

反思很重要。现在社会上很多精英范的人喜欢装神弄鬼，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做法，一个无神论者，把自己弄成神一样的让大家敬仰和崇拜。

企业家没必要装自己是神，别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而且要反思、要对社会有关怀和承担。企业家要回归平常，而且不单是独善其身，还要有担当。现在由企业家构成的 NGO 组织很多，像亚布力论坛，阿拉善 SEE。企业家非常尊重规则，所以企业家办的 NGO 组织会长久一些，逐渐建立共识。我相信以后亚布力论坛，将不只需要像维迎那样的经济学家，还需要优秀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哲学家等等。

寻找是为了活得明白

苏小和：我理解你的意思。你一直在寻找各种问题的根源，一直再问为什么，问自己是谁，我们想知道促使你去找寻的原因是什么？

张树新：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原来是学科学的，后来又去做记者，但是发现记者只是喉舌的时候，就结婚生孩子去了。

我们九十年代初决定下海做生意的那帮人，有很多人在当时是因为无处可去，而从商给了我们自由的可能。后来，我们这些人又开始分化。我曾经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企业家，但后来我想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企业家该去想的事儿，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好商人。

我进入互联网行业太早了，当一个行业在市场上发展到 0%-5% 的时候，这时进入它是非常危险的，瀛海威就创建在这个时候。当这个行业发展到 30%~50% 的时候去进入，会相对容易成功，后来就崛起了一批互联网公司。当发展到 50% 以上的时候，这个行业就已逐步走向成熟，机会也变得少之又少。虽然瀛海威进入互联网的时机太早，不成熟，但是互联网给我个人开了一扇窗，这扇窗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都很新鲜，能够让我不断地去探索与思考，让我特别高兴，这是我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后来我们又做投资，做了很多其实传统的商业经营，很多事情让我又不自由了，所以去年我就彻底把自己退出来，我实际上只做股东。如果你做生意，只是为了获得富足的生活，那就会开始不快乐了。我是突然觉悟的，所以就彻底不管了。然后我开始旅行、读书。因为我每天的时间真的不够，本来起的不早，有时还要兼职管理些公益的闲事儿，我又好客，经常有很多朋友来我这儿，一起聊天喝酒，根本不能满足我一天 8 小时的读书时间，所以我干脆从商场退出来。

我现在特别喜欢一个字，就是观察的“观”字，“观”字拆开来就是“又见”，再次见到，我要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自己，观察社会，对我来说，活的清明最关键。我就是想能活得明白。

我想知道的问题很多，比如三大宗教都是起源于一个地方为什么还在那儿死打？我计划今年要把中国游完，然后再去国外我喜欢的地方，临死前要把所有钱都花光，我都计划好了。我跟我女儿说了我的计划，我说要把自己所有的钱花光去旅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女儿说那你给我留一套房子吗？我说不留，我最后要把房子都卖掉。她说那自己就要换专业，因为她原来的是学美术的，天天画画，不容易赚钱。她说要转到设计专业，这样能赚钱养活自己，要不就找个有钱人嫁了。我说那你随便。

我喜欢旅行，看到地图我就高兴，我和我先生出去的时候，他开车，我在那儿看地图，喜欢顺着线路找这找那。

苏小和：这种状态很好。你知道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世界，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宗教的世界，你有没有什么信仰？

张树新：在信仰方面，其实我对宗教哲学很感兴趣，读过很多相关的书，也去过一些宗教圣地观察。我的很多朋友是有宗教信仰的，信佛的、信基督的、信伊斯兰教的等等。有朋友说我是游离在宗教之外的流浪的天使。我追求的是那种理性的东西，可以解释的东西。

苏小和：所以你很喜歡羅素。

张树新：对，我喜欢罗素，不只因为他在学术方面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文关怀。

不同的宗教都是一种生命与宇宙的解释体系，很多有体系的人（信教者）其他的東西可能就不看了，我覺得這很可惜，因為犧牲了尋找的樂趣。如果我追尋的真的東西是一個黑洞的話，那麼我會對它很尊重。我很尊重我不知道的東西。我特別喜歡看藏民朝拜時的那種眼神，宗教的力量真的很強大。藏民的朝聖的眼神真的很乾淨、很純潔。

人骨子裡的善，也許是不能完全透過某個組織來表達的。比如有些人，他一旦有了信仰，他就可能會用這個信仰來解釋和看待他周圍的一切人事物，那就有局限性，不客觀了。

苏小和：我覺得你的信息量非常大，思想很丰富，那你有沒有想把他們記錄下來？

张树新：目前，我還沒有想把那些信息和思想記錄下來。首先因為我很自私，很多問題我只是想自己搞明白。追尋問題過程中的愉快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現在去一些地方也會做一些筆記，比如我去過佛教名山普陀山，普陀寺的住持覺得燒香不好，就在寺門上貼着“不要燒香”，同時講了很多佛學的道理，但很多人都視而不見，還是去燒大把的香，用此方式來拜佛，却並不關心佛的真意，這幅畫面很有意思，很諷刺。要不是我們去外面走走看看，那我們身在北京的名利場中真是什麼都不知道，而且還自以為是，所以我想在50歲前把自己想去的都去完。

苏小和：我也很喜歡看書，所以看到你滿屋子的書就覺得很親切，但我一般看到什麼就喜歡寫下來，寫東西對我來說不是負擔而是一種享受。我們又都跟劉瑞林很熟，我覺得你我是氣場相近的人，聽你說的這些話，我也是心有戚戚。梁文道說這是一個常識稀缺的年代，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這些想法寫出來，告訴普罗大眾，這麼多想法不寫出來很可惜。

张树新：對於我來說，不自由毋寧死。寫專欄、寫博客、寫書可能會給我帶來一些束縛，比如博客，你知道別人在看，那可能寫的東西就會被其所累。自由，觀察，明白，理解，講述，這幾個詞匯是有先後順序的，到最後才能講述出來。就像米羅的畫一樣，他年輕時畫過複雜、生動的莊園，很有技巧也很繁複，到了年老，線條愈加簡單、純真，甚至就像兒童塗鴉，但異常耐看，經歷與境界還是需要過程的。

人的認知是有個過程的。我現在還沒有完全找到答案，也許答案本身並不存在，但我尋找的過程很重要，喜歡這一種高興的情緒，不喜歡有什麼事情去阻礙我。

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中国

苏小和：我們聊聊你的旅行，了解一下企業家的生活方式。

张树新：我最近這次的旅行計劃是第一日到西安，從西安到成都。成都以前玩過，這次是要去一趟建川博物館，我看了好多那裡的資料，覺得值得去一下。

苏小和：很多人也跟我說建川博物館不錯，推薦我去看看。

张树新：然後要去雲南大理、騰沖，去滇西轉一圈，從滇西回來就往西北走。我現在都能背地圖了，因為一天到晚看地圖，我熱愛看地圖和地方志。

苏小和：你老公是一個駕駛員，你相當於一個導航員。

张树新：我是導航員，我熱愛看地圖，我有各種版本的地圖。

苏小和：地圖能延伸一個人的夢想。

张树新：我发现很多人不爱看地图，而且不会看图。

我們決定沿着滇藏線進藏，從德欽進去，上至芒康，從芒康開始是川藏南線，再到林芝，估計要走三天，一天兩三百公里，不能多走，到那裡時應該是“3.28”以後了。因為現在封路，不讓進。所以我們進藏的時候可能是4月初，也許會好

一点。本来打算去墨脱，但因为没有公路，只能走进去，太艰苦了。仔细考虑一下还是决定不去了。

苏小和：路上长时间的驾驶，不会觉得身体很劳累吗？

张树新：所以得现在去啊，老了就更没办法去了。我们原来去过西藏，我老公一般喜欢晚上开车，累了就到最近的旅馆住下。我们睡的很晚，第二天又很晚起床，很自由。我们从滇藏线接到川藏南线，然后进拉萨，在拉萨停留几天后去日喀则，然后到中尼公路上的珠峰大本营和樟木。我研究了很久尼泊尔，车可能过不去，但可能有一到两天的时间跟旅行团进一趟加德满都。然后从拉萨到那曲，从青藏线转到川藏北线，那有317国道。317国道特别危险，少有车走，服务设施也非常少，据说年久失修。但只有那条线上有一些特别古老的寺庙，本教的大本营也在那里，这个也很有意思，因为藏传佛教是从本教转成的佛教，佛教分几大派之后，最后又被格鲁派基本统一。

沿317国道开到昌都，然后我想去德格。但我很怀疑德格能否进得去，据说德格跟甘孜那边闹的最厉害。德格有个印经院，大量的佛经都是在那印刷的，而且那里有最古老的印刷术，也是藏传佛教学者最多的地方。从德格回来时我想从昌都往上走，就是去青海的另一条路，经过玉树。从玉树往北三四天的路程，到青海，我打算在青海湖住几天。青海到兰州有250公里，从兰州到银川，然后到呼和浩特，再到北京。这次行程可能在40-45天之间。

我每次要花7天时间做旅行计划。我的先生最逗，他是旅行回来做总结的，他有个习惯——收藏路上的任何一张发票——所有加油的发票、过路费的发票、旅馆的发票，比如吃饭五块六毛钱，他也会记下来。回来后他会列一个Excel表格，我们每个行程都有这样的表格，那以后我也许能出一本详细的书，包括旅行的财务分析。其实我先生做的东西有意思在哪儿？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地图上任何一个小的地名上，你可以查找地名周边的地区的人文历史。我先研究，他后学习，他可以把所有的地方从头脑中再走一遍，基本上一次旅行就会有一本厚厚的档案。

我们从西藏旅行归来后休息一个多月，7、8月份去呼伦贝尔，把整个黑龙江和内蒙这一条线走完。内蒙的版图狭长，上到呼伦贝尔，额尔古纳，这边下来一直到额济纳。9月份我们再去一趟新疆，今年年底就把中国走完了，明年开始去欧洲和中东。

苏小和：你这次旅行的预期目的是想收获什么？

张树新：我们有个计划就是把中国走完，目前还有3个trip就走完了。去年是把中国几乎非边疆地段都走过了。其实过去走的地方都是点到点，但从前年开始都是开车走的，一步步的丈量，这种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苏小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张树新：这样旅行特别有意思，能感受到一种风貌的变化。比如我们春节的时候开到海南，中间有一段是坐在轮渡船上。首先我没想到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我们在轮渡船上等了6个小时，这是过去不会有的经验。轮渡船上放着极为低俗的录像，一帮青年在那里打牌。你开着很好的车，但是旁边正好是一个装猪的车，船一开，猪拼命在叫，你会忽然觉得特别诡异和好玩。

也许只是因为好玩，我才愿意到处走。因为我总感觉我们过去的生活比较不真实，尤其在这种很安逸的院子里生活极不真实。我曾跟我女儿讲，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中国，我说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想去知道。因为北京不代表真的中国，这个院子就更不是了。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特别不真实的世界里，那你其实很可怜。我们自己也特别不真实，比如你们做的杂志，把你做成封面了，你也许总会认为那个人是你，其实封面上的人是摄影师想要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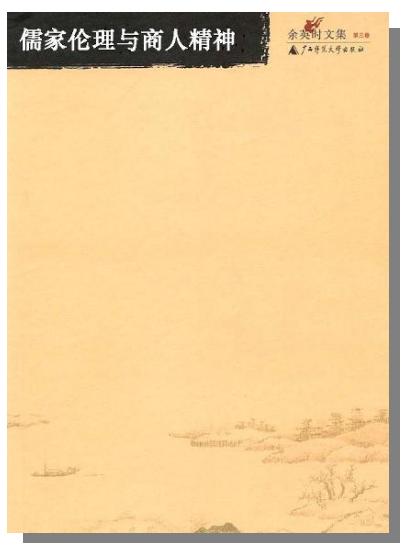
苏小和：那是已经被定义了的你。

张树新：但是很多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他就会认为杂志上的就是自己，然后就照着那个人的样子来做。

苏小和：事实上可能做了别人。

张树新：不知道是做了谁。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还是在寻找，寻找你生在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太大，中国的问题也太复杂，我们的精英总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地讲话、轻易地拿出很多解决办法（solution）。这可能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我们来讲，了解和学习很重要。

有时候，你读了很多书，可能因为读太多了就忘了。但当你旅行时，你读过的那些字句会自己浮现出来。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比如，我真是到了岳麓书院才会想起曾国藩、毛泽东、蔡国森在这里待过，当初王阳明和朱熹在这里讲学。这个地方有的很有意思，那些人突然间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旅行的好处。如果不旅行，书里的东西几乎都是死的。



我们缺少共识

苏小和：别人对你的形象定位还是企业家，大家想起你，首先反映出的词汇是互联网、企业家。

张树新：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根本不像什么企业家，像一个自由人。

苏小和：但别人对你的定义是企业家。你可不可以从旅游延伸到中国企业家的方法论上？你走了那么多地方，我相信人走多了以后心胸会开阔，像王石，还有你。中国企业群体，有时在方法论上，是不是受制于自己的视野？还有宗教的问题。比如韦伯的命题，比如中国现在余英时也在做儒家和商业精神的问题。我发现中国的很多企业也在做这件事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树新：在精神信仰方面，首先必须承认我们从小被洗脑的很多东西可能是错的，就是一开始以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用马克思那套观点来看事物，其实是有问题的。我说过，读书第一件事就是解毒。当解完毒之后，你又被任何一套解释系统所占领。

苏小和：是，总是在怀疑。

张树新：所以，你就有幸了，幸运的是你会去看所有的东西，你的不幸有可能是你什么也没看到。在去看这些东西时，脑海里就会有疑惑。至少我自身不是学者，我去看这些东西的使命并不是要建立什么系统学说，我的使命是50岁前至少给自己找到一套解释。

如果你真能够相信某套解释系统，那也比较简单，对于我这样一个深受理性思维之害的人来说，又很难。那么，去学习和了解所有人类智慧遗产的本身就变得很重要，而在智慧遗产的学习和了解过程中，就发现它留下了很多遗迹，这些遗迹和今天物理上很多人的精神风貌有关，对这些东西观察也很有意思。对于我来讲，其实兴趣就在于此。我还在试图理解，人类精神遗产导致的今天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行为和人的风貌。

中国企业家的问题，和中国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并不等于说他们是企业家，他们就比谁更加聪明，也不等于他们就比谁精神上更加丰富。大街上的民工和一个企业家，可能在精神世界的丰富程度差不多，这一点是中国很大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很多所谓精英，如何定义精英？有很多钱、有很多企业，但你的精神世界是不是非常的丰富，并足以支撑你今天所能够做这些事情？这还是值得怀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自觉地就有一些分野，就演变成不同的行为。比如，一类人可能会从某些他所崇拜的个人身上汲取精神支持，比如说有人一直讲毛泽东的话，这是一类人。也有一类人皈依了佛教，也有人信了上帝。其实，皈依了各种人类智慧宗教遗产的情况也分两种：一种是把宗教作为价值依存的人，一种是把宗教作为工具的人。

苏小和：这是绝对的两类人。

张树新：把宗教作为价值归属的人，相对来说是很幸福的，至少是在做今天所有事情时就有了解释，有了支撑，对他来讲就变得很圆满。而作为工具的那些人在做事的过程中也很愉快，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方法论，比如我认识好几个人都是练藏传佛教密宗的，我还问过是不是因为密宗是口口相传，必须有上师，所以才导致了很大的利益集团以此为生？

苏小和：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

张树新：这个利益群体其实很奇怪，由于它信息的不透明和不开放，就可能导致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达赖自己也讲其实有三分之二的垃圾，把它当成了工具，当成工具就可能以彼岸之名来敛此岸之财，获得此岸之所有的利益。

苏小和：那就是盈利了。

张树新：其实芸芸众生也比较惨，分不清楚谁是用来做价值，谁是用来做工具的。还有一类人，由于没有自己拜的上帝，就自己扮演上帝，这在企业家中也不少见。你会发现很多企业家在内部管理上，自己就是皇帝加上帝，不只物质上管理员工的吃穿住，还管理精神，用自己的道德教化来训练自己的员工。以企业文化之名奴役别人。这也是一大类，而这类好像还挺成功。但这些问题是，等他自己有一天困惑的时候，他也会很累。因为特别多年轻无知的羔羊们都把他当上帝了，而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可能他背负的重担会很多，就像我党现在的状况——建立了一个全能组织。

这种情况不只会出现在企业家中出现。我经常说，在一个精神世界寻找过程中的年代，这种状况很正常。但自以为是精英

的这些人，他总以为“我是你的官，我是你的领导，我又比你有钱，我就该在精神上指导你。”其实这两点没有逻辑关系。所以我觉得企业家也是不可承受之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起精神指导作用的责任，不该是由他来承担。其实这种精神指导工作也是蛮辛苦的，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很不自然，但还要去演。

苏小和：回到马斯洛的原理上，因为他已经有钱了，他需要价值，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把一个价值当成一种工具了，然后在自己掌控的范围之内去驾驭其他人。

张树新：大概有些人觉得那种驾驭别人的快乐比赚钱还快乐。

苏小和：对，还要过瘾，结果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特别累。

张树新：当然还有很多类，包括质朴和谦和的。我觉得我是很难归类的，因为我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需要了解和学习的也太多，我没有权利去妄言任何事情，因为事实是我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就只能先让自己去知道再说。在此之前，我见过很多所谓精英，比如商人、官员、学者，很少有思考大问题的人，如果大家在精神上都比较苍白，那我们就需要寻找或去了解更多东西，因为人类有如此多的智慧遗产，然后我们再了解一下现实的中国是什么局面。

苏小和：我们可以延伸一下，我发现中国很多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他完成了原始积累，有钱，日子过得也很好，但精神上真的很迷茫。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有一个比较，比如美国的这代企业家，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解释的方式，他们对这件事很清晰，像巴菲特、比尔·盖茨等等，他们都很清晰。我们与他们为什么会有差别？

张树新：美国这个民族、国家的整个价值基础还是新教基础，这一点必须承认，如果没有当初的新教伦理，没有当初的这些被迫害的教徒们的坚持，就不会有美国的建国基础。而这些基础上承载了很多东西，而且在美国最底层的政治哲学上，大家是有共识的。

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的情况，因为我们是没有形成共识。

苏小和：对，可他们已经有了共识。

张树新：他们其他的争辩就在一些小范围内。美国的基础框架是共识，这个共识建设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至少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基础。在一个对真善美有共识的认识体系中，他们面对的很多问题就不是大问题，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在很多大问题上没有共识，而在小问题上我们有共识。现在大家还在讲中国要牛。我也承认中国作为国家来讲现在有机会，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国民没有价值共识的年代，在国家和国民没有关系的年代，那就有机会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会导致其他什么结果？这是个巨大的问号。

苏小和：就是只有技巧，没有常识，这个问题很可怕。我很同意你说的问号，就像我们还是有点思考能力的人，也还是看不清这个问题。

张树新：作为中国人，在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会面前，这是一个让人特别困惑的事情。所以我这几年读了很多有意思的书，关于中国各民族的缘起、民族的构成，中华民族是怎么回事、什么叫现代性意义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族群、国族、民族之间的关系，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你会发现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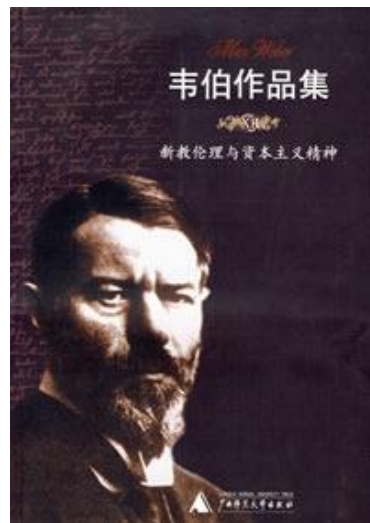
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借助的是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概念，但中华民族不是血缘民族，汉族也不是血缘民族。欧洲民族国家成立时，100年前的民族概念基本上是统一文化、统一血缘、统一地域、统一文字，在此基础上他们有自决的权力，这是形成今天欧洲局面的原因。那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在哪？就是中华民族面临如此复杂的局面，他没有工具创造能力，或者没有概念创造，近百年来我们在概念上全是照搬西方的，全是西体西用，。

苏小和：对，没有范式，全是拿来主义\西体西用。没有中体中用、或者西体中用这种说法。

张树新：结果使我们非常困惑，我们没有一种工具能够描述近代中国的复杂局面，都是套用别人的工具，因而在不同语境的概念，中西方产生很多歧义和误解，也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苏小和：所以国家主义成为一个主流意识形态。

张树新：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又有几乎掌控全部关键资源的全能政府，利益集团自然形成依附，而企业家当然不能



免俗。

我们是否可以自由？

苏小和：事实上我觉得今天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只是暂时利用了一下这种国家主义，其实深层次的含义并没那么简单。有人说专制体制像一个怪兽，先吃掉旁边的东西，接下来会吃掉自己。这也可以解释这么多年发生的所有历史事件。当今中国企业做生意时必定要跟别人打交道、应酬，他会慢慢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而迷茫也正在于此。所以他不独立，也不自由。

张树新：自由的前提是独立。独立除了财物独立，还有精神独立。精神独立包括人所有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的独立思考，如果没有这些，那独立是个假话，自由也是假话。普天之下，13亿中国人有几个是自由的？少的可怜。

苏小和：自由只是一个太优美的概念。

张树新：自由，特别简单的一点。说不定大街上的乞丐挺自由的，要一点活一点，他也没觉得乞讨不好。当然如果是丐帮集团里的另算。

苏小和：那又是一个组织了。

张树新：是。所以对于我来讲一切都是问号，一切没有结论。

苏小和：所以你要寻找。

张树新：我现在本能的只做了一件事，我先让自己自由。其实我自己的人生历程经常是问题太多、解决不了，又不知道方向的时候就做减法、排除法，想想什么事可以不做，最后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了，就是让自己自由。自由包括财务自由、从组织中自由，从所谓的别人以为的face中自由。别人总是不理解的问：真的不接受采访吗？我说我给别人当材料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采访与被采访只是个互相利用的关系。

苏小和：你一定要确定属于自己的脸。

张树新：比如你是企业家，你必须为了企业生存做很多事，你要为他营造环境，要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大家互相利用的东西。传媒是一个台子，在台子上大家都在演这个戏。这时你一定要戴着面具，就是为了你的组织的利益。其实这是很简单的关系，组织是滋养你的东西。我有时会反问，我们这么多人没有组织谁能活下来？这里说的组织不只是过去的单位，还有企业家们的企业。

苏小和：还有圈子。

张树新：有企业，有圈子。也有相互的认可和证明，当然最重要的是组织资源滋养中的个人生活和消费。

那天我在大连时跟我先生商量事情时说，我们自己造了一些“壳”，然后就寄生在里头，我们出不来了，当要把这壳割断的时候，会发现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我开了一个清单：你有一辆车，你自己会做车检吗？你算过一年的成本是多少吗？你自己会去排队交税吗？我现在认真在做一件事，就是我们是否可以自由？这事不容易。

苏小和：这些企业家们，又迷茫、又不自由，还在一如既往的做那些看上去很优美的事情。他为什么呢？是因为钱不够吗？

张树新：不是，是因为惯性，太多的人生活在惯性之中。为什么我今天做这件事？因为昨天做了。没有人停下来问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件事？这事是我需要的吗？还有，他们有很多牵挂和负担。牵挂包括你要养活三个“老婆”，你知道你不能停下来，这里说的“老婆”不只是真的老婆，包含的内容很多，牵挂太多。比如你的形象、社会知名度。还有在场感。

苏小和：对，在场感。

张树新：如果突然发现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发现自己“不在”。“不在”这件事很要命，你要“在”啊！这就回到最起码的哲学意义就是存在的意义，何为存在？谁在那儿，谁不在那儿？“谁”只是你被塑造的一个名字。经常上网你会发现，网上的存在和物理上的存在之间不完全对等，这是一种不同的“存在”的表现。

苏小和：“在场”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很多时候人都在寻找一种在场感。就是北京话要那个“范儿”，要那个感觉。

张树新：别人还没注意到你，就听到后边一个风声势起，一个人在场了。

我要知道真相

苏小和：事实上那些可能就只是泡沫，都是虚无的。我个人很羡慕你，一方面是因为你开着车去行走，去寻找你想要的东西，去求得一个解释。另一方面，是因为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信息通道。我跟很多企业家都聊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我发现你的话语体系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你的信息通道是怎么构建起来的？

张树新：可能是跟企业家不是我个人归宿有关，企业家只是我人生旅途中必须要扮演的一个角色，通过这个角色我可能会获得自己要的东西。假设当初没有人逼着我走到这条路上，也许我像我女儿一样，生下来就不在乎挣钱这件事。我曾经说过，20年前走到这条路上的这些人，是因为这是唯一可能获得自救和自由的路，当然很多人自救的结果是没有得到自由。

其实我们这代人生在一个不太正常的年代，为了自救，大多数人走到了这条唯一的路上。走到这条路之后，自己做了一个壳，保护自己的结果也意味着永远出不了壳了。我如果能挣脱这个壳，当然我也没有说我现在完全挣脱了。我要知道自己在，这是另外一个“在”，即我自己真的活着，我是我自己，而且可以很高兴、很自由的活着，不需要“别人以为我在”的时候，那我需要的东西太多了。这时就会去结识不同的朋友、获得不同的信息，那是和企业管理不一样的。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也许从小就在乎这些东西——不需要别人以为我在的时候我也在。那时我会自信的认为，我这个身体不是说别人以为我是怎样我就怎样了。其实做到这种程度不容易，我也没觉得今天我做到了，但我试图自己看得见，这点我可以做到。同时，我的目标可能比较纯粹，我不是为了谋生做这些事。很多人读书可能是为了写稿子，还有一些人读很多书，是为了向别人展示自己有知识，展示自己是知道的。

苏小和：我常说，读书的目的就是读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但它是很简单的目的。

张树新：而对有些人来说读书像吃饭，不读就会饿。

苏小和：对于我来说，读书一下子就解决我很多心思。

张树新：对啊，不读就会饿。如果我不去读这些关于西藏的书，那我去西藏不就是白去了吗？我就想看看古往今来人们都怎么说，我还特别想去看民族文化宫的展览，我也去看他们都怎么说，这些说法加起来也许就是真相了。因为我没有主义，我不是学者，也不想著书立说，我是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苏小和：你谦虚了。

张树新：真的，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没有框框。我不需要自己建立一个体系装进去——如果是右派，所以坚持自由主义；是左派，所以坚持平等——而这两派我都不是，那我的兴趣就在于他们到底吵什么呀？

苏小和：你走了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个真正的观察者。

张树新：还有一点，可能人自以为知道很多东西，但事实上你从小知道的很多东西是错的，然后你就会去看书，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源于学科学训练的本能——求知，我要求知、要知道真相，就这么简单，而这些事又是做不完的。这样你就会变得“是企业家不是人”，我们现在很多人物都不是人，你明白吗？

苏小和：我太明白了。

张树新：比如，他是演员，他是企业家，他们都不是人，你明白吗？他是学者，他是老师，他们都不是人。

苏小和：就是不鲜活，被复杂化了，概念化了。

张树新：但他首先该是个人。作为人，你应该知道些什么？我其实无非就是还原这么一件事。那你就知道原来启蒙是这么回事、五四是这么回事、五四这点事什么也没完成……

另外一点，我还是觉得这些信息是得益于互联网，你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所有的东西。最近我最佩服艾未未，你知道他们那个“5·12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工作吗？

苏小和：我知道，收集和整理死亡学生的名字。

张树新：做的多了不起，其实原来艾未未很愤青。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

苏小和：很感人，我看见隐隐约约的一个个名字就想流泪，就看到那些孩子一样。

张树新：我认为他很了不起，这是一个巨大的行为艺术。这个行为艺术就是在证明独立人格的意义、独立的信息传播。这件事从12月15号开始到现在仍在做。我要是体制，我也拿他没办法。我仔细看了他所有的电话记录，有一百多名志愿者打调查访问的电话，上面列出了每个电话的回复和他问的问题。

苏小和：他做的相当不错，做得越来越有感觉了。

张树新: 所以这个时代还是有些很有意思的人。后来我看有人问艾未未, 他回答的很简单, 说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吧。因为我们的纵容, 所以恶才降临。因为所有人都沉默和纵容了, 而且我们很容易遗忘, 大家都忘了。近百年中国发生这么多事, 没有一件事是反思过的。所以我也很佩服樊建川, 我想去看看建川博物馆。有这么多信息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判断——一切都在变化中, 还有更剧烈的变化正在发生。

苏小和: 我也佩服他, 前一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做了一个在达兰萨拉的活动, 想从国内邀请两个人过去, 最后没成功, 因为中国人现在去印度不签证。

张树新: 我估计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苏小和: 你去过达兰萨拉吗? 他们说那里很有意思。

张树新: 没去过。我看到过很多对那里的描述。

苏小和: 达兰萨拉虽然很破旧, 但在那里的大街上, 一个很伟大的学者, 或一个领袖可以跟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一起。

张树新: 有这么多信息之后, 你就会有一种判断——一切都在变化中, 还有更剧烈的变化正在发生。

苏小和: 我们特别愿意跟你交流的原因是你的信息是多元的, 八面来风。而有些人的信息都是单一的渠道。阿马蒂亚·森说过, 判断一个人的观点和知识结构是否正确, 就要看他信息的来源, 做个量化的分析。我个人认为你的信息的来源就是你与他人的不同之处。

张树新: 我同意。还有一点, 我觉得是得益于互联网。做互联网的人, 在思考互联网的社会效应的时候, 你自己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结点。互联网时代跟其他时代不一样的特征就是, 它已经把传统的金字塔似的信息传递结构解构了, 变成了一个Web, Web是自然生长的。Web的生长特点

没有中心, 看哪个点的势能高, 哪个点就会聚集更多的信息。如果想知道全貌, 你的点的势能就会高一些, 想像一下电波, 势能非常高的就可以传导更多东西, 把更多东西汇到你这里来。有很多点是被各网状结构覆盖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如果你被覆盖的那个势能非常低, 就像你不会翻墙, 你不会去了解另外一片声音。

这就和我们的老百姓只看CCTV1是一样的道理。你会发现, 每晚上八点之后, 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土豆”, 他的眼睛看着CCTV—1放着的电视剧, 他的眼神是呆滞的。这时假设测测他的脑电波, 你会发现他的大脑是受控制的, 就像终端受中心服务器控制的。在我们旅行时, 晚上曾走过很多地方, 看到家家户户的老百姓都在看那些电视剧, 我突然发现原来那些电视剧是有市场的。我曾经疑惑, 中国产生那么多拙劣电视剧都谁看啊? 后来发现很多人都在看。然后, 你会觉得那一刻的画面, 就像我们描述的老年痴呆症的病例一样, 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少这种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很容易统治的。

苏小和: 你说的很对。

张树新: 但这也需要先进行信息控制, 先洗脑, 把思维方式定了, 洗脑后就只让你知道该知道的。

苏小和: 获得单一的信息。

张树新: 然后你的娱乐也是被安排了的。你想想, 那会是什么情形?

我现在脑中经常闪现一些奇怪的画面。那天我看了法门寺和尚拆墙的事, 我突然想到我们见到过很多这样的寺庙, 我当时还特别气愤, 先弄一个大墙, 建各种各样的文化园之类的景观, 中间是小庙。包括韶山毛主席故居, 在进那间房子前, 要走过很多人为景观, 在收了你很多钱之后才能看一下那间草房。最逗的是老百姓在另外一个方向打了一个洞, 可以从那儿进去。我们当时在那儿附近绕, 就找到了那个洞。然后, 我突然有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些和尚的庙像不像动物园? 和尚们被圈起来, 被展览, 有人收钱。你琢磨一下, 就会觉得法门寺的舍利加和尚本来就是动物园的动物, 而且是稀缺动



物，像熊猫一样，看熊猫时不就有在那儿吆喝着收钱嘛。如果这是他们所处的真实境地，你是否觉得有点儿诡异？

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性的筑建

苏小和：我们愿意去多方面的吸收信息，而有些人就自愿接收单一信息，并且觉得这种选择很好，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

张树新：这还是和思维方式有关，如果思维框架就是如此，硬要揉进其他东西就会让他很痛苦。我的朋友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我看了半天，就回了一句话——“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写文章的是一些特别认真思考的人，但是他的思维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他认为这是真理。然后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所有的思考方法去攻击马克思主义——可想而知他有多痛苦。

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攻击那些东西。如果你的框架没有走过解毒的过程、没有开放思维系统的建设过程，即使获得了其他信息，它也会自动进入垃圾站。就像你接收电子邮件时，你设置了一个防病毒软件，然后就有一些邮件自动进入垃圾站了，这是系统造成的。

苏小和：我想起一个专业词，就是路径依赖。就像中国的企业一样，更多的是做着做着就变了味道。比如温州的企业，开始还做市场、竞争、产品等等，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张树新：这就回到一个大问题——现代性的问题。我们不只是没有建立现代性的国家，还有现代性的思维方式。

苏小和：现代性的人。

张树新：对，我刚才提到的“人”指的是现代人，现代性的人是有基本定义的。现代性没有解决，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大问题。这本来应该是原来启蒙要解决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为什么大家还能相安无事的呆在这样一个全能政府体制下？其实，现在是有大量的逆现代性的思维和事物。

首先，因为人没有现代性，而有现代性的人活着又很困难。我认识很多学者，你看社科院所有的题目，它的赎买政策是很成功的。当所有的人都衣食无忧，单纯的活着，大家慢慢都变成这个庞大的皇权体系的寄生虫，就像这些老板们建了个壳自己寄生在里面一样。这时，如果有一个天外来客在上面看着，看到的是一个个体系和组织，看不见人。

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很短的幻想小说，里面说外星人从宇宙中观察认为地球这个星球上没有人，这个星球上有种像汽车一样的生物，汽车里有一种寄生虫叫做人。

苏小和：这种景象很有意思。就是因为缺少现代真正的个性。

张树新：还有现代性的制度和思维，然后我们会很自然地滑到某些现代性的后

现代工具的讨论上，比如民主主义、左派右派。

苏小和：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无论是组织也好，个人也好，都变成一个寄生的状态。

张树新：其实你看西方的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历史，是从中世纪至少到启蒙时代，再到后来，这个现代性的建造就是所谓的去魅过程和重新建立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一直没有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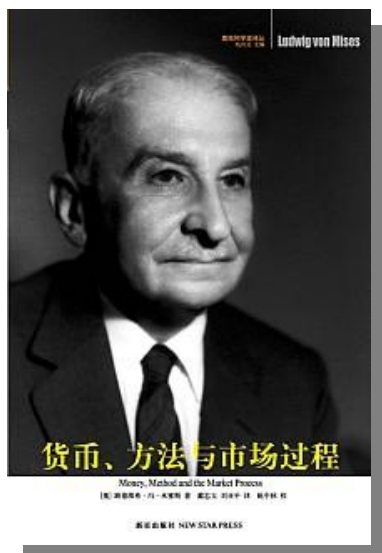
苏小和：你的话让我想到了很多事情，最近参加了几次会议，听了张维迎老师讲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的第一条方法论就是从人出发，这个学派的魅力就在于此。但我发现很多企业家听不进去，都觉得张老师说的不对。其实我很难过，张老师也挺孤独的。

张树新：对，因为你面对的是整个文明体系本身的问题，所以这时，就很像堂吉珂德了。

苏小和：张老师真的很像堂吉珂德，骑个破马，然后向风车挑战，结果是空无一物，所有人都是他的对手，而所有人又都不是他的对手。

张树新：没错，他不知道他在挑战谁。

苏小和：他不知道跟谁打架，在张老师讲的时候，有些人在底下说话，他一脸的惊诧，不知道怎么说明，变得有些张口结舌。



张树新：他不知道问题在哪。

苏小和：对，他不知道问题在哪，他一说话所有人都用一种鄙夷的眼光，别人认为觉得他说的不是常识。但至少在我看来，常识在张老师那里。这个困局怎么破解？

张树新：我原来蛮悲观的，最近比较乐观。原来最大的悲观在于这完全是体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不是一个点的事情，而是一个系统问题。最近为什么又乐观？首先中国是个开放世界，我们不可能关上门，虽然在国家主义旗帜下的威权体制会导致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我很相信这也不是结局。

苏小和：对，我同意你的观点。

张树新：当大量的东西成为碎片的时候，重构的时代才会到来。现在正在碎片的形成中，首先现在所有人的精神都是碎片，我们会看见一个个碎了的人。我们刚才讲了没有现代性却已身处现代社会的人，实际上就是人都是碎片，尤其是他的大脑本身是碎片。和毛时代不同，毛时代是试图在建立一个适合全能政权的一个全能精神系统，今天没有人有这个能力了，而且也没有这种机遇了。你想象一下，在天安门广场，有一百万人跳忠字舞，毛泽东差点成功。

苏小和：成功不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成功的。

张树新：因为时间很短，很幸运我们赶上个尾巴。那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延续而已。今天有太多的人，已经开始有自由的可能。我回想自己，如果我不是还有一点钱够活着，我也不会自由。

苏小和：你说的对，所以经济基础还是很重要。

张树新：一个国家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头脑清明，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少数人。我始终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精英的问题，不是草民的问题。精英的价值共识、精英的概念能力、精英的独立自由，关怀与担当，会最终决定未来走向。对于精英的问题，以及现在这么多困惑和多元讨论的本身，其实比起10年、20年前还是不一样的。也许走上这样一条路是中华民族很幸运的一件事，至少是先去发展经济基础，让一些精英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这非常重要。未来的20年，我相信其实会有太多的人从体系游离出来。至少是他的头脑开始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创造能力，头脑游离之后才会对中国问题有一种逐渐清醒的认识，也有了对人类很多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的可能。

包括今天我说的有大量的独立于政权的宗教信仰的这种个人性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事情和趋势，这其实在20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人们对原来那种全能体制摆脱的越大，那下一步重新变成碎片的可能性就越大——先是有一些人物理上不依托了，后来有些人精神上不依托了。为什么你现在看到的有些企业家群体，反倒看上去是后知后觉呢？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组织跟那个庞大组织之间的关系。

苏小和：依赖关系。

张树新：对，这导致他视而不见。人类有一种能耐叫视而不见，还有一种能耐叫故意遗忘。这事就是想不起来了，其实他是不愿意想起来。

苏小和：对，主动遮蔽。

张树新：其实这些能力在某些极端性的碎裂和危机面前都会重现。

苏小和：是啊，这就是历史。

张树新：读多了历史之后你会特别有信心，你会相信人性还是有一些共通的东西。

苏小和：所以有一句话说，历史是遮不住的，人性也是遮不住的，迟早会冒出来。

张树新：对，在这种情况下，未来10年、20年还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发生的时候，自然会有很多新的精英群体形成，也许现在你看到的精英就是过渡的一代。我们自己都只是过渡而已。

苏小和：你今天说的很多话，像在我后背猛的推了一把。有句话挺让我惊悚的，就是关于“在场”。我这些年也是在寻找一种在场感，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光环。你的话让我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因为我太在意这种在场感，这样不好。比如说参加一个聚会时我去讲话，然后发现别人能感觉到我知识的更新，有时候会把读书当成一种显摆的手段。

张树新：在场和自信有关，不自在就不会有自信。

苏小和：我们还要自由一点，就像你说的，游离出来，不右也不左，而是两方面都去看，不要排斥。

张树新：如果你特别清楚自己阶段目标的话，那很多事实就会清楚的。自由就是要跳出来一点，稍微有点距离。没有必要排斥，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框架和系统，还去排斥什么？

苏小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为止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分阶段的介绍，哪个阶段哪本书对你影响很大？

张树新：小学二年级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是《西游记》，高考前一直在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大二的时候读金庸和萨特，另外我大学的时候经常读诗，读诗是我休息的手段，很多人觉得这种休息方式有些奇怪。40岁之前读过很多解构中共的东西，比如中共党史等等，因为我需要给自己还原真相，去看看近代史到底是怎么回事。40岁以后就开始系统阅读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史和政治哲学，从而触及宗教史和经济史，这两年因为思考互联网同时读了些社会心理学。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最需要不断重读的依然是胡适和鲁迅，我个人一直对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也很感兴趣，许纪霖教授近年来的许多著作我都读过，《启蒙的自我瓦解》是本不错的书。最近在读王毅的《中国皇权制度研究》。

我曾经喜欢读弗洛伊德，还有荣格，荣格最终解释他们俩之间的矛盾是宗教的原因。我读的关于宗教哲学与心理学的东西特别多，我最近读了很多有关汉娜·阿伦特、以赛亚·柏林和哈贝马斯的书。开始思考很多最基本问题，何为真、善、美，何为公和私，何为现代性，何为自由……

社会现代化不一定非要先世俗化---弗朗西斯·福山访谈录

采访 内森·加德尔斯

吴万伟 译（武汉，wuwanwei1one@yahoo.com.cn）

本文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采访记。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0月20日接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全球视点编辑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的采访。

内森·加德尔斯：您在1989年写了文章，后来扩展成一本书，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著名主题。您当时说：“我们在见证的或许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或者战后某个历史阶段的过去，而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结和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遍化。”在20年后，您的观点中有哪些仍然有效？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发生了变化？

弗朗西斯·福山：基本观点---自由民主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仍然是基本正确的。显然，还存在其他的形式，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共或者中国的专制主义。但是我不认为许多人相信这些东西是更高形式的文明，比欧洲、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发达国家存在的为公民提供更大繁荣和更多个人自由的社会更好。问题不在于自由民主是否完美的制度或者资本主义是否就没有任何问题。毕竟，我们因为没有管理的市场的失败而陷入当今巨大的全球经济衰退。真正的问题是过去20年里是否出现了挑战它的其他管理形式。答案仍然是没有。



那篇文章是在1988年或89年柏林墙倒塌前写的。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文明采取悲观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可怕的20世纪如种族屠杀、古拉格、世界大战等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实际上，世界上还存在很多积极趋势，如在曾经是独裁专制的地方实现了民主，萨缪尔·亨廷顿（Sam Huntington）称之为“第三波”。

它开始于1970年代的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实现了民主。后来，除了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实现了独裁政权的终结。接着是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的开放。此外，民主取代了韩国和台湾的专制政权。20年后，民主国家从1970年代初

期的 80 个发展到现在的 130 个或者 140 个。

当然，从那以后这种趋势并没有持续。今天我们看到民主的消退。在有些重要的国家如俄国还出现了反复。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和拉美其他民粹主义政权的出现，以及恶心的不讲法治的专制政权的复辟。

显然，朝向民主的洪流在浩浩荡荡地前进，虽然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反弹，但这并不意味着更大的趋势不是朝向民主。

内森·加德尔斯：反对“历史终结”的主要观点是萨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他认为，根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融合，我们面对的是“文明的冲突”，其中文化和宗教冲突将成为冷战后的主流。在很多人看来，9-11 袭击和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伊斯兰和西方的冲突主题。在多大程度上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福山：亨廷顿和我之间的差别有点被过分夸大了。我曾写过一本书《信任》，其中我认为文化是决定经济成功和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我并不否认文化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问题是文化特征是否真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普世价值根本就没有机会传播或者根本不存在价值重合的可能性。这是我不同意的地方。

亨廷顿认为民主、个人主义和人权不是普遍性的，不过反映了扎根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尽管从历史上看，这是真实的，但这些价值已经超越了它们的诞生地，已经被众多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所采用。看看日本、台湾、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就明白了。

其他文化传统的社会接受这些价值不是因为美国这样做，而是因为这些价值观的可靠性。它们提供了问责政府的体制，一旦出现了问题，为社会提供摆脱糟糕领导人的方法。这是民主社会具有的巨大优势，像中国这样的地方是没有的。当今，中国有幸拥有能干的领袖，但是在此之前他们有毛。如果没有民主形式的问责制，不能排除未来再出现另一个毛。

如果有了民主制，腐败和管理混乱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要持久保持繁荣和成功，保障合法变革和问责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内森·加德尔斯：亨廷顿在更早的一本书《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西方化和现代化不是完全一样的。他认为，若从民主、自由的世俗文模式来说，在不实行西方化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管理有方、都市化、亲属体解体、教育普及、市场经济、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可能的。

今天，我们看到新加坡、中国，土耳其到马来西亚，甚至伊朗。当今任何一位中国观察家都能看到凯悦酒店（Hyatt）和花旗银行（Citigroup）标志牌下面的儒学的复兴及其专制特征。在土耳其，我们看到扎根于伊斯兰的政党在统治一个世俗国家，正努力争取允许公立大学的妇女戴头巾。换句话说，“非西方现代化”难道不能像通过全球化而实现西方化那样吗？

福山：在我看来，政治现代化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国家的现代化是作为稳定的、有效的、非个人的机制，能够确保法则在整个社会起作用。这是亨廷顿的焦点。但是在我看来，还存在现代化的另外两个因素。第二，法治，即国家本身的行为受到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法律体系的限制，换句话说，统治者或者执政党不能为所欲为。第三，存在对权力的某种问责。

亨廷顿本来可能会说法治和问责是西方价值观。确实是，但非西方社会也因为亲身经历而逐渐接受它们的价值。没有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现代化。实际上，这些是相互补充的。如果你只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你得到的只能是更有效的独裁。

在专制制度下，在一定时间里你当然能拥有有效的国家建设和一定程度的繁荣。这就是中国人正在做的事，但我相信，如果没有法治和问责的话，他们的繁荣不可能持久，中国公民对自己个人进步也不会感到安全，他们不能进入到三个因素组成的现代化阶段。腐败和让人质疑的合法性最终将消耗掉繁荣，如果不是引起全面动荡的话。

内森·加德尔斯：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越来越世俗化以及科学和理性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我提到的当今土耳其这样的地方，我们看到现代化和宗教性增强是并驾齐驱的。这当然和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Ataturk）描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途径完全不同。

福山：我同意。现代化的传统想象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反映了欧洲自己的发展模式。它确实包含了试图用狭隘方式定义现

代化的因素。正如你指出的，最重要的是宗教和现代化可以共存的。世俗化不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你不必亲自到土耳其就能看到这点。在美国，一方面宗教信仰十分浓厚，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和革新十分繁荣。这一点不错。

宗教将会消失或者被世俗的科学的理性主义替代的旧观点并不会实现。与此同时，我并不相信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因素的存在或者盛行就如此强大以至于法治和问责无法在全球实现。

内森·加德尔斯：虽然如此，问责就必须包含欧洲或者美国那样的民主和选举模式吗？

福山：你能够通过道德教育获得非选举体制下的问责，即君主的道德义务意识。毕竟，传统儒家学说一直教导君王对自己和臣民负有责任和义务。最成功的专制现代化试验都发生在受儒家学说影响的东亚社会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归根结底，道德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能通过道德劝说来解决“糟糕皇帝”的问题。中国在过去一些世纪里已经出产了太多糟糕的皇帝。没有程序性的问责，你别指望建立真正的问责制。

内森·加德尔斯：有些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当中国作为后美国世界的超级文明再次崛起后，关于专制和民主的“让人厌倦的”辩论将转变为更加实用的善政和恶政的辩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同意这种说法。

福山：你说得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民主问责，根本不可能有善政。相信奇迹出现是非常危险的幻想。

译自：Societies don't have to be secular to be modern © Global Viewpoint/Tribune Media Services.
Hosted online b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http://www.csmonitor.com/2009/1021/p09s07-coop.html>

MEMORY 记忆

谁能告诉他们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

女崽（上海，kuailesisi@hotmail.com）



2006年，何兆武的口述历史《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出版后，西南联大以及相关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与学术”“大学精神”“知识分子”等词语再度成为称羨的对象。在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三联书店1996）、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大2005）、宗璞《南渡记》《东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迟迟在大陆出版的鹿桥的《未央歌》（黄山书社2007年）等众多有关西南联大人的书之后，《上学记》中的吸引我的不再是西南联大及其轶事，而是字里行间流、只言片语中毫不掩饰的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的自由与幸福。何兆武认为，幸福有两个条件：“一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然而这种自由与幸福的光芒，如此耀眼，让我忍不住挡住眼睛，习惯性地陷入黑暗。

前几日，偶然在苏小和《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一书中读到《我和何兆武之间的距离》一文，苏小和认为，“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上学记》，

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于是，在文中，他将他的上学故事和阅读书目与何兆武上学经历和阅读书目进行了详细的对比，意识到“我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多年之前，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根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我们处在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里。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早已变得惨不忍睹，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此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潜意识中正是用苏小和所说的“比较方式”阅读《上学记》，而比较的结果更惨，因为我甚至连惨不忍睹、可以回忆的上学记都没有。虽然在苏小和看来，他与何兆武的距离犹如两个不同的世界，但他们毕竟还都处于读书人的世界，他们的距离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而这个世界，对曾经的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极点，而何兆武的自由与幸福便如天外之物，闻所未闻。

1

十年前夏日的一个傍晚，我从虹口区一个小宾馆出来，沿着一条马路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我发现自己竟然到了复旦大学。多年后，我上下班坐公交时，依然能看见那个小宾馆，但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复旦的。我只是麻木地走着，是围墙内篮球场上一群打球的学生让我注意到围墙内是一所大学。于是，我停下脚步，小心翼翼地找到校门，发现这竟然是复旦大学。于是，我走了进去，站在铁丝网外看着场内那些打球的学生。

此时，夕阳将最后一道金色光芒温柔地照耀在他们身上，形成一团团跳动而圣洁的光晕。我仿佛看到一个不真实的世界，一个遥不可及的世界。我站在黑暗中，看着他们，一种绝望渐渐涌入心中，渗入骨髓，直至每个毛孔。我可以忍受贫穷、忍受孤独、忍受辛苦、忍受陌生、忍受嘲笑、忍受一次次从头再来，但我却被这种绝望所击倒。

于是，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将行李打包托运到南昌，包括我自己。然后在市郊一个村子里用80元租了一家农户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两张竹床和一张桌子一张凳子。晚上，月光可以从窗户斜射而下，在地上映射出另一扇发光的窗户。我躺在竹床上，望着地上的窗户，却望不见天空，我奇怪为什么月光依然那么亮？

我一个人住在村里，拒绝与任何人来往，白天看书，晚上在廉价的录像厅看各种烂片。父亲闻之后，从老家跑到省城，在村里挨家挨户找到我，央求我认命央求我回家，我依然麻木而倔强，一个人留在那个考研村，开始自己第三次考研。

一年后，我考取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我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却没有任何喜悦，只有后怕。多年来，几乎所有人，有时候甚至包括我自己，将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个人奋斗，但多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我只是幸运而已。从一名中专生和一名乡村教师到一位研究生，有的只是幸运，是考研村中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的幸运，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学生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们从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幸运。

1997年暑假，我偶然听一位同学说起，南昌郊区有个考研村，那里有不少人在准备一种叫考研的考试。第二天，我就跑去我任教的乡级初中，向校长请了三年长假。第三天，我便驻扎到了考研村，成了一名考研专业户。那时，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研究生，我只知道，如果考上，我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可以读书了，那个时候，我认为只有在大学里的读书才是读书，可大学是怎样的？我一无所知。甚至到北京读研后，我才知道大学有图书馆，还分好多系，系又分好多闻所未闻的专业，而中文系不只有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

不过，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已无知，因为在考研村里，我发现了一两百位与我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大多中专毕业，在乡村中小学教书，拿着经常拖欠、饿不死人的工资，生活无望却依然心存梦想的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考研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持久的、残酷的赌博，虽有成功，但更多的却是失败、麻木与心酸。

生活的艰苦自不必说，更可怕的是压力，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在考研村中，有许多人几乎是破釜沉舟，一旦失败，



再回老家，不仅没了工作，更是成为笑柄。几年后，我曾试图回忆这段日子，可是除开背书，机械地背着考试科目要求的书外，只有一片灰色。我记起一个头秃、背佝、土黄色的影子，当时一位同学指着他那弯曲的背影，笑着问我，你猜他多大？我摇摇头，真猜不出。因为我觉得他有40多岁，可我知道超过35岁便不能报考。同学笑着告诉我，他三十出头，考了七八年了。我当时可能笑了吧。其实，我知道，考研村里的村民永远不会互相嘲笑，我们只有害怕，害怕某一天，自己也会成为那个样子。之后，我只要看到这个影子，便远远避开，不是害怕，不是厌恶，只是不忍心看他的样子，也不忍心提醒自己可能要面对的失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他最终是否考上。

我还记起莲花，她是少数几位考研女生中唯一一个妈妈级的考生。她只是想读书，想通过考研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谁也不敢告诉她，考研是在拿青春赌命，她没有足够的资本，因为她年龄大了，而且她还有家庭、孩子。坚持两三年后，莲花带着对我们的羡慕和对自已的无奈，放弃了，消失在家乡的小镇中，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儿子身上。我记得她骄傲地告诉过我，她儿子很聪明，叫博扬，博士的博。我不知道莲花以后怎么样了，因为有太多这样的同学，就此失去联系。

我还记起长毛的故事。长毛当然是绰号，长毛发誓，不考上研，不剪发，犹如当年梅兰芳蓄须明志，长毛决定蓄发明志。最后一次参加考试的前十几天，他执意放弃坚持多年的考研准备南下打工，几位考友苦苦相劝才进了考场，并打算一考完就去打工，因为在此期间，他的父亲因车祸去世，他已不好意思再接受在外打工的妹妹的经济援助。然而就是这一次，他如愿以偿考入北大，此时，他的头发已到腰间。

我还记起有在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烧毁所有书的；有舞弊被抓而被罚停考最后南下广州打工的；有千方百计找朋友住到学校附近旁听的；我最终还记起，食堂落有无数只苍蝇的绿豆芽菜和宿舍中一抽屉会飞的蟑螂……

我问过自己很多遍，也问过好几位考研成功的学生：后悔当初那么考研吗？不后悔！如果有机会重来，还愿那样读书吗？不知道！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因为考取研究生确实让我们得到一张入场券，但这种赌博式的读书，让我后怕不已，也为自己庆幸不已。是的，我是幸运的。在考研村中，比我执着比我勤奋比我艰苦的人很多，失败告终被迫放弃的人更多！而他们，只能无奈地回到从前的生活，没有了梦想的现实除了比以前更加困窘外，还多了一份心酸与嘲笑。莫与成败论英雄，只是一句连自己也骗不了的谎言。

但考研村里的村民却日益增长。据说，在我离开考研村后，那里驻扎的村民成倍增长，房租与伙食费甚至养活了那个叫石泉村的村庄，甚至有宿舍增加了一层。随后，我又渐渐发现，原来考研村不只是南昌的特产，我逐渐看到北京、上海、重庆等各地考研村的报道，遇见过自内蒙古、四川考研村的村民，听说了更多有关考研村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不只是幸运，简直是侥幸。

2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把我未能读高中未能有机会上大学的原因归罪于我那目光短浅胆小谨慎、农民出身的父亲。当时，父亲给我的理由是：一个女崽，有一个铁饭碗，你还想要什么？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14岁的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多年后，已去北京上学的我再次抱怨父亲当年为我做的粗暴选择时，父亲的回答是：我们哪懂，我们哪知道大学！24岁的我，仍不知如何面对父亲的回答。

其实，父亲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年轻时候的父亲也像我一样那么渴望上高中考大学，但艰辛的生活已让他不敢奢求什么，吃饱穿暖就是幸福的极点，于是，他报考了当时受到过毛主席大为称赞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因为在那里读书不要钱，还有饭吃。即便当时家中负担我读高中上大学完全不成问题，但一个铁饭碗，一个国家干部编制的铁饭碗，便已达到了父亲认为的上学目的与幸福极点。他又怎么会允许怎么放心我去追逐他所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的虚无缥缈的自由与幸福？

1994年，师范毕业后我回到陌生的老家成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师范生分配工作实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读师范时，父亲因工作调动从大山回到了离别近三十年的老家，待我毕业时，我也因此分到父亲的老家做了一名乡村教师。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农村，也让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父亲如此轻易对幸福感到满足。

起初两年，我在乡中心小学上课，不久我发现，五年级比一年级少两个班，男生比率明显增加。其中原因，不问也明

白，因为女孩不让上学是非常普遍和自然的现象。每年义务教育考察时，学校便放半天假，所有教师集中在一个教室里，为适龄上学而未上学的学生伪造学习卡，其中大部分是女孩。记得当时一年级有一个男生，他的班主任告诉我，他是乡里远近闻名的“超生游击队”修鞋匠的七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唯一一个上学的。

第三年，我调到乡级初中上课，又发现初三比初一少了一个班，而且每个班的人数也明显减少。寒假过后新学期开始，我发现自己班里少了两位学生，我问其他同学他们怎么不来上课？几位男生争相回答，言语中充满羡慕：他们不读了，去厦门打工了。他们堂哥带去的，一个月150元！我大惊：这怎么可以呢？初中还没毕业？！一位学生撇嘴说道：那还不是一样。初中毕业后也是打工，不如早一点挣钱，还不用在这浪费时间浪费钱。

课后，我又向一位老师提起这件事，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师凄然笑道：“以前还有点希望，现在你看他们有希望吗？迟早进城为奴为婢！”

我不禁一阵冷缩，第一次发现自己正如父亲所说“生在福中不知福”，第一次意识到对于我的学生来说，我已经到达了他们永远不能到达的幸福极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读的师范学校已经转轨成职业高中，而在此之前，这所师范学校是他们所知道的上学的最高目标和得到幸福的唯一途径，虽然录取分数比重点高中还高过四五十分，但若是考取了这所师范学校，就可以一跃“农”门，取得城镇户口，还有一个铁饭碗。而读高中上大学，对于他们来说，不啻于海市蜃楼。

其中，让我最唏嘘感慨的是我的一位远房堂兄的故事。这位比我大一岁的堂兄比我晚一年初中毕业，但他没有考取师范。因为这所师范只接受应届生，此后三年，我的堂兄不断改换学习卡，辗转各个乡的中学，不停地报考师范，直到师范学校转轨，他依然未考取。此时，他已成为村里的一个笑话。他的父亲发狠，不信他这位在村里唯一能读书的儿子，不能得到一个铁饭碗，不信他家祖祖辈辈都只能种田。于是，我的堂兄继续读高中，三年后他考取了师专。可毕业时，已经没

有了包分配工作的概念。他只好在我曾经呆过的那所乡级中学做聘用教师。庆幸的是，不久由于教师大量流失，教育局进行了一次公开的社会招聘，这次，我的堂兄考上了，终于进城做了一名有编制的小学教师，成为了“公家人”，实现了他和他父亲的幸福梦想。此时，他已过而立之年。但此时，他不再是村子里嘲笑的对象，而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与可望不可及的幸福梦想。

多年后，我在老家遇见了这位幸福的堂兄，身后是随之也进城了他的父亲，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此时，我已研究生毕业，在上海工作。我的堂兄和他的父亲谦卑而又敬畏地看着我，不敢与我说话，犹如十年前的夏日傍晚，我在铁丝网外，望着篮球场那个不真实的永远不会属于我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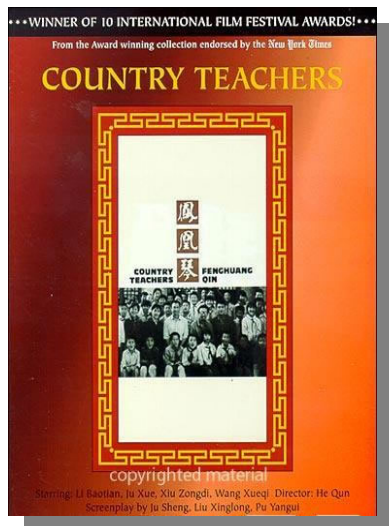
3

1994年，根据刘醒龙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在我读师范的县城上映，学校组织集体观影。当时，四大天王盛行，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以为放的是前一场放的一部港片，电影开始后才知道是《凤凰琴》，这是给读师范的我们放的专场，进行师德教育。因为用学校墙上的标语说，中等师范学校，是乡村教师的摇篮。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电影的内容会与我几个月后开始的生活会有多大联系。只记得刚看完电影的那些日子里，教室里每天都会响起口琴与笛子合奏的国歌，轻松欢快，夹杂着喧闹嬉笑与少年愁滋味。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渐渐体会到《凤凰琴》中，每日随着国旗升起而响起的口琴与笛子合奏的国歌的沉重与心酸。

在老家那所中心小学教书的第一年年末，全乡小学进行会考。我被派往一所村小监考。我与一位老师坐着一辆龙马车一路颠簸而去，直到我全身近乎麻木冰冷，我才听到同行的老师说到了。我跳下车，没有看见想象中的村庄与学校。我问，学校在哪啊。这位老师笑了，指着不远处一排孤零零的低矮破烂的土屋子说，喏，那不是嘛。此时，我才看到土屋外，斜斜插着一面国旗。

待我低头弯腰走进土屋，看到里面坐着的学生，我才确定这确实是一所学校。学校的学生来自附近三个村庄，为了方便所有的孩子，学校设在三个村庄的中间，所以，我看不见村庄，也不知道有多远。学校的学生不到15位，分三个年级，只有一名代课老师。监考时，这位三十来岁的女代课老师不停地向我们介绍她的情况：她一人教三个年级六门课，赶进度已经够呛，根本顾不来教学质量；她一边上课一边还得种地；她好几年忙得都没赶墟了……同来的老师会意地笑笑，而我一直担心教室后面，时不时从木板大窟窿里探出脑袋的牛，是否会跑进来捣乱；或是疑惑地看着用破旧油纸糊的窗户，不



知道是否应该告诉他们，若是把那些洞糊好一下，教室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冷得彻骨。

回来路上，同行的老师告诉我，那位代课教师不停地抱怨是希望我们监考时能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如果学生成绩太差，她那份一个月 50 多元的工作也难保。那个时候，正是取缔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高峰。但实际上，这位代课教师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几乎没有正式教师愿意到这种村小工作，即便当时中心小学的教师已开始人满为患，也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上课。

许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乡村教师开始大量流失，以打工或是考研考公务员的形式进城，成为了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这时，我这发现，原来自己还是最早最成功地逃离乡村中的一位。据说，后来在我老家逃跑的乡村教师越来越多，以致于教育局两三次清理开除有名无实的教师，并不得不从社会上招聘教师来填充不足。我的堂兄就是因此而实现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幸福梦想。

2009 年 2 月 5 日，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 2008 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扎根大凉山悬崖 18 年，撑起“天梯学校”的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当选“感动中国 2008 年度人物”。报道称，他们“为了大山的孩子们，付出青春与热血，不求回报，感动中国人物当之无愧”。因为直到今天，“陆建芬仍是代课教师，每个月领 230 元的工资”。在看到这个报道后，我大吃一惊，我没想到十多年前的“凤凰琴”依然存在。我第一次感到羞愧，不是为自己的逃跑，而是为我已忘记却依然存在的“凤凰琴”，为依然需要靠“奉献”而生存的乡村教育。

在媒体网络上的报道中，李桂林、陆建芬的艰苦、贫穷、无私、奉献、理想不停传诵，不停挣得空洞而廉价的赞誉。而真正打动我，让我掉下眼泪的却是一行不起眼的话。接受采访时陆建芬说：“希望上级领导考虑我的具体情况，如果我能早日转正，赡老护幼的压力就会减轻，也会感受到国家正式教师的荣耀。”在这句被许多媒体忽略的话中，我看到了最真实的李桂林与陆建芬，我想起了多年前看到的无奈与心酸。

十多年前，在老家村小遇见的那位代课老师，我不知道她后来怎样了。但当时与我一同去监考的老师，不久却离开了学校，成为了一位彻彻底底的农民。因为她是民办教师，年龄大了，已经不可能转正。而新分配来的师范生，已经取代了他们的岗位。这位熟悉每一位学生家庭、性格、脾气的老师，带着无奈与一丝嫉恨离开了学校。

在乡中心小学教书的第二年，一位女同事怀孕了，想吃酸的。她的丈夫为此特意骑摩托车进城，买了半斤葡萄回来。葡萄与他们的奢侈立即传诵成爱情童话，连整日不出门、听不懂老家方言的我，也在第二天就听到了这个童话。这对小夫妻是当时不少人称羡的对象，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师范毕业生，都是有着正式编制的老师。当时在那，一位男老师找一位女裁缝或是有一门别的手艺的人，是非常般配的，若是能找到一位女老师，是非常幸运的。而能吃上丈夫买来的 18 元一斤的葡萄的妻子，无疑是幸福的。到乡级初中教书的那一年，学校新分配来一位男老师。这位男老师报到后对校长说，我不要上课，我要先找老婆。自此，他每日骑着摩托车在外，校长既理解也无奈。

后来，在考研村，曾在我上铺住过的“姐妹”告诉我，因为有人把乡长的儿子介绍给她而她不同意，为此备受刁难贬到更为偏僻的村小，一怒之下她来到这里。到了这里，她才知道原来可以考研。她是我们那最勤奋也是最早考走的不多的村民中的一位。而这种故事在考研村并不罕见。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大到我无法想象。

我所在的乡中心小学，在我们那三十几个乡镇中算比较好的；我的老家，在我们那个地方也算比较富庶的县；我的父母不仅不需要我供养，每个月还给我贴补，我似乎没有逃跑的理由。当我听到葡萄的故事时，只是一笑而过。那时，我总是看着已在大学上学的初中同学，从远方寄来的信。那年，我十八岁，却感到已走到生命的尽头，无比苍老。

曾经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长辈，对于我不甘“奉献”的自私行为和范进中举式的考研经历评价道：你是自找的，因为你有所求！我惊呆了。因为这与父亲平常骂我的话一摸一样：别人能活，你为什么不能活！对此，我至今无言以对。

不过，对于我的逃跑，我从未得意过，也从未羞愧过，有的只是庆幸与感激。我总是想，若是我能早点知道有那么一种自由与幸福的存在，若是我能有选择那种幸福的自由与权利，那该多好啊。

2006 年 9 月，北京因取缔了不少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引起不少争论，赞同者认为这些学校教学质量低下，不少仅仅是为了挣钱根本不懂教育，甚至有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农民来招生办学，完全是误人子弟；反对者则认为有甚于无，学校条件再差，至少也让孩子有一个去处。当时在北京无所事事的我一时好奇，在小西天附近，找到了位于北

京市大兴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行知学校校长黄鹤。刚过不惑之年的他，身着白色衬衫，灰色长裤，干净而朴素，鼻梁上的大黑框眼镜为温和、宽厚的他平添了几分书生气。

“中国的农村教育根本走错了路！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一坐下来，这位陶行知的追随者黄鹤便直奔主题，讲述自己的办学之路。

从学生时代开始，黄鹤便视毕生致力于乡村教育、贫民教育的陶行知为自己的先行者，而与陶行知“结识”，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

黄鹤出生于安徽农村，14岁那年，一本误买的《行知书信集》决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他在自己课本的扉页上写上“做一个像陶行知一样的大教育家”。然而高考那年，一场大病让黄鹤没有如愿进入大学。复读无门的他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为那些因为穷或没有门路而不能上学的孩子办学校。此后，他开始了自己四年独特的流浪游学生活，走遍了陶行知生长、办学、乃至安葬的所有地方，走遍了三分之二个安徽。之后，他开始在实践中探索真正适用于农村的教育模式，先后到河南南阳、山西临汾等地的私立学校推行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但均告失败。1990年，他来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师从教育界权威王道俊教授。学成后，他接到深圳南山区教育局邀请，到该地从事小学教育改革，这一改革只持续了几个月。

1994年，应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邀请，黄鹤开始负责全国希望小学的管理和教师培训工作，并组织开展“中国希望小学调查”。1998年，黄鹤想去农村创办学，但碍于资金难题，这个想法只能流产。这时黄鹤接到了陶行知



陶行知

当年创办的最有名的学校——南京晓庄学院的邀请。欣喜若狂的黄鹤立即带着妻子来到南京，期望在他心目中的教育改革“圣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年后，现实再次让黄鹤感到失望，他不得不选择离开。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把自己关在家中，剃了光头，足不出户，反思自己所走过的路。

2001年的一天，黄鹤偶然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有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报道，得知虽然有一些由打工者自己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教学质量普遍较差，黄鹤心中顿时豁然开朗，终于知道自己该走什么路了！他说：“当时北京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子女，农民工自己办了一百多所学校，但大多数都不合格。农民工自己，卖白菜的甚至捡破烂的，都办了那么多学校，我还算是一个研究陶行知的、要办学的，再没有理由坐在这里空想了。”

2001年7月14日，黄鹤开始办学。他首先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开始实地考察。从朝阳到海淀，从丰台到大兴，一个多星期跑了十几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学校之多、设施之简陋、教师素质之低下让他触目惊心：办学人根本不是科班出身，学校也极其不规范，租用的民房设施简陋，完全处于地下状态。

考察结果让黄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办学决心。他从朋友处借了2000元钱作为启动资金，同时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庆丰、杨建、徐晓龙等三位教育硕士的支持，四人经过考察，决定将学校办在农民工子女聚集较多的地方：丰台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那个市场很大，小孩子这里一窝，那里一窝的。问他们的父母孩子在哪里上学，有的说刚从老家来，还没来得及找学校；有的说孩子早就不上学了；还有的带我们去看孩子上学的地方，那种学校和我在考察中看到的没什么两样。”

四人立即租用附近一家村民办小旅馆的七间房子作为校舍，把北京小学捐助的150套课桌椅、电视和投影仪搬过去，黄鹤还将自己家里的书全部运去，将教室装备齐全，并给学校取名棚鹏学校(行知学校前身)。黄鹤解释说：棚——陋室也，谓弱势群体，即农民工子女；鹏——世之大鸟也，谓希望，昭示了办学目的。棚鹏学校，意为“棚居何陋有真教，鹏翔万里在良师”，至今，这还是行知学校的办学宗旨。

8月6日，棚鹏学校正式对外招生。为了取得家长的信任，他们亲自跑到农民工住处做说服工作，并用三轮车把家长拉到学校实地考察。在他们的真心感动下，棚鹏学校迎来了首批5名学生。几天后，学生开始逐渐增多：7个、9个、20个、90个……

当一切逐步走上正规之时，因为没有办学许可证，8月26日，棚鹏学校遭到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查封，学校被迫第一次搬迁，搬到丰台辖区内一所公办学校的旧址。11月27日、29日，学校又连续两次遭遇查抄，学校被彻底砸烂、彻底抄

家、彻底封闭，未留下一片纸、一本书、一支粉笔。三次封校，在当时的北京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棚鹏事件”。

然而，这并没有动摇黄鹤为农民工子女办学的决心。他回忆说，11月29号，最冷的那一天，到了晚上七点多，孩子们都不愿离开学校，要护校，中午没吃饭，晚上没吃饭，那么冷的天，那些抄家的联防，都穿着大衣，蹲在空调车里。我们学校救助的一位卖冰糖葫芦的三年级小姑娘，不知从哪里找了一个一次性的杯子，装了一杯热水，端到我身边说，校长你把这个喝下，暖和暖和，你不能倒下，如果你倒下，我们就不能再上学了。我当时抱着这个小姑娘就哭了，我说校长不会倒下，只要校长还活着，这个学校一定办下去。

12月1日至10日，在严冬中，棚鹏学校集体失学的197名学生，“无家可归”全体教师，坐在临时租借的当地老乡的两间阴暗潮湿，四处漏风、漏雨、漏雪，无暖气，无用电照明，无任何家具的小屋里，凭借两块木板和老乡送给的旧棉被，仍坚持着上课。

这时，一位学生家长提供了一条线索：大兴西红门六村有个闲置的养鸡场准备出租。黄鹤连忙跑去联系，租用了8间房子作为校舍。12月10日，雨雪交加中，棚鹏学校第二次搬迁。

此后，由于经济、校舍扩建等原因，棚鹏学校又被查封一次、搬迁三次，直到目前这个校址才稳定下来。期间，2003年7月13日，棚鹏学校更名为“行知学校”，其意为“弘扬行知精神，走行知路，做现代行人”。2004年10月12日，学校拿到了大兴区教委颁发的教学许可证，从此，行知学校逐步走上正规、持续发展的道路。

在和黄鹤交谈的两个小时里，他接了两个电话，都是学生家长打来的，要求减免学费。黄鹤几乎二话没说便同意了。

我问他，你这样是否太草率，不怕家长欺骗？

黄鹤笑了笑，说，每每看到这样领着孩子来求学的家长，我就像看到当年我妈妈领着想进复读班的我，因为无钱无势而被关在门外的情景。所以在我们学校，没有哪一个老师敢说“没钱，你就不要来上学”这样的话。我的学校是为需要它的孩子办的，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的内心办的。

那要是家长欺骗呢？我追问。

当然免不了，但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家长都是诚实的。他淡然说道。

据介绍，本着陶行知的“来者不拒，不来者送上门”为招生原则的行知学校，对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施行减免资助学金制，现已减免救助失学或半失学农民工子女近千人次，救助款达二十多万元。作为老师和校长，黄鹤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到这里来上学的孩子，不管什么原因，都坚决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失学。而他捡孩子上学故事更是广为流传。

2002年9月，6岁的男孩靖明刚跟着安着假肢的父亲——一个靠捡垃圾维持一家六口生活的安徽来京打工者，从他们的居住地——大兴一个垃圾场临时搭建的窝棚里，来到行知学校报到。靖明刚的入学手续办得很顺利。当黄鹤将父子俩送到校门口时，发现两个胆怯的小姑娘向校园里张望。询问之后才得知，原来靖家还有三位没钱上学的超龄孩子：两个9岁的双胞胎女儿和14岁的大姐。黄鹤二话没说，立即为四位孩子免了所有费用，安排入学。如今，四位孩子在同一年级读书，成绩包揽前四名。黄鹤说，“如果不是行知学校，他们便很难再学习，只能是文盲了。尤其是姑娘们的命运，将可能很悲惨。”

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新学期到来，黄鹤就去西红门、新发地、西沙窝等地的垃圾场、菜地里、废品收购站、旧货市场里……像捡有用的废品一样往学校捡孩子。迄今，像这样的学生，他检了近30个。

“陶行知曾说到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去办教育，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如今，全国大约有1000万流动儿童，他们的教育现状仍然令人堪忧，我就是要为他们办学！”说话中，黄鹤眼中透出一丝坚毅。

实际上，据我后来的了解，由于这所学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助（捐款、捐物），其次是学生缴纳的学杂费，财政状况一直处于非常尴尬和不稳定的境遇，甚至是举步维艰的地步。我曾再三问黄鹤，他如何挣钱如何维持学校的发展的，毕竟这是长期的事情。这位刚刚还沉浸在自己理想中的校长顿时黯然，一再回避这个问题。

第二天在大兴，我看到了这所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的民工子弟学校。此时，行知学校的办学条件基本达到北京市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的基本标准，学校占地30亩，在校生一千多人，设有11个年级22个班，用上了与北京其他正规小学一样正规的教材。而他的办学模式与教育理念更是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在那里，我遇见了两位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他们每个星期都会自愿来到这里免费给孩子上课，同时以此做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学校会议室的墙上，我还看到了2005年8月美国波士顿教育局派出的38人考察团的留影照片，以及黄鹤出外考察与做报告的照片。不过，也因此有人怀疑黄

鹤的办学目的，这几乎让我不寒而栗。

我只想，在行知学校那些孩子脸上，我看到了幸福，是我的学生所没有的幸福，或许是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与农村孩子脸上所没有的幸福。当我正在为这一千多名孩子感到庆幸时，一位女孩却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问我她该怎么办。原来，她初中就要毕业了，按规定，她必须回河北老家参加中考，因为行知学校只是提供教学，不能参加统一中考，给孩子们提供继续上学的机会。可是她不想回老家，因为来北京很多年了，老家没有人了，她想考北京的技校留在北京，但没有报名资格。

可是你回去可以上高中读大学啊。我说。

啊，大学，不可能的。女孩几乎惊叫。

卑微而短暂的幸福瞬间溜走。我无法告诉她，世界上有那么一片自由与幸福的存在。

5

200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初中班主任的电话。放下电话，我匆匆赶往提篮桥附近一个巷子里的小宾馆，见到了16年没有见面的班主任以及我从未见过的他的妻儿。一见面，班主任对我说，奇怪，你怎么没变似的。我说，你也没变。其实，我变了，他也变了。当年那位风华正茂烫着卷发引领时尚的班主任，已经变成一位重负中的男人，被工作、家庭压得满腹牢骚的中年男人。这次上海之行，是他们一家筹划多年的还愿之旅，但腐烂的梅雨和小旅店坏了的空调让他们变得有些狼狈与不愉快。当这位在课堂上让我第一次知道“国家”“公民”“自由”“权利”“平等”“幸福”等名词的公民常识课的老师，向我抱怨工作的烦琐与工资的低廉，惊讶上海的物价与繁华，担心自己儿子是否能考上大学时，我对他说：“你们来得真不巧，梅雨季节是上海最难受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近两年无所事事，现准备再去上学读书。因为我已经知道，读书与上学是两回事，但我不敢肯定，有那么一种自由与幸福的存在。

OBITUARY 讣告

这么专业的历史说书人，走了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89岁的唐德刚先生罹患肾病多时，饱受折磨，最终决定不再洗肾，10月26日在旧金山家中安详辞世。这让我想起2008年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在清醒的时候一再嘱咐儿子，病危时不可同意实施创伤性抢救的方案。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表达了他们对生命的理解，“向死而生”。他们并不认为生与死是最大的选择，而是认为幸福与尊严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众所周知，唐德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不可胜数，唐德刚只有一个。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具有“专业的历史说书人”的气质。当年黎东方巡回讲史，四方轰动，有次从贵阳到香港，没有买到机票，用门票收入包了一架飞机，成为



唐德刚与张学良

一段佳话。唐德刚没有这种辉煌往事，我甚至没有怎么见过他出现在电视上，但是阅读他的文字，依然有“满村听说蔡中郎”的感觉。比如在《晚清七十年》里，他仿佛不是在写作，而是在说书，常常直呼读者“诸位”、“朋友”，亲切得像是他站在

你的面前，拍着肩膀说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杨天石先生，表示唐德刚的书很生动，“读唐先生的书有时候会笑出来”。

这几年，随着《百家讲坛》以及类似节目的兴盛，只要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一个个学者模样的说书人。学者在电视上讲历史，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除了极少数专业和口才俱佳的学者，绝大多数历史说书人和历史毫无关系，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选里面的好玩故事讲一讲，成了“故事会”。唐德刚不同，他的作品很有趣，很好看，但另外一方面他对于历史有着非常深入的把握，不管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他在有意识地把握历史背后的精神和脉络，一叶知秋。他认为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存在两次转型：一次是秦朝“废封建，立郡县”的创举，进行了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又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进行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被唐德刚称作“历史三峡”，他认为通过这个“三峡”，大致需要两百年的时间，而且前提是不能出现大的政治军事偏差。

唐德刚的成绩不仅限于他的著作，他还推动了口述史在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顾维钧、胡适、李宗仁等在 20 世纪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不用严刑拷打，都在唐德刚的“拷问”之下对自己的历史一一招来。很多名流一扫名士风范，主动屈尊申请接受唐德刚的“拷问”，比如宋子文并不认识唐德刚，却找过他多次，并且委托顾维钧代为说项。根据唐德刚的回忆，“国民党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这一方面是因为唐德刚主持的口述历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项目，口述对象可以获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与唐德刚的能力也逃脱不了干系。像顾维钧、李宗仁，都没有获得任何费用，他们依然接受了唐德刚的“拷问”。

目前国内也有口述史热，但能跟唐德刚相比的很少甚至没有。唐德刚做的口述史不仅对象非常重要，而且做得非常专业。今天很多人做口述史，好像有个录音笔就可以了。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口述史要对口述对象和相关历史有着深入的把握，当事人所说未必准确，有些话会有一些出入，唐德刚做了大量的注释和研究。“拷问”实乃考问，一边考证，一边提问。所以，唐德刚虽然曾与张学良有过对谈，而且录音也有所保存，但是唐德刚并不认为他做过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因为两人在对谈时，张学良拒绝唐德刚在史实层面上的质疑和纠正。在唐德刚看来，口述历史需要经过考辨，不是有闻必录即可。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历史说书人，通常只能面向没有专业基础的观众，一旦面对专业人士或者历史当事人，就会哑口无言。比如号称“史上最牛的历史老师”的袁腾飞先生，据说有很多学生粉丝，可是讲稿出版之后，不仅很多史实错误被一一发现，还涉嫌抄袭小说，几乎成为“史上最差的历史老师”。唐德刚也曾对个别史料判断有误，他的文章时时会有一些情感色彩过于鲜明的句子，但与那些单靠讲故事取胜、以至于把小说当做历史的说书人有着天壤之别。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说，和黄仁宇的“潜水艇三明治”说（黄仁宇把中国比作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黄仁宇认为中间阶层的缺乏使得中国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一样，在读者之中具有广泛影响。他做的口述史，是研究 20 世纪中国无法回避的历史资料。可以这样说，唐德刚不仅研究历史，也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可惜，这么专业的历史说书人，走了！

TRANSLATION 译介

永恒徘徊的胚胎

作者：Jacqueline Pfeffer Merrill

译者：朱芳艺（美国·孟菲斯，fangyizhu@gmail.com）

挪亚·马克汉姆在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下出生于 2007 年 1 月。就像他在圣经中的那个同名者一样，这个挪亚也是从一场洪水中被拯救出来的。在卡特琳娜飓风过后，路易斯安那州警察局和伊利诺伊自然保护警局从新奥尔良东部一家被淹没的医院用一艘平底船抢救了一管冰冻胚胎，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挪亚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利贝卡·马克汉姆接受了访谈，说她和她的丈夫格伦不知是否会使用剩余的三个冷冻胚胎，让他们加入到由挪亚和他的大哥维特组成的家庭中来。在挪亚一岁生日的时候，她又接受了访谈，她说：“我怎能不这样做呢？有两个孩子我已经很高兴了，但当你知道一切可能性的时候，你怎能不这样做呢？我们差点儿失去了挪亚。我不想自愿地失去其他的几个。”

利贝卡·马克汉姆的问题也正是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夫妇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在体外受精的手术中，都有多余的胚

胎。很多冷冻的胚胎在他们被冷冻贮藏之后不久即被使用了，其中有的没有成功受孕，有的则已加入其父母的家庭。然而，还有其余的一些将不会被用于尝试受孕；2008 年一份对拥有冰冻胚胎的病人调查报告发现，三成的父母“很不可能”或“不太可能”将他们冰冻的胚胎用于生育下一个孩子。不像英国或澳大利亚的试管婴儿多余胚胎在一定年限以后都会被销毁，美国病人有无限长的时间来决定如何处置这些多余的胚胎。

这个所谓的“处置决定权”以一种最亲密的方式，就胚胎的道德地位问题向病人提出了质问。病人必须决定胚胎——她的胚胎——是否将被丢弃、用于科研、还是捐给另一个不育的病人而成为另一个母亲的孩子。有些病人能够轻易做出决定，但很多病人发现这是如此困难以致于他们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2000 年《生殖技术》杂志上，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表明 70%拥有冷冻胚胎的病人在通过试管婴儿诞下他们第一个孩子之后 5 年还没有做出决定。而 2005 年另一项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72%拥有冷冻胚胎的病人不但尚未决定如何处置他们的胚胎，而且完全没有计划去做。一些病人将胚胎保存到她们正常的育龄过去之后很久。

80 年代初，当生育中心最开始将胚胎冰冻起来的时候，可没有想到成千上万的胚胎会在贮藏室里堆积成山。那时比起今日，还没有那么多胚胎被造出来，而更多的已在体外受精的过程中被植入母体了。因此，在一个典型疗程中被冰冻的胚胎很少。但更重要的是，医生们似乎以为胚胎要么就将用于受孕，另外的那些“剩余品”会被冰冻然后扔掉。医生们没有想到，很多病人在得到完整的家庭之后就完全把他们的胚胎留在贮藏室里了。

2003 年进行的一项关于生育门诊的调查发现，在美国，大约有 40 万胚胎堆积在贮藏室里，这一结果使医生和公众大为震惊。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了原先 3 万到 20 万冷冻胚胎的估计。如此一个巨大而持续增长的胚胎库出于种种原因，是个极大的问题。医生们发现他们将对这些无限期贮藏的胚胎负责，并感到忧虑。其他人则对这种将胚胎连续封存多年的残忍行为感到不安。一些医学研究者则视这些冷冻胚胎为他们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之未经开启的宝库。

这份 2003 年的统计刺激了好几项研究，这些研究人员渴望了解为何病人会将其胚胎长久存放在贮藏室里，并试探他们将多余胚胎捐献给科研或者其他不育夫妇的意愿。综合来看，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父母们在试图决定其胚胎命运时所穿越的理智与情感的旅程。很多病人对此项决定感到极度痛苦；在最初开始试管婴儿手术的时候，别人曾给他们说明过他们的胚胎将被如何处置，他们发现试管婴儿的生育使得他们重历了这一切。很多人发现他们不论通过什么现有的处置方法，都无法与自己关于胚胎的道德地位的判断相调和。当他们无法选择一种与他们的直觉相一致的方法的时候，很多病人就以默认他们的胚胎年复一年地存放在贮藏室里而告终了。

对于这些病人是否严肃对待因他们而造的胚胎之道德地位，正在增长的冷冻胚胎数量则是一个很好的初步见证。从另一方面来说，胚胎将被无限期存贮也造成了严重的实际操作问题和伦理问题。从实际操作角度出发，医生和诊所不大可能愿意年复一年地继续存放病人人们的胚胎。从伦理角度出发，这个局面也是很有问题的，这是因为这些最细小的人类形式在“灵薄狱”（limbo）*中的待定状态，也是因为这些胚胎仓库所造成的辈分困境。一些婴儿在胚胎被冷冻十多年之后出生；现在似乎胚胎可以被无限保存而不影响其活性。这样我们就陷入了如此一种情形：理论上说，一个女人可能会孕育一个她父母很多年前制造的胚胎，而诞下自己基因上的兄弟姐妹。

百年的存放，或者甚至只存 30 年，就是说，当今天这些最年轻的不育病人也都进入绝经期了，对于贮藏室中成千上万的胚胎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为什么病人将胚胎留弃于贮藏室？而我们怎样终于毫无目的地存放了如此大量的胚胎？

*译注：limbo，指未曾听到福音的人死后灵魂所去的地方，既非天堂，也非地狱或炼狱，位于地狱的边沿地带，那些灵魂将在永远的待定状态徘徊。



胚胎的道德地位

2008年11月,在前沿杂志《生育与不育》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请病人们以从1到7的标尺来描述胚胎的道德地位,10%的应答者认为胚胎全无道德地位,而18%的应答者认为胚胎享有最高的道德地位。1到7的标尺只是给我们一个粗略的考察,大约四分之三的应答者表示胚胎的道德地位居中,又或许,他们太疑惑以致无法给出回答。

非常少的病人——十个里面只有一个——视胚胎为毫无道德地位。2005年也发表在《生育与不育》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有些夫妇认为他们的胚胎不过比纯生物的物质强那么一点点。这项研究发现一些夫妇认为他们的胚胎本身并无道德价值,而只不过是出于基因上或心理上的保险措施,觉得这些胚胎可以为他们现有的孩子提供一些医疗上的好处……其他的人甚至在讨论万一他们现有的孩子因病或因故身亡时,这些胚胎可以做个候补。可以推测,对于这些认为胚胎缺乏道德价值的少数病人而言,处置决定是最轻易的,在试管婴儿手术结束的时候,他们免于面临道德重负和左思右想。

但对于占压倒性多数的病人而言,胚胎不止是一团细胞,如一项研究所称,他们“对丢弃人类生命感到很古怪”,这样,这个决定就是一个重大的道德抉择,因为他们把他们的胚胎看得比生物废料更重,必须找到一个好的处置方法。处置决定的这种强烈个人化的特质贯穿了所有的这些访谈类研究,很多病人变得情绪化甚至哭泣,说这个决定是如此“艰难”甚至“令人悲痛”。

使得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他们必须面临一个自己视角上的变化。在试管婴儿的手术中,病人们常常如此专注于怀上孩子,以致于忘记了这个目标之外的任何事情。因此,2005年的这项研究发现病人们最开始不曾在道德上正视冰冻胚胎,而只希望它满足他们要孩子的愿望:“当进行试管婴儿的手术时,夫妇们被再三保证得到很多多余的胚胎…当他们真正开始面临如何处置的决定时,他们的反应经常是不适和不确定。”这个视角的转变在2005年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中得到证实,这项研究主要是关于那些原本打算捐献多余胚胎给其他不育夫妇而后又反悔的病人们的。在试管婴儿手术中,“一个健康胚胎代表着更高的受孕几率。”

在做父母之前,胚胎象征的是成功的卵巢刺激的结果,以及怀孕的机会。而当胚胎继续发育成为孩子终于变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之后,他们的胚胎就开始象征“虚拟”的孩子了。

这些中途改变的观点也许可以部分解释2001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发现:在一个美国的诊所,71%的病人在完成试管婴儿的手术之后做出的处置决定,与他们先前在疗程开始之前在知情同意表格上签署的决定迥然相异。如此多的病人发现他们终将以一种与开始手术时所选择的不同方式来处置他们的胚胎,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处置决定在挑战病人原先的道德视角。

虚拟的孩子

在这项决定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病人们并未就胚胎的一般问题被询问,而是关于胚胎是他们的肉中之肉——至少在传统的无精子或卵子捐助的试管婴儿手术中是如此。很多病人将胚胎想成是他们现有的家庭成员,称之为他们的孩子或“虚拟孩子”,以及他们现有孩子的弟弟妹妹。一个女人将他们描述为“看不见但你得交钱的广义家庭成员”。另一个则称“每次开车经过存放胚胎的诊所时都要在心里跟他们问好”。

就像利贝卡·马克汉姆,很多父母本来是对他们家庭成员的数量非常满意的,但当他们知道“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不能忍受不去把剩下的孩子都生下来。2005年《生育与不育》杂志上的这项研究发现,对于很多像马克汉姆夫妇这样的病人,解决办法就是用多生育的方法把胚胎“用光”。一个奇特的后果就是,这些不育的女人最终比假设她们未患不育症的情况下生得还更多。



近十年来的试管婴儿手术的先进技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局势。在试管婴儿刚刚出现的时候,胚胎在培养液中只能生长一两天,然后冰冻保存4或者8个胚胎,其中每个都只有很小的几率成功受孕。有时,很多很多胚胎会被冰冻在同一个试管中,病人会慢慢攒上一些胚胎备用,这项2005年的研究还提到了一个病人,她冰冻了28个胚胎。现在,在最先进的诊所,胚胎学家能够使得胚胎生长到6-7天。在这个期间,大部分的都会死去而只有几个能够存活下来并冷冻,但这些都由约几百个细胞组成的胚泡,将它们解冻并植入病人的子宫后,也许只有三分之一的几率可以成功受孕。

很少有伦理学家会将一个三天大的八细胞胚胎和一个一周大的二百细胞的胚胎在道德价值上做出区分;在这两种情况下,该胚胎都已经经过了受精的过程,却尚未植入。然而,最新的技术可能会影响到病人们如何将多余的孩子纳入他们家庭的想象。似乎很难设想将一窝28个胚胎都容入一个家庭。“哦老天,我该拿这些胚胎怎么办?”在2000年发表在《生殖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一个女人如此悲叹道:“要是只有一两个,我就将他们都植入了。然后我可以想,我试过了,虽然不是有意生这么多的。可因为现在有八个,我不能这样做。我肯定不能再要八个孩子!”

而到了最近,病人可能会拥有几周大的胚胎,其中每个都有着发育成一个孩子的美好前景;也许更少量的胚胎和更高的受孕率将会使得一些病人的想象力受到更大冲击。

然而到最后,很多人还是决定不再尝试另一个孩子。在最开始的试管婴儿周期里,病人对每个胚胎寄予厚望。这样,当他们决定不使用这些胚胎来生另一个孩子的话,他们对胚胎的态度就会彻底逆转。这些他们曾经如此高兴地拥有的,保证他们能够成功的胚胎现在成了“多余”的不再合乎原有需要的胚胎。无论不想再多要孩子的原因为何,对胚胎心情的改变,使得很多病人感到罪恶和悲痛,这使得他们很难思考应该如何去应对。

整个世界因此改变

对于不愿将其胚胎用于生育孩子的病人,另一种选择是将其捐给其他不育的病人。2008年《生育与不育》杂志上的这则研究发现,在不想要另一个孩子的夫妇当中,有62%的“很不可能”或者“不大可能”选择将其胚胎捐给另一对夫妇,而只有16%“很可能”这样做。然而,有几项研究表明,甚至这16%也是过于乐观的估计——很多病人表示希望捐献多余胚胎给别的夫妇,却发现自己最终不能践行承诺。障碍往往在于他们强烈地感觉胚胎是“他们自己的”,而不能够信托给另一对夫妇去抚养。“我只是不能忍受它曾属于我们这一想法,”在2005年《人类生殖》杂志上一篇关于病人反悔胚胎捐献的研究里,一个女人如此解释道。“我们的一切都在那里面。”

很多人从刚开始试管婴儿疗程之初就怀有强烈的捐献意愿。对于其他不育夫妇的同情心以及做点无私好事的愿望使得捐献成为显而易见的选择。“生命形成的过程是如此宝贵,”正如一位母亲这样解释的,当我们极度专注于创造健康胚胎时,一切只显得如此自然,而想去将这欢乐与一些不那么幸运的人们分享。没有人曾透彻地想过,与别的家庭分享“一个真正亲生的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正如一位父亲所说,为人父母的经历是“整个世界的改变”。在2000年《生殖技术》杂志里提到过一位真的捐献过胚胎的女人,她在疗程开始的时候就捐献了,甚至还在怀上她自己的孩子之前,“出于迷信观念,她认为这一无私行为将会增加她自己成功的可能性。她后来有了两个男孩,总是在想‘另外那个’究竟是否她想得要命的女孩。”生活中已有孩子并做出这个决定的父母们更容易想象这个女人每天都要面临的:知晓他们亲生的孩子在(或可能在)一个什么地方,却并不为他们所知,跟他们法律上的孩子出奇相似,一样的可爱。(在一个深可遗憾的事例中,一位女人决定不捐献,因为她现在的孩子被诊断出了注意力欠缺障碍,基于这个原因,她认为那些“同一批”的也不应当生出来。)

在很多父母的想象中有这样一些戏剧场面,比如他们的孩子可能无意中爱上自己亲生兄弟姐妹,或者在遗产分配的时候会出现麻烦,或者某天一个“愤怒的少年敲响门铃,要求他们作出解释,为何他被送走了”。但这些具体的担忧也许都不如某个家庭成员不在家的幻想那么强有力。

这样,他们面临着这个痛苦抉择:未来的孩子是如此宝贵以致于父母们不能同意将其送给别人,因此他们必须考虑干脆将胚胎全部毁掉。在2005年《人类生殖》的一篇文章中,很多参与者在访谈过程中情感崩溃而泪下。一位女人说在她签署销毁表格的时候,有被“撞击”的感觉。“在我如此艰难地才得到这个胚胎之后,我竟然要去销毁它,难道它还算是我的孩子吗?”但是她说,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我感到我不能捐献它。”

甚至对于少数真正愿意捐献胚胎给别的夫妇的病人,美国法律规定,胚胎配子的父体和母体必须经过传染病检查,这给

实现胚胎捐献的愿望造成了很大障碍，而有些选择了捐献的人们发现他们捐不成。到 2003 年，得到一个捐献的胚胎需要等待三年。

捐献给科研

还有一个选择对于很多病人也有着吸引力，那就是将未植入的胚胎捐献给科研，他们说这样就能从他们的胚胎中拯救出一些益处——不让它们被浪费掉。2008 年《生育与不育》上的研究发现，66%的病人不愿意再多生孩子的病人“有可能”或者“很可能”选择将胚胎捐献给科研，这一决定与胚胎的较低道德地位和利他主义的考虑有关。其他的一些研究报告表明愿意将胚胎捐献给科研的人的比例更低。科研的目的也经常有很大关系：2004 年在《人类生殖》上一项来自丹麦的研究表明，在愿意将胚胎捐献给科研的病人中间，同意将其胚胎捐献给干细胞研究的人（57%）比同意将其胚胎捐献给不育症研究的人（60%）要少，而有趣的是，更少的人（49%）愿意将其胚胎捐献给已批准的干细胞治疗。

更重要的是，捐献给科研的实际操作上的障碍实是令人生畏。由于很多胚胎不具备足够的品质，或者从诊所到研究机构的运输费用过于昂贵，它们并不适合用于科研。在丽莎·芒迪的《凡可受孕的》中，她讲述了一个试管婴儿病人的故事，她非常努力地去寻找一个可以接受她捐献胚胎的科研人员，但是却未能如愿。而且，尽管有科研人员有兴趣，却还必须符合知情同意的繁琐规定。

丢弃胚胎以及怜悯式植入

对多余胚胎最简单的销毁方法，即有些诊所的唯一方法，就是将胚胎解冻然后丢弃。然而，在 2008 年《生育与不育》的那项研究发现，在不愿意再要一个孩子的病人当中，43%的人“很不可能”、而另外 11%的人“不大可能”选择这个方式。在这项研究中，所有病人当中只有 6%“很可能”想让他们胚胎被解冻然后丢弃。在将近半数的病人不愿意再要孩子，却“很不可能”选择很多诊所提供的对多余胚胎的唯一处理方式的情况下，冰冻胚胎的数量持续增加根本不足为奇。

很多研究聚焦于病人捐献胚胎给其他不育病人或科研的决定，却不大有资料来关注病人如何看待销毁他们胚胎的问题，以及这一行为在他们眼中的意义。李昂·卡斯，1985 年出版的《向着更自然的科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意义：

未植入的胚胎的死亡应该类似于自然繁殖的种种尝试中被损失和浪费掉的无数胚胎。据估计，在未避孕的性交当中，有 50%成功受精了的卵子未能着床，或者不能保持着床于子宫壁，之后不久就脱落了，而根本不会检测出怀孕。

当然，在胚胎于体外培育并销毁的情况下，以上不可见和出乎自然的一切，就变得可见而出于人为选择了。因此，丢弃胚胎的另一个可能的意义就集中于选择的因素，并且销毁胚胎便被类比为堕胎了。

这些研究报告中有些证据表明，很多病人正如卡斯所提出的那样，的确将解冻胚胎并丢弃的行为比作很多胚胎的自然受孕失败。2008 年《生育与不育》那则研究着重讲到了“解冻与丢弃的实际过程对于病人的重要性”。作者询问了病人是否愿意选择一种看得见的丢弃胚胎的方法。其中的一种方法叫做“怜悯式植入”，就是在病人生理周期的一个很不可能怀孕的时间里，将胚胎转移至她的子宫中。这个过程基本上就如卡斯所言，试图让胚胎的丢弃尽可能模拟自然的体内受孕失败的过程。在不愿意再多要孩子的人中间，有 18%“有点可能”或者“很有可能”选择怜悯式植入。

在没有怜悯式植入的时候，很多病人寻求以一种比直接扔到实验室废料里更为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胚胎。24%的病人回答说，如果在解冻胚胎时如果有机会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他们将“有点可能”和“很有可能”选择出席。不让他们看见处理的过程也许会使得他们感到更难舍弃胚胎，而仅仅医生承诺会“尊重地”处理他们不再存活的身体组织也不足以让他们感到保险。

在美国，只有不足 5%的诊所提供怜悯式植入或者销毁仪式。很多诊所含蓄地表示，如果一个胚胎被解冻并丢弃，那么不论这发生在玻璃管里还是女人的子宫里，不论是伴随有一个仪式或祷告还是什么也没有，都毫无关系。不过，对于这项服务的兴趣表明了满足病人的道德关怀的愿望，也表明病人不舍弃他们胚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实际操作的过程怀有疑虑。

没有什么好办法

各种处理方法的丑陋,加上病人不能实现捐献胚胎给其他不育夫妇或科研人员的愿望,意味着很多病人终于选择了默认将其胚胎留在贮藏室里。病人们似乎找不到一个道德上合理的选择,于是陷入了犹豫不决当中——而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也因胚胎漫无目的的持续积累问题而受到质问。2008年《生育与不育》上的那项研究发现,20%拥有冰冻胚胎却不愿再要孩子的病人“有点可能”或“很可能”将他们的胚胎“永久冰冻”下去。

冰冻胚胎的持续增长在美国现已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对于医生和诊所而言,发现他们竟然毫不情愿地被托付了如此之多的胚胎,也是难以忍受的。这也让我们面临一个新的伦理问题,比如,如果胚胎在制造出来以后很久才被使用,就会造成复杂的家庭宗系问题。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对存储时间采取一定限制也许能稍微缓解一下这些问题,虽然不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在美国却难以实现,因为试管婴儿手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政府控制的。

冰冻胚胎的迅速增长也反映了每个个体对于不育症治疗的复杂经历。对于很多病人而言,通过试管婴儿手术把一个孩子抱回家的真正欢乐,由于不知如何安排冰冻胚胎命运的问题而染上了一丝磨人的焦虑色彩。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他们无法或者不愿将手术过程中创造的所有新生命都带回家来,与他们之前对于新生命的强烈渴望之间的无法调和,实在是令人心碎;对于这些病人而言,不育的悲痛,被他们对所造生命的焦虑所取代。为他们解除一种悲伤的现代科技,却不能使得他们逃脱另一种新的、却也许更长久的悲哀。

2008年《生育与不育》上那篇文章的作者得出结论说,“重建和标准化知情同意的流程,保证处置胚胎的所有选项对病人开放,这些将会对病人有所裨益。”然而,修改“知情同意”的流程,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人所面对的问题。在为人父母的传统角色中,他们根本不需要决定孩子的命运:将生命带入这个世界,这不能、也不应该在他们的把握之中,他们知道这一点,于是全心投入到孩子的康乐中去,而(除去意外的不幸)按照自然的顺序,他们将先孩子们而离世。胚胎的标准处置方式与这一天生的关系与目的不符。无限期贮存胚胎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将受到责任的感召,从而作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却是违反他们心中人类胚胎道德地位和他们后代关怀本能的。他们并不愿意更清楚的知情同意条款来增加其自主权,其实似乎很多人愿意少一点选择权:那些对怜悯式植入感兴趣的女人其实是希望把选择权交还给命运,看见她们的胚胎消失,却并不由于它们是被故意毁掉的,而是因为“是无意的”。然而,甚至在怜悯式植入可供选择并显得可行的非常少量的案例中,这一小小的放弃,并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一难题。

但是,尽管没有清晰的前进之路,到最终我们也不得不作出决定的。

原载:《新亚特兰蒂斯》,2009年春季刊,总第24号,18-28页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 <http://chinairr.com.cn/>